[英]《经济学家》主编

现代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Modern Economics

经济科学出版社

现代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英〕《经济学家》主编
冯金华、郭熙保等译
刘涤源　校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封面设计：卜建辰
责任编辑：王　林
责任校对：段小青

现代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英〕《经济学家》主编

冯金华、郭熙保等译

刘涤源　校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4.25印张　100000字
1987年5月第一版　1987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01—310000册
统一书号：4312·215　定价：0.85元
ISBN 7-5058-0034-5/F·32

目　录

中译本前言

1984年9月—12月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经济学短文”专栏标题下先后发表了总共13篇文章。除了第一篇概述近50年来西方经济结构和经济理论的演化、最后一篇评价经济理论现状并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之外，其他11篇文章从总需求、总供给、供求关系以及均衡与非均衡理论等各个方面系统而扼要地介绍了西方经济学自从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发表以来的发展情况。每篇文章篇幅都不太长，但内容全面、材料丰富，颇值一读。

随后，该杂志将这13篇文章重印成书出版，定名为《现代经济学的最新发展》(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Modern Economics)。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下面根据这些文章，大致勾画出最近几十年来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线索。

IS-LM结构：总需求理论

在1936年凯恩斯发表《通论》之后不久，希克斯就对《通论》的基本原理作了高度概括的形式化表述，这就是所谓的IS-LM结构。该结构的特点在于它把商品和货币两个市场综合起来进行需求分析。单从商品市场来说，收入的均衡条件为投资等于储蓄。但投资与利率成反方向变化，储蓄与收入成同方向变化，故均衡收入不能确定：它随利率的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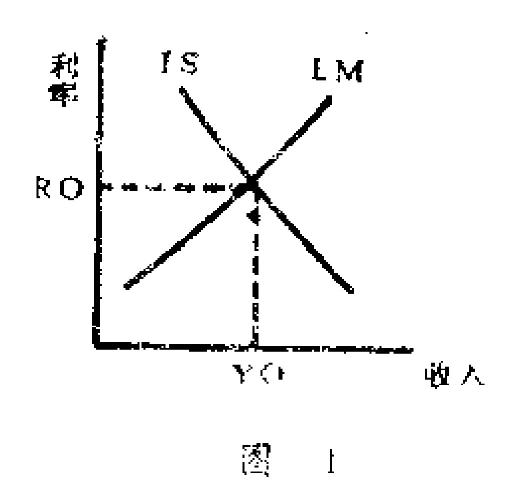


图 1

而增加。商品市场均衡时，利率与收入之间的这种关系表现为图1中向右下方倾斜的IS曲线。

为了确定收入，必须先确定利率。但利率决定于货币市场状况，其均衡条件是货币需求等于货币供给。货币需求包括货币的交易需求和投机需求，前者与收入成正比，后者则与利率的变化方向相反。因此，在货币供给不变的条件下，单考虑货币市场，利率也不能确定：它随收入的上升而上升。货币市场均衡时利率与收入之间的这种关系表现为图1中向右上方倾斜的LM曲线。

商品市场的均衡收入与利率有关，货币市场的均衡利率又与收入有关，因此，必须把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结合起来进行IS-LM分析。图1中两条曲线的交点决定了均衡收入和均衡利率分别为Y_0和R_0。

从IS-LM结构可以推导出所谓的总需求函数。假定价格下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实际货币供给就会增加，这就导致LM曲线向右边移动。LM曲线右移意味着每一收入水平上的利率水平开始下降，利率下降导致较高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即较高的收入。价格下降引起消费和投资提高表明总需求曲线具有向右下方倾斜的性质。

消费与投资：需求理论的发展

IS-LM结构的基础是简单的消费（或储蓄）和投资理论。在简单的消费模型中，消费只取决于当前的收入。这

种消费理论后来得到了三个方面的发展。第一，引入了利率和价格变动率（通货膨胀）等其他影响消费的变量。利率变动通过财富效应影响消费和储蓄，价格变动则通过实际余额效应达到同一结果。第二，把短期收入概念拓展为长期概念。弗里德曼最先提出，决定消费的不是当年收入的大小，而是人们相信他们一生的年平均的“持久”收入的大小。第三，引入理性预期概念。长期收入自然引起预期问题。弗里德曼理论起初是基于适应性预期。适应性预期理论认为，实际收入的变化必须持续一段时间才能使人们认识到“持久收入”发生了变化。因此，消费对收入变动做出的调整是相当滞后的，亦即边际消费倾向接近于零。理性预期理论则认为，人们有充分根据判断收入的变化是否是持久的，从而据此做出消费的调整。

投资理论开始时采取“流量支出”分析方法，后来发展为“存量调整”——把投资看成是厂商实际拥有的资本存量与厂商想要拥有的资本存量之间的差额。当购买新增资本的成本等于该新增资本取得的新增利润(经适当的利率折为现值后)，厂商即得到所需要的资本存量。如果厂商实际拥有的资本存量恰为此数，则投资不会再行增加。因此，根据“存量调整”理论，净投资取决于资本品价格、预期利润和利率三项因素。与消费理论一样，投资理论在后来的发展中也大量吸收了理性预期的思想。与假定厂商只受过去经验影响的模型相比较，考虑了理性预期以后，厂商的投资更加不稳定。

IS-LM-BP分析：从封闭到开放

IS-LM结构主要是分析封闭经济的情况，但它很容易发展成为处理国际收支平衡问题的开放经济模型。

国际收支状况如何可以由其两个主要部分表示：（1）商品和劳务的净出口（即出口减去进口的差额）；（2）资本的净输出（即输出减去输入的差额）。当商品和劳务的净出口恰好等于资本的净输出时，国际收支就处于均衡状态。假定国际收支一开始是处于均衡状态。现在让国民收入上升。国民收入上升引起消费从而进口增加，如果出口保持不变，这意味着商品和劳务的净出口减少。为了继续保持国际收支的均衡，资本净输出也必须同样减少，亦即必须吸引更多外资或者减少资本输出，这可以通过提高国内的利率来办到。因此可以得到结论：为了不使国际收支均衡被破坏，国民收入和利率须同时上升或同时下降。于是可以在IS-LM模型中加进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国际收支函数曲线BP。（见图2）。这就构成了所谓的IS-LM-BP分析。BP曲线上任意一点都表示国际收支均衡时利率与产量的组合，BP曲线之外的任意一点都表示国际收支失衡，具体来说，BP曲线上方区域为国际收支顺差（商品和劳务的净出口大于资本的净输出），BP曲线下方区域为国际收支逆差（商品和劳务的净出口小于资本的净输出）。在图2中，国内经济的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在IS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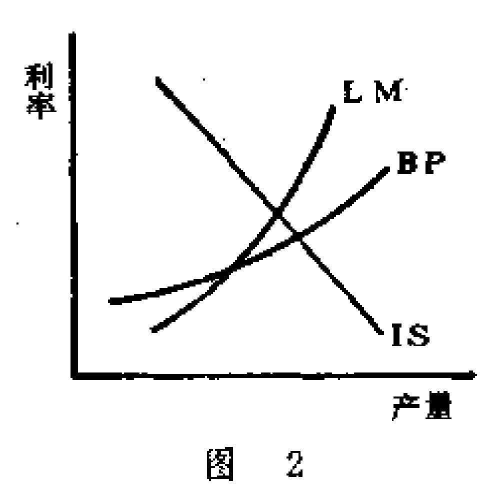


图 2

LM的交点处达到均衡。但是，IS与LM的交点位于BP曲线的上方，表明国际收支顺差。顺差意味着外汇供给过剩。在浮动汇率条件下，外汇供给过度促使国内通货的对外汇价趋于上升，这将抑制出口而鼓励进口，结果BP曲线与IS曲线左移。BP左移是因为现在在每一国民收入水平上，商品和劳务的净出口都减少了；净出口减少要求资本净输出减少，从而要求利率提高，以维持国际收支均衡。换句话说，由于汇率上升，现在每一国民收入水平都对应于一更高的利率水平。IS左移的原因显而易见：净出口减少本身就是需求的减少。BP与IS的左移将使BP、IS、LM三线交于一点，同时实现内部和外部的均衡。但是，如果是在固定汇率的条件下，中央银行就会用增加国内货币供给的办法来吸收过剩的外汇供给，从而维持汇率不变。国内货币供给增加将促使LM曲线右移，最终也将达到内外同时均衡那一点。

上述方法可以同样用来分析国际收支发生逆差时的调整过程。

劳动市场：供给问题

IS-LM 结构基本上是需求分析。西方经济理论家后来试图把劳动市场引入 IS-LM 结构，用供给分析补充需求理论。总供给模型涉及到供给量和价格水平的相互关系。给定生产函数，供给量与就业量存在着确定的关系：随着就业量的增加，产量将增加，尽管由于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产量的增加会越来越少。就业量则取决于劳动市场的供求关系；劳动需求和劳动供给又取决于工资率：随着工资率的提高，劳动需求减少，劳动供给增加。如果名义工资不变，价

格变动将影响实际工资率。因此，价格水平的变动通过影响工资率从而影响就业量来影响总供给。

如果假定工人只注意工资率的高低，而对价格的变动"漠不关心",那么价格上升将引起厂商对劳动需求增加,厂商可以通过稍微提高工资率来吸引更多的劳动供给，从而提高就业水平和产量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价格上升导致总供给增加。因此,总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这一模型通常称为"凯恩斯模型"。但是，如果假定工人对价格的变化与厂商同样敏感，那么，价格上升就会减少劳动供给，即使厂商增加工资（只要工资上升不超过价格上升）也无法吸引更多的工人，价格上升的作用抵销了工资上升的作用，就业量和产量将不会变动。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变化不影响总供给，总供给曲线成为一条垂直线。这种供给曲线通常称为"古典模型"。

总供给曲线到底是向右上方倾斜还是垂直取决于工人和厂商在面对价格变化时谁能更快地调整自己的行为。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劳动契约和判断实际工资较困难等原因,工人通常不能象雇主那样对价格变动作出迅速调整。因此,总供给曲线在短期内向右上方倾斜,但在长期中它变为垂直。总供给曲线的形状如何，具有明显的政策意义：如果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则政府可以通过管理需求和价格来提高就业和产量；如果曲线垂直，则需求管理政策完全失效——无论价格水平如何，供给不会变化，除非能够移动总供给曲线本身。

供求结合：价格水平和就业水平

在综合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 IS-LM 结构中引入价格

变化，得到了向右下方倾斜的总需求曲线；考察价格变化对劳动市场的影响则得到了短期中向右上方倾斜的及长期中垂直的总供给曲线。总供给曲线与总需求曲线的结合可以说明价格水平、就业水平（及产量水平）的决定和变动。

参见图3。设经济初始均衡状态为A点，价格和产量分别是P_1Y_1。现在政府通过需求管理政策把需求曲线从D提高到D_1。通过商品、货币、劳动诸市场的一系列调整，经济移动到新的状态B：价格上升到P_2，产量上升到Y_2。但是，B是短期均衡状态，不能长期维持下去，因为一旦工人认识到价格水平的上升已经造成其实际工资的下降，它们就会减少劳动供给，从而从长期调整来看，总供给曲线成为S_2的垂直线。因此，经济体系会渐渐从短期状态B运动到长期状态C：价格继续上升直到P_3，产量却下降到原来的Y_1。因此，结论是：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短期内能够以较高的价格为代价来扩大产量和就业，但长期中却只能提高价格，不能增加就业和产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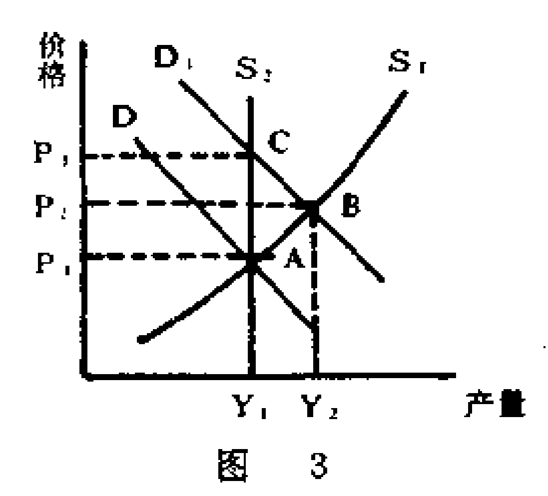


图 3

上述价格和产量的变化只是被看成为总需求曲线变动的结果。70年代初，石油危机及其他一系列供给冲击使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滞胀”：价格上涨伴随着生产的停滞。需求分析不能解释这个结果，经济学家开始从总供给曲线方面探寻原因，他们认为，石油危机一方面使一定量劳动所能生产的产量减少，另一方面又使厂商对劳动的需求减少，这两种影响加起来促使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假定总需求曲线不变，

总供给曲线左移既造成价格上升又引起产量减少。

向右上方倾斜的总供给曲线表明，政府能够通过忍受较高的价格来换取较少的失业。50年代末，菲利浦斯进一步提出，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菲利浦斯曲线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似乎适用于很多国家。但是，到60年代末，人们发现：在长期中，一定的失业水平与越来越高的通货膨胀相对应。经济学家认为，这种令人沮丧的形势可以用价格预期——工资调整过程解释。政府不断提高价格以换取失业的减少，结果使工人对价格上涨形成预期，并据此要求工资同等程度的上涨。在这种情况下，价格上升与工资上升的效果相互抵销，失业水平保持不变。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试图用理性预期概念来说明问题：如果工人总能正确地预期政府减少失业企图的通货膨胀效应并迅速地做出反应，那么，即使在短期内，失业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反比关系也不存在。

价格——工资刚性：非均衡理论

IS-LM结构是一个市场结清模型。利率的自动调节保证了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假定工资可以自由伸缩，IS-LM结构也为劳动市场均衡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解释。但是，如果工资具有刚性，IS-LM结构则可以用来说明失业现象。这一结果启发一些经济学家来思考：如果价格也和工资一样具有刚性，情况会如何呢？这一研究开创了经济学上的所谓非均衡分析。

非均衡理论把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结合起来考察家户和厂商的行为。就家户而言，它们在商品市场上是需求者，在劳

动市场上是供给者。在一定的价格和工资水平下，家户想要购买的商品量和愿意提供的劳动量是确定的，它们分别被叫做家户对商品的概念需求（notional demand）和对劳动的概念供给（notional supply）。如果厂商恰好提供相等的商品和需要相等的劳动，则商品和劳动两个市场将都处于均衡状态。但是，如果厂商的劳动需求比家户对劳动的概念供给小，则（假定工资不变）劳动供给过度。全体家户只能得到较低的收人，从而只能购买较少的商品。因此，家户现在对商品的需求小于其概念需求。这种在劳动需求限制条件下家户对商品的需求叫做对商品的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

另一方面，如果厂商对商品的供给比家户对商品的概念需求小，则（假定价格不变）商品供给不足，家户收入的一部分被迫储蓄起来，这会使它们减少劳动供给。这种在商品供给限制条件下家户对劳动的供给叫做对劳动的有效供给（effective supply）。

厂商是商品的供给者和劳动的需求者。在一定的价格和工资水平下，厂商愿意提供的商品量和需要的劳动量分别是厂商对商品的概念供给和对劳动的概念需求。当家户提供的劳动较少，从而厂商实际上只能得到较少的劳动、只能提供较少的商品时，厂商对商品的有效供给便小于其概念供给。当家户对商品的需求较小，从而厂商将缩减生产时，厂商对劳动的有效需求便小于其概念需求。

将一定价格和工资水平下家户和厂商的上述行为综合起来得到以下结论：如果家户和厂商都能够实现各自的概念需求和供给，则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同时处于均衡——市场结清；否则则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非均衡状态又有两种。第一，厂商对商品的概念供给大于家户对商品的概念需求，同时厂

商对劳动的概念需求小于家户对劳动的概念供给。这时，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均出现供过于求。两方面的需求不足通过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相互作用将把经济推向深刻而持久的衰退和失业。这种状态叫做“凯恩斯失业”。解决“凯恩斯失业”的方法是通过政府干预来刺激总需求。增加总需求首先使商品市场供求逐渐一致，然后使劳动市场的供求逐渐一致，恢复体系的均衡。

第二，厂商对商品的概念供给小于家户对商品的概念需求，同时，厂商对劳动的概念需求小于家户对劳动的概念供给。这时是劳动市场供给过度而商品市场需求过度。这种情况下的失业不能用增加总需求的方法来解决，但可以通过降低实际工资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因此，非均衡理论家把这种失业叫做“真实工资失业”。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主义者的价格——工资刚性的非均衡分析适用于短期经济现象，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价格——工资弹性的均衡分析适用于长期经济现象。

以上我们简要叙述了最近10多年来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线索。我们知道，当代西方经济理论是以现行经济形态中市场机制作用为主体，辅之以各种形式、不同程度的政府调节，对国内、国际各种经济变量的相互关系所进行的分析和概括。它完全忽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之质的分析。它有着重大的肤浅性和局限性。我们相信读者能够加以识别，并作出正确的评价。

我们的水平有限，加以时间匆促，译文差误在所难免，甚望不吝指正，以便改进。

朱景尧　冯金华

1986年6月　于武汉·珞珈山

一、经济学：新与旧

美国经济学家雅克布·维纳（Jacob Viner）说过，“经济学是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这一组短文描述了他们近来一直在做的事情。由于市场和制度的变化、关于旧理论的新经验证据的出现，以及纯理论和半纯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家们的议题一直在迅速地变化。结果，大专院校讲授的经济学课程在过去十多年里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希望这些短文起到温习的作用，并有助于初学者。短文由简而始，任何人都可以理解。

与普通看法相反，经济学不只是一个象牙塔式的学苑，它的许多奇妙理论都是来自现实世界的变化，时至今日，概莫能外。在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初期，亚当·斯密（Adam Smith）撰写《国富论》指出，只要允许自由市场发挥作用，国家和人民就会富裕起来。到19世纪，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则试图解释人民群众的贫困；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提出的结论是“不可避免”的革命的幻想。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解释20世纪30年代大规模失业时指出，为了维持增长和就业，有必要对需求实施宏观经济管理。

当经济状况良好时，至少公开的经济争论会消失。50年

代和60年代便是如此。当时，凯恩斯主义处方取得了明显的成功。许多政府都相信，它们能够通过准确地运用为数不多的几项政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它们认为，财政政策（公共支出和税收）对于实际支出具有直接的、数量上可确定的影响。如果增长无力、失业增加，政府就应增加支出或减少税收、或双管齐下。如果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开始上升，政府紧缩财政政策并使利率稍微提高一点，就会缓解通货膨胀。从国际上来说，经常项目上出现持续性赤字，这就表明汇率过高。如果无法通过在国内加速生产力增长和放慢成本膨胀来矫正，政府最终可以降低汇率。

并非每一个经济学家都赞成上述原理。有些经济学家一直强调货币政策在决定总支出上和微观经济措施在改进市场运行方式上所起的作用。流行的正统观点并没有完全忽视这些观点，不过它更加强调偏向于财政方面的宏观经济政策。当流行观点取得成效时，它很难受到怀疑。

最初麻烦的迹象在6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中的24个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在1959—1966年间每年平均增长5.5%；1967年增长率降低到3.8%，失业上升到几乎占劳动力的3%，而在这以前的5年中，失业基本上稳定在2.5%左右。

上述有关增长和失业的数字现在看来是值得羡慕的，当时却令人深感不安。政府根据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方案作出反应：增加其预算赤字。这一行动似乎获得了成功：经合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1968年为5.4%，1969年为5.1%，失业率同时下降。然而，到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再次放慢，仅达3.1%，而失业率却超过了3%。

正值增长疲软无力之时，经济患上了另一病症：通货膨

胀率在上升。经合国家的消费品价格在1953—1965年间平均每年只上升2％。到60年代后期，较慢的增长带来较慢的通货膨胀的想法开始消声匿迹。1970年当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放慢时，经合国家的消费品价格膨胀率却一直上升到5.6％。

各国政府都在忧虑，但它们担心失业更甚于担心通货膨胀。它们再次扩张需求，经合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再次加快，1971年为3.6％，1972年为4.5％，1973年为6.1％。这一切听起来很动人，结果却并不妙。失业反应迟钝，1973年仍然高于1970年，而通货膨胀却迅速上升——尽管有更多的国家尝试着采用管制工资和价格的办法加以遏制。1973年下半年（石油价格暴涨之前），经合国家消费品价格以10.3％的年率上升。

汹涌澎湃的通货膨胀加上顽固不化的失业结束了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意见一致的时代，恰逢此时，现实世界中发生了另外两个事件，正在促使经济学家和政府改变思维方式：

（1）在1973—1974年北方冬季寒冷时节，石油价格上涨了4倍。这是受到石油输出国组织卡特尔的操纵，但市场力量无论如何也在推波助澜。大约在5年的时间中，对石油需求的增长一直快于新油田的发现，因此价格注定要上升。以低廉的能源推动的经济增长再也不可能了。

（2）汇率的浮动。通货膨胀一超过2—3％，就可能损害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的固定汇率制度。各国通货膨胀的幅度并不相同，因此成本也不一致。当通货膨胀加速时就更是如此。在1967年，经合组织7个最大国家的消费品价格膨胀率分布于联邦德国的1.4％到日本的4.0％之间。到1971年，通货膨胀最慢和最快的两个国家的差距，已经从

2.6个百分点扩大到6.6个百分点；加拿大为2.8%，英国为9.4%。(严格地说，与汇率有关的是贸易品价格：它们也以差距越来越大的速度上升。)

政府为保持币值固定，使用了最后一招。1971年12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史密森氏会议上，各国政府达成了一套新的汇率。然而，市场很快就使之失效。在两年内，主要国家的汇率都浮动起来。

汇率从固定到浮动的转变，同放宽对国际资本移动的控制，恰巧碰到了一起。世界突然面临着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手中巨大的现金余额问题，必须加以对付。这些现金余额必须"再循环"到经合国家和发展中世界的借款者手中去。这一任务主要是留给商业银行和私人市场去完成的。

有这么多的货币晃来荡去，汇率当然变得更加捉摸不定了。做货币生意的人意识到，由于先前连续数年不变的汇率现在时时变动，一瞬之间便可能输赢百万。他们对也许造成汇率变动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对通货膨胀，大大敏感起来。1974年整个经合组织通货膨胀率平均上升到13.4%，其中7个最大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分布在联邦德国的7.0%和日本的24.5%之间。

各国政府也发现自己是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之中。快速的通货膨胀和缓慢的经济增长使它们更难以判定其政策是否合适。利息率上升是因为通货膨胀上升，还是因为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更大的预算赤字是刺激了需求量，还是仅仅表明了价格上升对政府收益和支出的不同影响？由低速通货膨胀和金融的稳定性所带来的旧的确定性不再适用。时代要求重新进行思考。

新的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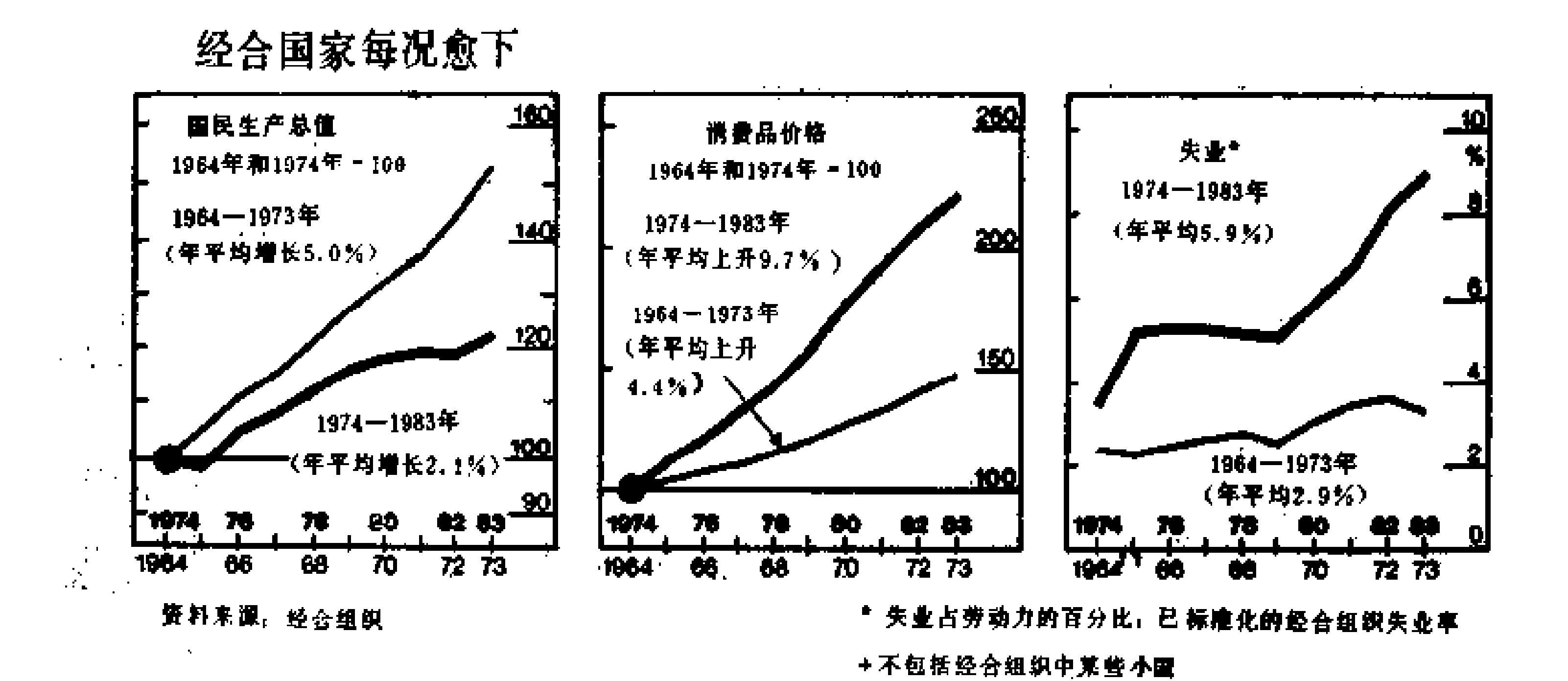
70年代初标志着进入了第二次大战后的新时期。从此以后，经合国家经济每况愈下。经济增长放慢，通货膨胀加快，失业率升高（见图）。有些经济学家因而把1973年以前看成是黄金时代。他们认为，如果政府重新回到与过去同样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上去，就能够再次创造这个黄金时代。其他经济学家则认为，1973年以后碰到的困难是1973年以前所执行的政策的必然结果；只有治愈了这些政策造成的创伤之后，经济才会再次繁荣。

上述意见分歧通常被称为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之争。两派都因过去12年经济失败而相互指责对方。实际上，他们哪一派也不象听起来那么一成不变，他们关心的也不是要重新掀起旧的论战。现实世界的变化已够巨大，足以让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找到某些共同的话题，足以让不易被束之高阁的新观点涌现出来。

以汇率为例。1973年以前，同数量如此之多的国际流动货币伴随在一起的弹性汇率，世人还是闻所未闻。这一变化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人们对于决定汇率的因素仍然是一知半解；对于贸易、利率、价格、利润等等也同样如此。

凯恩斯主义特别须要修正自己的理论，使其适合于浮动汇率的新世界。凯恩斯的主要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论述的是不考虑国际贸易的封闭经济。新凯恩斯主义对资本流动量和汇率的某些看法则是从非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经济学家（尽管不一定是货币主义者）那里借用来的。使用所有那些术语来描述各种不同的思想流派表明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

经合国家每况愈下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

* 失业占劳动力的百分比，已标准化的经合组织失业率

+不包括经合组织中某些小国

义的区别常常是太简单了。

失业是另一个具有大量新问题需要经济学家探索的领域。实际上，在经合组织的每一个国家中，失业率都比70年代初期高得多。较慢的经济增长毫无疑问是一部分原因。但研究者们也在考虑实际工资、国家补贴与税收、工作空位的信息等等对就业的影响。他们把劳动市场当成大量的单个人讨价还价的总合来看待，然后再寻求影响单个人讨价还价的微观经济因素。

经济学中开创性的新发展，如果有的话，那也很少。它们使用已经存在了好多年的概念；在这个范围内，它能够为经济学知识已经过时的人们所理解。但是，经济学方法的变化却很大（见附录）。数学公式受到了更多的重视，电子计算机使处理大量统计资料和进行经济计量检验成为可能。这些变化标志着经济学更加难以理解，尽管新的研究工作所得到的结果大部分都可以用语言和简单的图表表述出来。

附录：经济学家如何研究经济？

经济学的真理从来都是难以确立的。但探索它的方法有三种主要的形式：

第一，通过文字来建立理论。6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学家相互交流的主要方式一直是书面文字。这些书面文字表述以图表作补充：从简单的供求曲线直到较为复杂的象描述国际贸易那样的曲线。统计资料放在表格或时间序列图里以表明经济因素（例如货币和价格）之间的联系。

上述工作的目的是要发展有关世界运行法则的理论。其

中包含有确定经济效应的企图，例如支出变化对增长和就业的效应的数量关系。但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能否得到精确的数量结果表示怀疑。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教授在1960年写道："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和评论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必须依靠对经济效应的大小进行猜测。"然而在11年后，他却声称，数量化和预测的能力是"使专业经济学家比对经济问题有兴趣的普通聪明人要优越些的主要原因"。约翰逊信心增强是因为其他两种方法的兴起。

第二，通过数学建立理论。在20世纪中，经济学的文字传统逐渐被数学（特别是微积分）的使用所取代。使用数学常常只是为了方便：写$Ct = a + bYt - 1$要比写一定时期的消费由某个不变量加上前期收入量的一个部分所决定这句话要快。从炊事到核物理学，每一课题都有自己的简化方法。非经济学家一定欢迎使经济学减少空谈的任何事情。

然而，数学由于一些更复杂的原因而越用越厉害。198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杰勒德·德布勒(Gerard Debreu)教授从理论上确立了一组竞争市场能够同时达到均衡的条件，从而闻名遐迩。这是一个主要的智力结果，如果没有数学，那是不可能获得的；但是许多怀疑者并不相信德布勒的研究使经济学变成了更切合实际或更富有成果的学问。

第三，通过计量经济学进行检验。电子计算机的发展使这一最新方法成为可能。电子计算机能够把数学公式应用于大量的统计资料，估计经济理论家们确信存在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如果有的话)。从原则上来看，这一点显然很有用处。但是怀疑者担心所谓的"数据提炼"——不加选择地用计量经济学来确定经济关系，然后再赋予它虚假的意义。在某一年啤酒瓶的产量和下一年国内生产总值之间表现出来的经济

计量关系可以很密切。但是从这里得不出任何结论，除非理论家们能够首先解释清楚啤酒瓶是如何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的。

数学和计量经济学现在统治了经济学学术文献和高年级学生教程。这一变化没有能够影响某些著名的经济学家。197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瓦西里·列昂节夫(Wassily Leontief)教授分析了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文章。下面的表格说明了这种趋势——列昂节夫先生并不喜欢这种趋势。他在给美国的《科学》杂志写的一封信中抱怨说："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合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但却不切实际的结论。"

年青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学究们——对这些批评不以为然。他们大都认为，经济学正在卓有成效地发展。他们认为，这一新方法并不是对理论和观察的"实际经济学"的威胁——仅仅是对不能跟上研究发展的业余经济学家的威胁。

《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各类文章的比例	1972-1976年 %	1977-1981年 %
没有任何资料的数学模型	50.1	54.0
没有任何数学公式和资料的分析	21.2	11.6
统计方法	0.6	0.5
以作者整理的资料为基础的经验分析	0.8	1.4
根据出版的或其他人整理的资料进行间接统计推断的经验分析	21.4	22.7
没有根据作者整理的资料进行间接统计推断的经验分析	0.0	0.5
没有根据资料进行间接统计推断的经验分析	5.4	7.4
以人工模拟和试验为基础的经验分析	0.5	1.9

资料来源：《科学》

冯金华　译自〔英〕《经济学家》1984年3月22日第64—65页

二、解释需求

现代理论家们并不认为凯恩斯已经有效地分析了有效需求。在1935—1965年间学习经济学的旧剑桥落伍者听到这一说法将感到忧伤。但你的学习若从与凯恩斯几乎同时的牛津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爵士的理论开始，你可能就能了解关于有效需求的更加现代的理论。

理论家都是简化家，其任务是要理解真正重要的东西，而把妨碍这种理解的那些复杂细节加以舍弃。如果是抛弃错误，其理论就经不起检验，也经不起其他理论家的逻辑分析。按照常理，总需求的基本理论一开始就舍弃了国际贸易，并且（大部分时候）假定了价格是稳定的。这些问题是以后要添加到需求理论骨架上面去的血肉。

有四个基本成分必须记住。商品市场有两个——消费和投资；两者相加等于总需求。货币市场有两个，因为需求要通过货币来表现。货币需求采取两种形式：交易和投机。这两个奇特的术语后面要稍加解释。政府支出是需求的另一大组成部分，将在以后的短文中另加讨论；目前假定它不变。

经济学家使用这四个概念能够解答现实世界中所熟悉的问题：较低的利率对需求有什么影响？政府削减所得税的后果如何？理论本身虽然不能提供决定性的答案，但至少使得它们可以用共同的语言来进行讨论。

先从商品市场和消费与投资的决定因素开始。

消费明显地受到收入的影响，后面的短文将会表明它还受到例如利率的影响。但最简单的消费函数只有一个变量：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也增加。

经济学家定义和计量消费很少有困难。但“收入”的意思不够清楚。人们并不是根据某一特定时期的收入来决定他们在该时期中的支出。自业人员在节日并不挣钱，但花费也许比一年中其他任何时候还要多。理论家们同意收入是一个长期概念，也许要扩展到一个人的终身。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教授创造了“永久收入”这个术语。除非人们认为其收入将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发生变化，否则不会改变其支出格局。

投资是一个更为微妙的概念。高级理论表明，投资由几个不同因素决定。在本文中，利率被看成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如果利率上升，厂商就不愿持有原来那样多的存量(存货)，而可能改变决策，把某些看来不再划得来的投资计划加以搁置。公司总是盯着其所作所为的“机会成本”：它可以是把钱存入银行，而不对新工厂和额外存货进行投资。当利率上升时，银行存款更加具有吸引力。

手中的现金

到目前为止讨论的总需求不能再简单了：它包括消费和投资这两个部分，分别受到收入和利率两个变量的影响。现在引入货币。

有一个古老的玩笑说，三个人在荒岛上野餐，带有一听豆子，但无法把它打开。物理学家提议：“点一把火来煮，直

到把它胀破。”工程师建议说：“找一块石头把它砸开。”经济学家考虑了一下，然后拿出了他的解决办法：“假设存在一把开听刀。”

在简单需求理论的货币部分中所做的假设与此有点类似。首先，货币供给是由政府固定的。其次，价格是稳定的。政府显然难以限制货币供给和避免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适当时候放弃这些假设。暂时而论，它们倒是保持了商品市场（其中消费和投资都被看成是实际价值）和货币市场的一致。

因此，货币需求是对实际货币的需求。它采取两种形式：

第一，交易需求。这是一个简化说法，表明人们需要多少货币可以随时用于支出。收入不是每时每刻领取的（例如月薪酬金支票），但收入的支出却是连续不断的小额。为了方便，就需要现金和银行存款帐户——这是大多数货币供给定义中的两个主要部分。这种货币需求显然由收入的绝对水平决定：国家越富足，支出就越多。

第二，投机需求。如同为了支出需要货币一样，人们也要在持有货币和购买金融资产之间作出选择。经济学家避免使用通常意义上的“投资”。对他们来说，投资意味着实物资本存量的净增加，而不是把银行存款、股票、人寿保险单等等变来变去。

货币的投机需求产生于人们对货币和债券的选择——该理论赋予的简单化选择。这种选择根据利率的变化进行。较高的利率意味着持有债券的收益较高，意味着持有现金或无息银行存款的机会成本较大。因此，当利率上升时，货币的投机需求就下降。

现在，简单的总需求模型正在开始形成。货币的交易和

投机需求这两个金融变量分别受到收入和利率的影响。收入和利率同样影响消费和投资。因此，整个模型能够在收入和利率的共同基础上建立起来。

合 在 一 起

首先观察货币市场对商品市场的影响。如果货币供给增加了，利率会首先下降。低利率促进投资，结果收入上升。但是，这还不意味着达到了新的均衡，因为较高的收入提高了货币的交易需求——这又使利率稍微提高、投资回降。故增加货币对收入的最终促进要比最初提升略小一点。

现在来看商品市场变化对货币市场的影响。如果消费者支出上升了——比如说由于减税——则总需求首先上升。但这会增加对货币的需求，从而提高利率。高利率会减少投资和消费支出。当最终达到新的均衡时，最终增加的需求再次比初始增加要小。当然，究竟要小多少是激烈争论的问题，它构成财政——货币之争的核心。

如果总需求模型再向前发展一步，整个问题就会更加清楚一些。弄清楚货币市场是如何影响商品市场，以及相反，商品市场是如何影响货币市场，这很有用处。而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让两个市场能够同时达到均衡则更加有用得多。这要稍微复杂一点，但值得一做。

在梅纳德·凯恩斯发表其《通论》之后一年，英国另一位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教授（现为爵士）把他认为是凯恩斯理论核心的东西提炼成一幅图。30多年来，这幅图统治了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尽管近年来它已经失去好感，但经济思想中的许多新发展都可以用它的术语加以解释。

希克斯图

希克斯图是从其他两个描述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图发展而来的。图 1 为商品市场。我们从左下象限开始。它表示一个直接了当的恒等式：在45°线上的任意一点都有储蓄(S)＝投资(I)。左上象限表明I是利率(R)的函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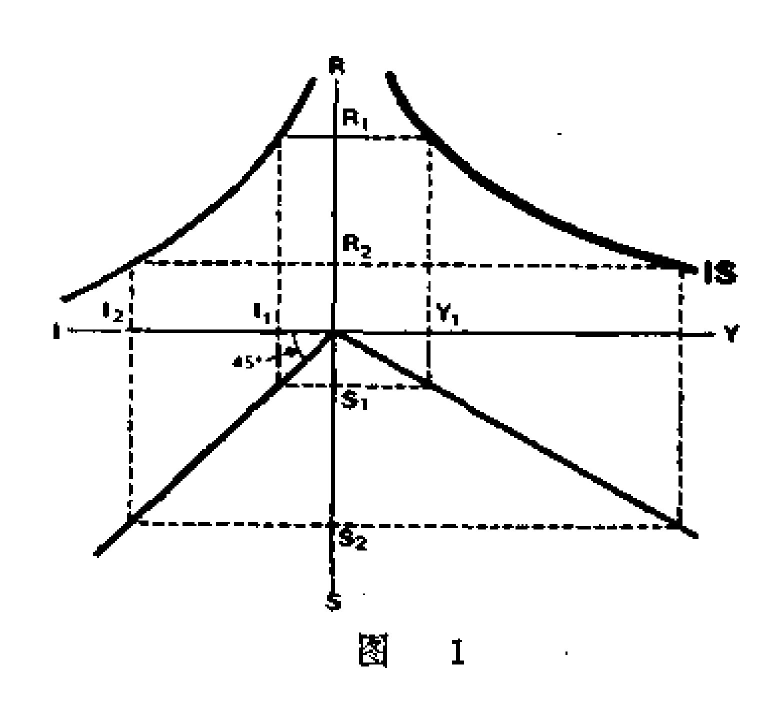


图 1

右下象限是消费函数，尽管这是通过储蓄间接地表现的。随着收入(y)的上升，储蓄也上升，但储蓄的增加要小于y的增加；这样，随着y的增加，消费才有余地也增加。

现在可以利用上述三个象限来填充第四个。右上象限极为重要，因为它包括了收入和利率两个普通变量。

以投资轴上的某一点例如I_1开始。投资函数表明相应的特定利率为R_1。现在往下沿伸到45°线，再横过来到S_1，然

后进入右下象限（消费函数），然后向上沿伸到y_1，从而进入右上象限。当线路通到利率R_1时，商品市场处于均衡的一个特定的利率和收入组合就确定下来了。

可以重复同样的过程：从投资函数上的另一点，例如I_2开始。此时，较高的投资与较低的利率R_2相适应。这将在右上象限确定新的一点。

把两点连结起来就得到IS曲线：它定义了商品市场在利率和收入两者的不同组合上的均衡。

图 2 描述货币市场。这一次从左上象限开始。它表明对实际货币的投机需求随着利率的上升而下降。曲线朝原点凸出。其原因有：（1）当利率很低时，人们对持有货币还是持有债券感到没有偏好，故需求曲线平缓展开；（2）在利率很高时，人们会力图把为投机动机而持有的货币量减少到最低限度，故该需求曲线变得几乎垂直。右下象限为货币的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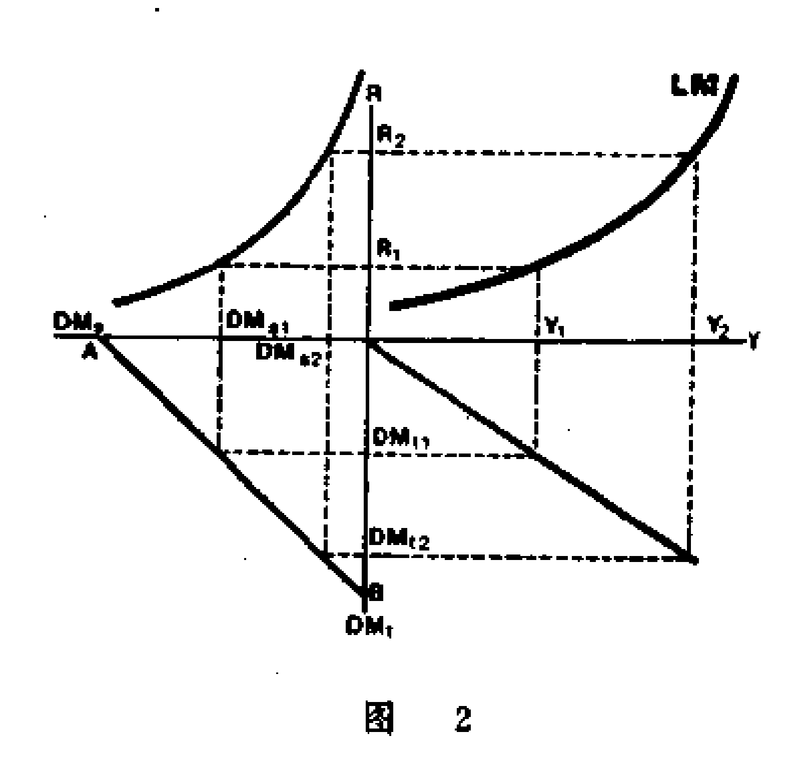


图 2

易需求，它被简单地看成是收入的一个固定份额。因此，它随着收入的上升而上升。

左下象限把上述两个成分合在一起，但其方式不同于IS图表的相应部分。在商品市场上，均衡要求的是计划储蓄等于计划投资——由引自原点的45°线表示。但在货币市场上，均衡要求的却是对实际货币的投机需求加上交易需求等于货币的实际总供给。它由从轴到轴的45°线表示。

例如，该曲线表明，如果货币的交易需求为零，投机需求就必然等于整个货币供给（点A）。同样，如果投机需求为零，交易需求自己也必然等于货币供给（点B）。几何学保证，沿曲线移动的这两个成分的任何组合加起来必然等于同一个总量。如果由于名义货币供给上升而价格不变，或者由于价格下降而名义货币供给不变，货币的实际供给增加了，则45°线就向外移动，进一步远离原点。

上述三个象限再次成为填充把利率和收入结合起来的第四个象限的手段。从DMs_1和利率R_1开始，往下沿伸到货币需求曲线，然后水平过渡到DMt_1，再向上达到y_1，并一直沿伸到R_1的水平。

与上相同，从另一不同点DMs_2和R_2开始，可以得到右上象限中的第二点。把两点连结起来就得到LM曲线，它表明货币市场均衡时收入和利率的所有组合。

现在可以同时处理整个模型。

参见图3。设LM曲线由于实际货币供给增加而向右移动。LM曲线为什么右移？因为利率在实际货币供给增加时下降——促使人们在任何给定的收入水平上持有更多的货币。这一点可以从相反的方向来解释：对任一特定的利率，如果要人们增加货币持有量，实际收入就得增加。

为了更充分地说明LM曲线是如何移动的，请利用图2来弄清楚当左下象限45°线向左移动（表明实际货币供给增加）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当曲线从LM_1向右移到LM_2时，图3表明利率将从R_1下降到R_2，总收入从y_1上升到y_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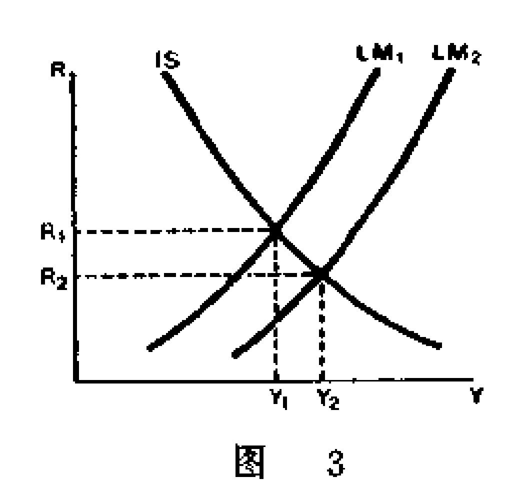


图　3

同样的程序也适用于分析IS曲线的移动。IS右移意味着，在任一给定的利率上，投资和消费需求增加了——例如，由于厂商对利润更加乐观，从而渴望进行更多投资。在LM曲线不变而IS曲线升高的情况下，利率将上升，但总需求也上升。

只要IS和LM曲线具有图3中那样的斜率，上述关于收入和利率的结论就能成立。如果其中任何一个是垂直的，结论就会不同。如果LM曲线垂直，政府试图通过减税来促进需求就毫无意义。它们只会提高利率。同样，如果IS曲线垂直，增加货币供给将降低利率，但不影响总需求。

以后几篇短文将发挥上述理论。现在，集中分析IS-LM模型的一个方面，价格稳定的假设。现在可以放弃这个假设。尽管用现实的通货膨胀来取代这个假定仍然为时过早，但引入价格的一次性变化，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一个颇具启发性的方式。

本文业已表明，当实际货币供给扩大时，总需求增加。这就等于说，当价格下降而同时名义货币供给不变时，总需求增加。因此，就有可能把价格和总需求联系起来，引伸出整个经济的需求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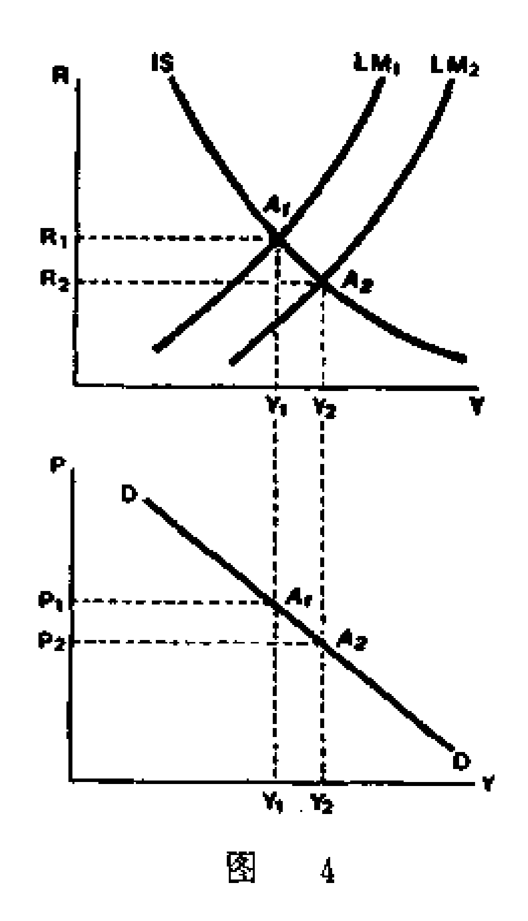


图　4

需求曲线可以从IS-LM模型中引出。从图4的下半部分开始。设价格在P_1的水平上，相应的收入为y_1。

把y_1引到上面的IS-LM图中去。y_1本身与利率R_1相应。整个体系在A_1处达到均衡：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均已结清。

如果价格降到P_2，则在图4上半部分中的LM_1曲线就会向右移到LM_2，与IS曲线在A_2相交。新的利率为R_2，新的收入水平为y_2。在该图的下半部分中，由y_2和较低的价格水平P_2得到一个新的组合：A_2。把A_1和A_2联结起来得到整个经济的需求曲线。

要抓住的关键是需求曲线的基本斜率是从左至右向下倾斜。当价格下降时，LM曲线右移并且利率下降。较低的利率促进投资和消费，从而实际需求上升。

额外需求必须有地方去取得供给。本文自始至终假定，它投向了热切的企业，那些企业能够供给为投资和消费所需要的全部商品和劳务。下篇短文将放弃这一假定，并分析决定供给的诸种因素。如果你已经掌握了这种供给理论，就会发现下一短文简单得多。

冯金华　译自〔英〕《经济学家》1984年9月29日第66—67页

三、建立供给

最简单的经济模型，如果它是有用的话，必须表明需求与供给两者是怎样被决定的。前一篇短文考察了需求，假定凡是需求的东西都能得到供给。这篇短文通过建立经济供给方面的基本模型来检验这一假定。

在标准教科书经济模型中，总需求随着价格下降而上升——总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这不是因为人们在较低的价格时需要更多的产品，例如，当香蕉价格下降时需要更多的香蕉。这是因为较低的价格水平提高了货币供给的实际价值，继而导致更低的利率，然后，又导致更高的消费品和投资支出。

经济理论家只是最近才开始对价格与总供给之间相应联系给予了同样多的重视。他们的供给方面模型集中在三种关系上：工资率变化时的劳动需求；工资率变化时的劳动供给；以及表明一定就业水平生产多少产出的生产函数。下面依次加以考察。

1．**劳动需求**。首先，假定价格不变（这个假定是不现实的）。还假定资本存量是固定的（这个假定在短期是可能的）。追求最大利润的厂商雇佣额外工人，直到边际工人成本（简化为工资率）超过从他生产的额外产出中所能获得的额

外收益为止。

由于资本存量固定，厂商雇佣的第一个工人将容易通过利润检验。但是，渐渐地在一个既定工资上，额外工资不能把产出增加到足以补偿他们的工资这一点将会达到。所以，就业提高到这一点，不再增加了。

如果工资率下降，将发生什么呢？边际工人成本现在将低于、至少等于他能获得的收益，从而，他将被雇佣。较低工资使雇佣更多工人有利可图；同样，较高工资使解雇一些工人有利可图。这样，劳动需求随工资率下降而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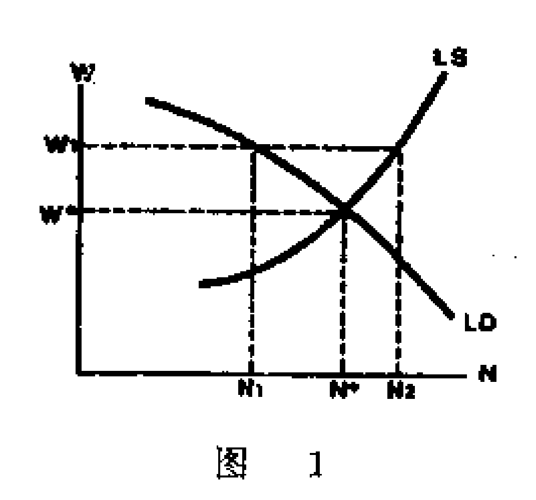


图 1

这种关系可用图1表示。当工资率（W）下降时，厂商想要雇佣的工人数（N）就增加。所以，劳动需求能够由LD线表示；劳动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

2. **劳动供给**。在基本模型中，劳动供给的变化能够采取两种形式。第一，人们能够完全放弃他们的工作（或相反，让失业者获得一个新工作）。第二，现有工人能够增加（或减少）他们工作时数。

按第一种方法，较高工资率确实增加劳动供给。一些以前不愿放弃闲暇而又想去工作的人，将受工资提高的引诱。同样，工资的削减将导致一些人自愿停止工作，从而，减少劳动供给。

按第二种方法，工资率变动的影响不是这样清楚的。较高工资意味着闲暇时间的有效成本的提高：如果闲暇也是商品，那么，它的价格的提高应该意味着人们想对它消费少些，

从而，工作多些。但是，较高工资意味着有工作的人无需加倍努力而生活得更好。他们也许想通过少工作，多闲暇来花费他们更高的收入。

在理论上，这些所谓"替代"和"收入"效应的最终结果是不确定的。但是，在实践上，把整个经济的单个工人反应综合在一起，较高工资几乎确实提高劳动总供给。从而，劳动的供给曲线将是向上倾斜的。如图1中LS所示。如果工资上涨到高水平，那么，高收入对闲暇需求的影响可能使劳动供给增长在比率上有所减少。这就解释了LS曲线的弯曲形状。为了不断增加劳动供给，就得不断地接受更大的工资上涨。（如果收入效应超过了替代效应，那么，曲线不只是变得更陡，它将开始向后弯曲。）

劳动市场在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相交处达到平衡。图1表明为什么如此，例如，如果工资率是W_1，厂商将需要N_1工人（按LD曲线表示）。但是，在这个工资上，N_2工人（按LS曲线表示）想要工作，这就导致了过度的劳动供给。在这个模型中，这个超过额驱使工资率下降；最后，它下降到W^*，消除了劳动过剩。对于工资率W^*和就业工人N^*，劳动市场处于均衡状态。

3．**生产函数**。这些工人生产多少产出呢？这就取决于这个经济的资本存量的数量和质量。这个模型假定这两者都是固定的——经济的实物资产实际上冻结在某一时间点上。由于这个简化，工人数目N与总产出y之间的关系——生产函数——能够被描绘出来，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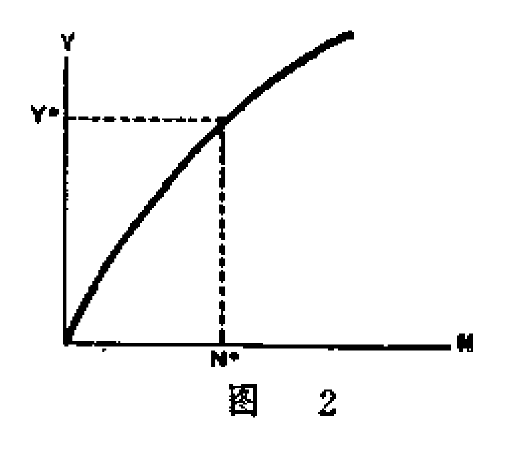


图　2

图 2 所示。

当工人数目增加时，从固定资本存量中生产出来的产出也增加。当 N 低时，每个工人拥有大量的资本，所以，增加工人能大量增加产出。当 N 高时，资本相对稀缺，因此，增加劳动力只能增加较少的产出。报酬递减律的这种运用解释了图 2 中的曲线为什么趋向扁平。

注意，这个基本模型根据假定缺少技术变化理论，从而，对经济增长只字未提。这将是后一篇短文中的主题。这是一个缺陷，但只要这个模型只用于解释短期经济变量行为，这还不是一个致命的缺陷。一个经济在较长时期的发展情况——什么使一些国家富有，使另一些国家贫穷——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样，劳动市场需求与供给确定工作数目，然后，生产函数把这个数目转换成产品与劳务。但是，当价格水平变动时，这个供给曲线将怎样变动呢？换言之，这个经济的供给曲线形状如何呢？这大概是最重要的问题；而且，是现代经济学中争论得最多的问题。

设 价 格 上 升

价格水平变动对生产函数不发生影响，生产函数只简单描述产出和生产要素之间的技术关系。但是，改变价格将对劳动需求和劳动供给两者产生某些影响。

下一篇短文将讨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变化怎样相互影响，改变价格。暂时，假定只是较高价格发生。那么，劳动需求将发生什么影响呢？假定工资率（按货币而不按实际）不变，厂商将发现他们的边际工人现在增加的收益大于雇佣

他们的成本，而不是原来的两者相等。于是，厂商将需要更多的劳动。

劳动的整个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如图3所示。这是因为无论起点工资率是多少，较高价格意味着厂商想要更多的工人。由于劳动供给曲线不变，需要的工人数目从 N_1 上升到 N_2，超过了在工资率 W_1 上想要工作的工人数目。厂商必须把工资率抬高到 W_2，才能吸引他们所需的工人。在 W_2 上，平衡恢复了。新的平衡部分是由于工资率的提高，部分是由于就业的增加。

象以前一样，就业的增加通过生产函数提高产出。图4表示这一情况对总供给曲线意味着什么。对于价格 P_1，就业是 N_1，产出是 y_1。当价格上升到 P_2，通过移动劳动需求，它们提高就业，这又依次提高总产出水平。所以，总供给曲线是向上倾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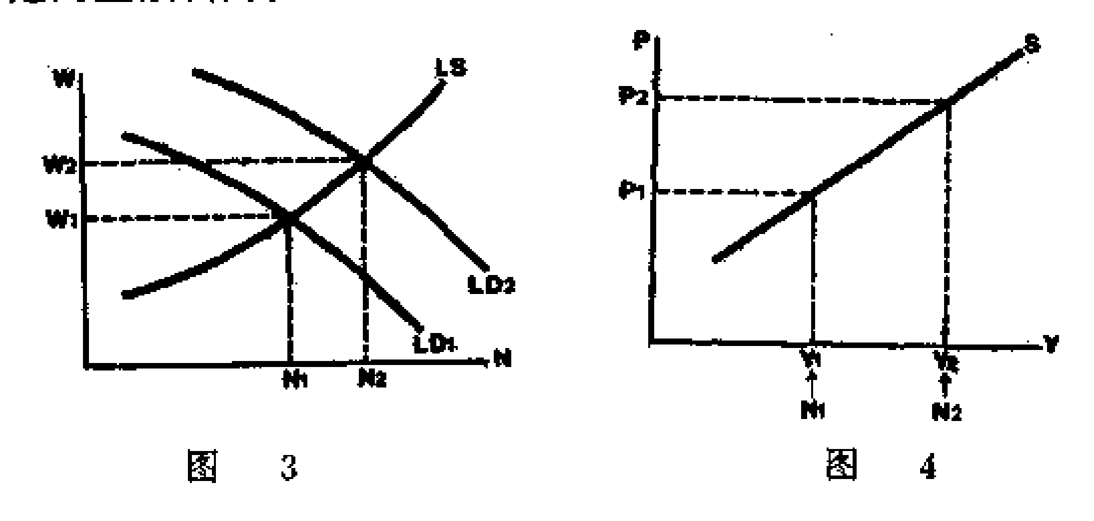


图　3　　　　　　　　图　4

但是，较高的价格对劳动供给影响如何呢？图4假定当价格上升时，LS曲线不变。然而，如果工人以闲暇和消费替代为基础决定供给多少劳动，那么，较高价格由于减少他们货币工资的实际价值就应该导致他们供给较少的劳动。结果，LS曲线向左移动。

图 3 坚持说，如果LS曲线不变，在价格上升后，即使实际工资下降了，工人也会供给更多劳动。价格上升的幅度为LD_1和LD_2之间的垂直距离，而货币工资上升得少一些，从W_1到W_2。

如果工人完全知道整个经济的价格上升，并能按照这个信息行动，那么，当价格上升时，LS曲线就会向左移动，如图 5 所示。于是，劳动市场恰好在与以前一样的就业水平和实际工资水平上达到新的均衡——货币工资从W_1上升到W_2，正好足以抵销价格的上升。

这就使总供给曲线看上去相当不同。价格从P_1上升到P_2，已使劳动市场上的曲线作了大幅度变动；但是，如果供给劳动的工人象需求劳动的厂商同样多地注意着价格的变动，那么，那些变动就互相抵销了。就业水平（在图 5 中决定）不发生变化，从而，产出水平也不发生变化。因此，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如图 6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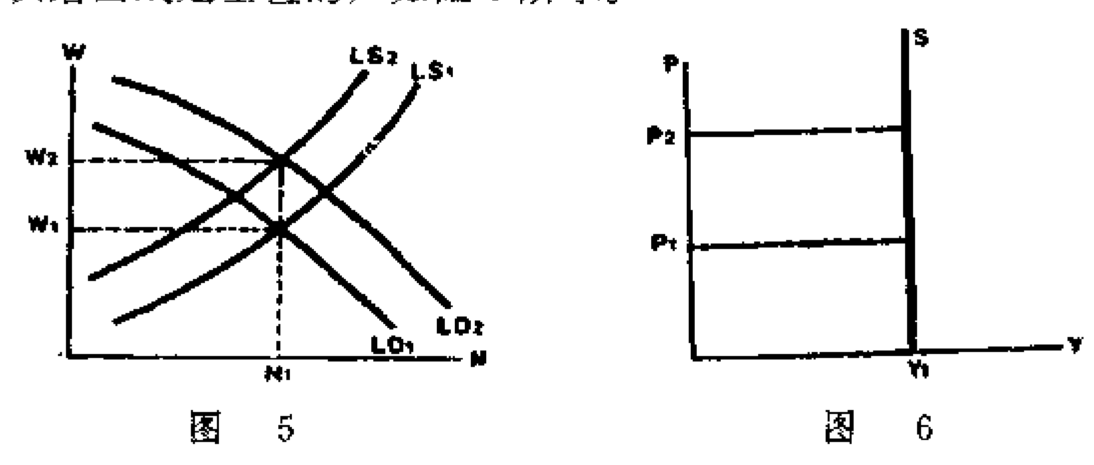


图 5　　　　图 6

凯恩斯的乐观　古典的忧愁

很多教科书把图 3 和图 4 建立的供给模型叫做“凯恩斯模型”，而把图 5 和图 6 建立的供给模型称为“古典模型”。

下一短文将容易看出这些标签为什么适合，但是，知道哪一个模型更接近现实世界为什么如此重要，这一点已经清楚了。

图 4 的向上倾斜曲线给政府通过提高需求，从而提高价格来增加就业和产出的一个机会。这可能把经济从y_1这一点移到y_2这一点，而不损害经济的供给结构。

但是，图 6 的垂直曲线立即排除了通过管理需求和价格来提高就业和产出的任何企图。无论价格水平如何，供给丝毫不能从y_1移动。提高产出的唯一办法是移动供给曲线本身——或者通过改变劳动市场运行方式，或者改变生产函数和增加人均产出。

很多凯恩斯主义者拒绝对其老师思想的这样解释——这种思想是，政府只有通过欺骗工人使其接受实际工资削减才能提高就业。但是，至少在短期，这是凯恩斯主义完全行得通的一种方法。问题在于，厂商对价格变化而进行的调整是否比其工人更快些。

厂商与实际工资的联系可能比工人更密切。雇主特别关心"产品工资"——由他的产品价格变化所降低的货币工资。他常常能在几个月前就相当准确地预测到这一点。

另一方面，工人必须预测广泛的一揽子商品价格，如英国的零售物价指数，或美国的消费物价指数。这是较为困难的。如果他们的预测是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通货膨胀的突然上升，可能发现它们是错误的，使它们暂时处在图 3 中那样的位置上。

可能加快劳动需求调整的另一个因素是，厂商能够频繁地改变他们的价格以适应市场条件。但是，工人一般受较长时期契约的约束，这个契约要延期到下一轮工资谈判才能补偿工资率的变化。

再者，这可能意味着劳动供给曲线暂时固定不变，如图3所示。在理论上，这样的契约能够把"凯恩斯的"特点恢复到"古典的"模型中去。下一篇短文将更细致地考察这个当前经济学研究的活跃领域。

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赞成把工人适应价格变化的能力的两种极端观点（充分灵活性和完全刚性）调和起来。在短期，譬如说两年，他们认为总供给曲线是向上倾斜的，如图4表示的那样。工人不能象他们雇主那样对价格变化迅速作出调整，因为，在那个阶段，劳动契约可能限制他们调整的余地。

但是，在每次价格变动后，总供给曲线开始向上移动，直到垂直。预测误差被纠正了，契约和其他刚性的东西被解除了。在长期（长期究竟有多长还存在着激烈论争），供给曲线将是图6表示的形状。

下一短文把总需求与总供给理论结合起来，结束对基本宏观经济模型的回顾。它将表明这个模型是怎样决定价格的——迄今为止，它们只因假定而发生变动。

附录：选择救济？

按照最简单的总供给理论的支持者的观点，只有当人们愿意失业才算失业。他们的模型不含有"充分就业"定义。假设充分就业意味着短期内最小失业人数，这些失业者就是因为正在改变工作而接受救济的人，即摩擦性失业。那么，这个模型没有把就业提高到那种水平的意图。超过结构性失业最低限度的任何失业都是完全自愿的，而且经济能够处在这种"高"失业的均衡中，因为工人和厂商对这种结果都感

到称心如意。

大多数经济学家发现这是不现实的。但是，改变这个模型是容易的，从而使它可以对在现行工资率下想要而又不能找到工作的人作出解释。假设工资下降受到阻碍——这也许是因为工会的力量、最低工资立法、过分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或者工资攀比和公平工资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不管何种原因，如果工资高于它们的均衡水平，工人愿意供给的劳动将大于厂商想要雇佣的劳动。

如果工资障碍是由货币确定的，这个理论就为政府提高总需求和价格的行动提供了一个根据。因为这将降低实际工资障碍，允许实际工资下降，减少过多的劳动供给。厂商将需要更多的工人，而有些失业者将进行选择：由非自愿失业转到自愿失业。

这个论点有一个缺陷：自从70年代石油价格冲击以来，大多数人已经非常习惯于估计通货膨胀。结果，大部分工资刚性——不论是由工会、政府确定的还是由习惯力量确定的——考虑价格变化。所以，用通货膨胀来破除这个障碍的企图，对削减实际工资毫无效果；从而，对削减自愿失业也就毫无效果。这个障碍必须用别的办法来拆除。

郭熙保　译自〔英〕《经济学家》1984年

10月6日第32—33页

四、供给，满足需求

迄今为止，这些短文对经济的两个部分即需求与供给分别进行了考察。本篇短文把它们连结起来，建立整个经济的简单模型。

较早的一篇短文假定价格变化，探索其对货币和产品市场的影响，得出了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随后一篇短文再次假定价格变化，探索其对劳动市场的影响，得出了向上倾斜的（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是垂直的）总供给曲线。

这篇短文把两条曲线结合起来，看看价格为什么变化，经济如何达到均衡：即需求量等于供给量。本文自始至终假定一个封闭型经济。因为先进的工业国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更加开放的国际贸易，更加受外国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所以，一个重要的漏洞仍然存在。后面的短文试图补上它。但是，这个简单的模型对于明智地讨论经济政策是一个好的起点，一个探讨较新理论的基础。

图1表示一条惯常的总需求曲线和两条总供给曲线。S_k代表凯恩斯的劳动市场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工人对价格变化的反应比厂商慢些，这也许是因为工人在判断实际工资水平时犯了错误，或者是因为他们受到劳动契约的约束，或者是因为其他劳动市场刚性。

S_c线代表古典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工人有完全的预

见，劳动市场对价格变化立即作出调整。或者把S_k看成是短期关系，相应地把S_c看成是长期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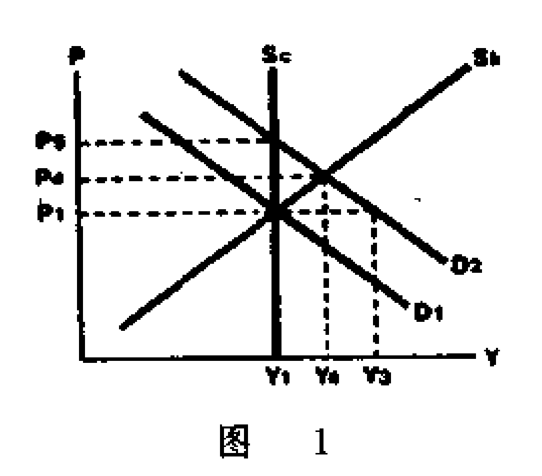


图 1

假设经济处在初始均衡状态，需求量与供给量一致，价格等于P_1，产出等于y_1。如果政府试图通过增加需求来增加产出，把需求曲线从D_1移到D_2，那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图1表明，在商品、货币和劳动市场经过一系列调整后，经济移动到新的短期均衡，或"凯恩斯的"均衡。价格上升到P_4，产出增加到y_4。然后，到一定的时候，经济渐渐趋向于新的长期均衡，或"古典的"均衡。价格进一步上升到P_5，产出回降到它的初始水平。于是，这个模型表明，通过需求管理增加产出的努力最终必定归于失败。听起来熟悉吗？

需求和供给曲线概括了隐蔽在商品、货币和劳动市场的舞台背后的大量活动。为了较好地理解这个模型，务力跟着前一段的内容，运用前几篇短文中概述的IS-LM模型和劳动市场模型一步一步地深入下去，这是必要的。(记住：解释利率与收入组合的IS和LM曲线在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处于均衡的那一点上相交。)

首先，政府如何增加需求呢？一种方法是增加公共支出。至少在最初阶段，它会提高经济中的总支出水平。因此，第一步是政府支出的增加，第二步是商品市场上更高的需求。

图2表示了这一点。在图2中，IS曲线从IS_1移到IS_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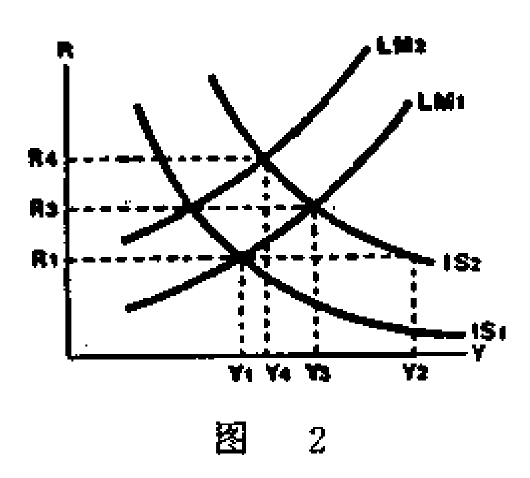


图 2

在最初的商品和货币市场均衡中，利率等于R_1，需求量等于y_1（与图1的y_1一致）。但是，由于利率在R_1上，增加的支出将把需求推到y_2。

即使价格不开始上升，更高的利率也会立即开始削减额外需求。在R_1上，货币投机需求现在高到使与y_2相适应的更高的交易需求得不到满足。利率必须上升到R_3，需求回降到y_3，使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达到平衡。

图2中的y_3与图1中的y_3是相同的。图1表明，需求一方的部分均衡不可能持续下去，因为经济中的总供给仍然小于总需求。于是，价格上升，缩小差距。当经济把D_2曲线移到新的短期均衡P_4和y_4时，进一步调整在次一级供求模型中发生。

在图2的商品和货币市场上，更高的价格降低货币供给的实际价值，再次缩减投机和交易余额。LM曲线从LM_1移到LM_2，把利率推到R_4。结果，厂商减少投资支出，产量需求进一步把IS_2曲线移到y_4——产出的短期均衡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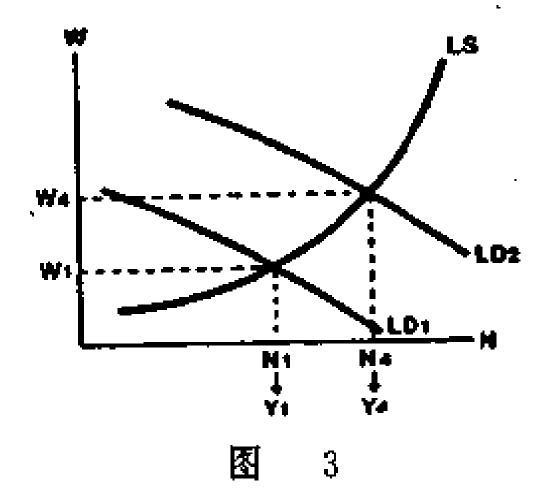


图 3

同时，在图3的劳动市场上，更高的价格降低实际工资，从而，厂商增加他们的劳动需求。图3中的LD曲线向右移动，从LD_1移到LD_2，把就业工人数目从N_1推到N_4。更多的

工人意味着更多的产出供给。所以，在供给方面，最初的产出y_1和供求短期平衡所需的产出y_4之间的缺口也开始弥合了。

这里，我们暂停一下，把新的凯恩斯均衡与初始的均衡作一比较。当价格上升到P_4（见图1）和产出增加到y_4时，所有市场的均衡都恢复了。结果，政府支出的增加成功地增加了产出，只是以更高的价格水平为代价。在商品和货币市场上（见图2），利率从R_1提高到R_4。这样，因最初财政支出的增加而引起的额外需求就被投资的下降部分地抵销了。

在劳动市场上（见图3），新的均衡比旧的均衡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W_4上的工资率比以前高一些，但这只是按货币工资来计算的实际工资已经下降了，因为价格的上升大于货币工资的上升。

不幸的是，这个新的均衡是不持久的。它取决于工人觉得实际工资好象没有下降这一点——或者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它已经下降了，或者因为他们不能或不愿改变他们的计划。但是，当他们调整时，他们就将开始削减他们的劳动供给。从而，图3中的LS曲线将左移。名义工资上升，直到实际工资回到他们最初的均衡位置。就业回降了，产出也回降了。这个过程就形成了图1中的垂直供给曲线S_c。

当劳动市场减少工作机会，产出下降时，为了使供求平衡，价格必须再次上升。这意味着图2和图3要进一步调整（为节省你的眼力，没有表示出来），图2中的LM曲线进一步向左移动，最终在y_1的上方与IS相交。

在劳动市场上，劳动需求再次上升，因为价格从P_4上升到P_5。从而，LD曲线进一步向右移动。但是，现在它被LS曲线向左移动所超过。最后，LS和LD必须在y_1上方，在

名义工资率上相交。考虑价格上升到P_5，这个名义工资率使实际工资没有发生变化。

关于需求管理就说这么多。公共支出的增加提高价格而不会增加产出。在长期均衡中，较低的投资确实抵销了财政总支出的增加。

图 2 表示了这种情况。投资全部被三次较高的利率排除了。首先，利率从R_1到R_3，因为货币需求增加；然后，随着价格开始向上移动，货币余额的实际价值下降了，促使R_3上升到R_4；最后，劳动市场进行调整，价格进一步提高把利率推到更高的水平上，与最后的（也是最初的）产出水平y_1相一致。

如果政府试图通过扩大货币供给来增加需求，那怎样呢？幸而，只增加一个图就将作出回答。总供给与总需求如同在图 1 那样变动，恰好同政府支出增加以后的情形一样。劳动市场也是如此。

但是，商品和货币市场上的情况变化了。图 4 表明货币供给的增加把LM向右移动。从LM_1移到LM_2，在最初利率R_1上，现在有足够的货币供应给y_2产品需求。但是，由IS曲线提供的实际产品需求仍然只是y_1。由于过度的货币供给，利率开始下降。这在两个方面缩减过度的货币供给。第一，随着保有货币的机会成本下降，货币的投机需求上升。第二，当较低利率增加投资和消费时，货币的交易需求上升。

商品和货币市场在y_3（与图 1 中的y_3相一致）达到部分均衡。但是，现在有一个过度的产品总需求，于是，价格开始上升到图 1 中的P_4。货币供给的实际价值下降，从而，LM曲线又从LM_2回到LM_3(图 4)。利率R_3回到R_4，需求产出降到y_4，而且，在需求方面，经济达到图 1 的“凯恩斯”均

衡。

劳动市场（见图3）的力量同时把产品供给移到新的短期均衡。象在财政增加的情况一样，当价格上升到P_4时，就业上升到N_4，产出上升到y_4。货币增加后的停止点（resting place）与等量的财政增加之间的唯一差别是，在货币扩张的情况下，利率更低。结果，产出将在有利于更高的（私人部门）投资和更低的（公共和私人部门）消费而达到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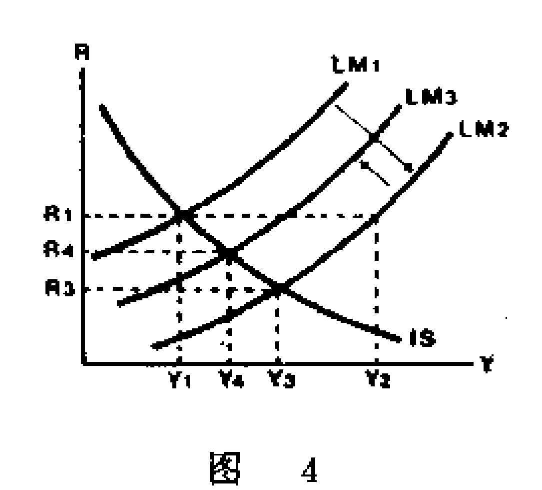


图 4

向长期均衡或古典的均衡转变如同上述。当劳动市场逐渐适应价格第一次上升时，图3的LS曲线开始向左移动。就业回降到它的最初水平，从而，产出也回到最初水平。这就导致经济过度需求（图1），于是，价格必须进一步上升到P_5。这样就第二次削减实际货币供给，从而，图4中的LM曲线回到它的初始位置，利率和需求量回到开始水平。最后，除价格外，所有的重要经济变量都回到它们的起点。

不稳定的通货膨胀

这篇短文的模型是静态模型：它把一个稳定经济均衡与另一个稳定经济均衡进行比较。结果，它适用于分析价格水平的一次性变化而不适用于分析持续上升的价格，即通货膨胀过程。一个通货膨胀的经济决不是稳定的。需求和供给曲线处在不停的运动中。

完全动态模型虽然复杂，但很少改变静态条件下的结论。

例如，在静态模型中，减少失业要求价格一次性上升；在动态模型中，减少失业要求通货膨胀率的上升。类似分析还可以继续进行下去。如果劳动市场的价格预期立即调整，工人自由作出反应，那么，静态模型表明，当价格水平上升时，就业不可能增加。在相应的动态模型中，如果劳动市场的通货膨胀预期立即调整，工人自由作出反应，那么，失业不可能通过提高通货膨胀率来减少。

简单的静态框架（现在有些过时了）只是讨论经济政策的一个起点。后面几篇短文将论述最近的理论发展。有一种观点认为：需求管理可能有效的时期是存在的。有些人否定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总供给曲线即使在短期也是垂直的。另外一些人说，"凯恩斯均衡"与"古典均衡"之间的时期长到足以使需求管理成为必要。已读到这里的读者应该发现，从更新的经济形式中作出选择是比较容易的。

附录：什么是货币主义？

最初，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是关于货币和财政政策的适当作用方面的。作为影响总需求的一种方法，凯恩斯主义者偏爱财政政策（税收和政府支出）；货币主义者喜欢货币政策（利率和货币供给）。为什么？一个有争议的解释几乎把答案集中在IS-LM模型上。

梅纳德·凯恩斯对衰退或萧条的最初分析强调风险——在很低的利率上，人们可能对持有货币还是债券并不介意。这就把经济推到"流通陷阱"，如图5左边所示。因为LM曲线是平伸的，货币供给的变动量会移动LM，但对需求量几乎没

有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沿着平伸的LM曲线移动IS，减税使需求从y_1增加到y_2。

货币主义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另一方面。如果利率很高，货币的投机需求就缩小到几乎接近于零，从而，LM曲线（看图 5 右边）几乎是垂直的。减税所引起的IS的移动对总需求影响极小，而货币扩张所引起的LM 的移动将把需求从y_3增加到y_4。

因此，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的早期争论看来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对 LM 曲线斜率的论证。一个明显的折衷方法是，承认两种理论都有道理：如果在繁荣时利率高涨，就使用货币政策抑制需求；如果在萧条时利率低下，就运用财政政策刺激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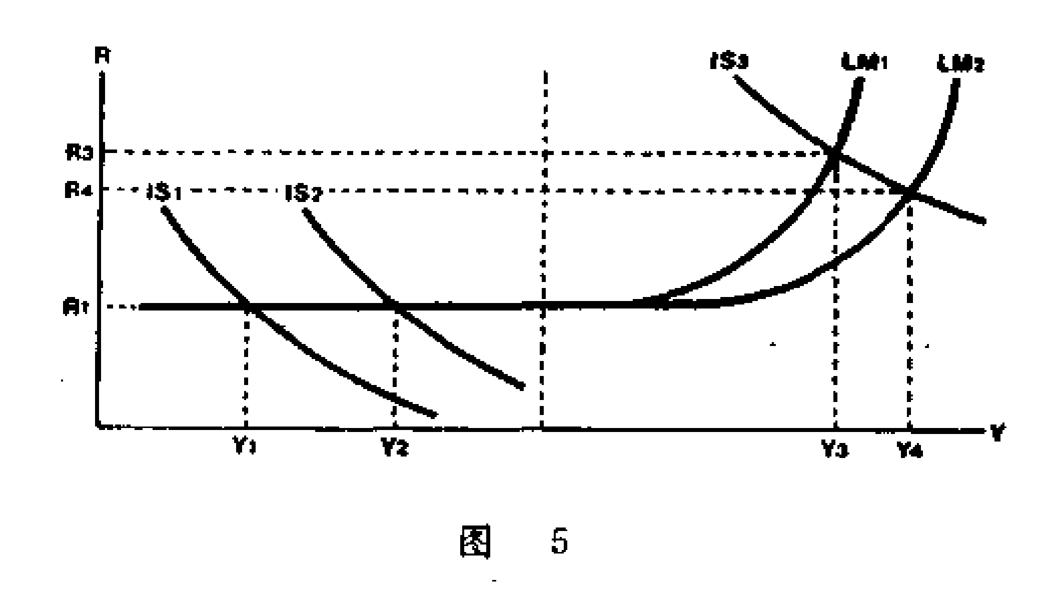


图 5

凯恩斯还想证明古典模型是不一致的。他的论点（再用IS-LM）表述如下：假设总需求下降（譬如说，因为人们突然决定储蓄得更多）。又假设IS曲线向左远移，足以把需求推

向"流通陷阱"。那么，过度供给就一定会及时地开始降低价格，恢复供给与需求的平衡。

古典模型说，并非如此。它坚持认为，较低的价格只有通过移动LM曲线才能影响产出。但是，凯恩斯主义者说，如果LM曲线是水平的，这就毫无影响。经济将长期困扰在萧条之中，这就驳斥了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即在经过一段震荡后，经济就会自行恢复平衡。

这个论战平息了。现在，大多数所谓的货币主义者相信，需求管理只是在短期才能影响产出和就业；而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这个影响可以持续很长时间，是值得的。这样，争论的焦点已经转到模型的供给方面。中心问题是，劳动市场怎样对总需求变化作出反应。经济学家仍然缠住斜率不放。但是，他们现在关心的是总供给曲线的斜率。

郭黑保　译自〔英〕《经济学家》1984年

10月13日第64—65页

五、预期未来

经济学家始终同意，未来影响现在，但从来没有确定以什么方式影响现在。他们费了大量时间试图解释对未来的预期，然后，把这些预期反馈到当前行为中。一种新理论提出，反馈是迅速的，并且具有深远的意义。理性预期理论已为人熟知，它迫使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都得重新评价他们的观点。

经济学家们现在一致认为，甚至最简单的经济理论也得论述人们如何看待未来。他们试图提出定义和测量预期的方法。这些努力是相当新的：在《通论》中，凯恩斯把预期作为外生的，因为他怀疑它们能够被模型化或准确地测量。

例如，外生预期的简单假设引出了第二篇短文论述的基本消费函数：一特定时期的消费是受该时期的收入影响的。但是，终生或“持久”收入决定消费的任何假定都依赖人们如何估量未来收入的问题。

经济学家已提出了各种回答，这些回答主要基于这样一个原则：对未来预期是由过去的经验形成的。这种思想的两种最早的形式是：

1. **外推法预期**。如果利率逐年上升到4%、6%、9%，那么，人们将预期利率在下一年度还会上涨。有些人可能简

单地推断绝对上升——从4%到6%两个百分点，从6%到9%三个百分点，结论是：下一年的利率将会提高四个百分点，即达到13%。另外一些人可能观察变化率——4%到6%和6%到9%都是提高50%。于是推测下一年利率将会跳到13.5%。无论何种方法，他们都在观察过去变动的方向，并且说，这个方向将会持续下去。

大多数外推法预期理论重视近期经验而不重视远期经验。70年代，在英国这样的国家里，很多人可能记得，在50年代和60年代，年通货膨胀只以百分之几的速度进行着，所以，他们不排除这种情况再次出现的可能性。但是，他们更多的是受近期两位数通货膨胀经验的影响，认为这种情况更有可能继续下去。

2. **适应性预期**。外推意味着人们把过去看作为预期未来的方法。然而，这种理论没有让他们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于是，有些经济学家把它加以精炼。他们提出，人们确实利用他们自己的预测错误，得出他们下一步的预测。

这似乎是相当有理的。如果你在赛马场上五次押甲马都输了钱，那么，第六次你大概会避而远之。你也许没有选择获胜的乙马，但你至少避免了你以前的错误。

适应性预期和外推法预期并非截然不同：用数学证明一个适应性预期规则与一种特定的外推法预期规则相等，这是可能的。两种理论都有一个明显的弱点。它们说，一个特殊变量的未来变动只受它过去经验的影响。如果乙马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比赛，那么，任何一种理论都不会提出支持它的缘由。况且，它的过去竞技状况，或缺乏这种竞技状况，都不是支配她未来的唯一因素。

例如，赌博者可能受它的血统影响，或受来自同一血统

的其他马的成功的影响。试图预测甚至只有一个变量的人们也将会考虑许多其他因素，如果他们认为这些因素是相关联的话。这种常识导致经济学家建立一个更广泛的预期理论。

这种新理论就叫做“理性预期”。它最初出现在1961年的经济学文献中，但在70年代中期才成为主要的讨论课题。象宏观经济学的其他新理论一样，理性预期有着强有力的微观经济学根基。它是以一个熟悉的微观经济学思想为基础的，这就是：人们是有理性的，也就是说，他们尽可能地做得最好。作为消费者、劳动者和投资者，他们都注视着市场信号。

理性预期理论认为，人们是通过考虑可以得到的所有信息（包括他们对经济如何运行的了解）来形成对未来的看法的。如果他们象货币主义者那样预测下一年的通货膨胀率，他们就会注意上一年货币供给的增长。认为价格取决于成本的那些人将观察工资、生产率、商品价格等，也许还要加上石油输出国组织石油部长们的声明。

具有理性的人

很多经济学家最初拒绝了理性预期研究方法，主要因为它似乎破坏了凯恩斯经济学，最近的著作表明并非如此。但是，有些经济学家仍然指责这种理论，认为它不是作为对现实的一种合理的描述。他们说，毫无数理经济学知识的人们，不可能、也做不到对经济中可利用的所有信息进行筛选，并且从这堆混乱的信息中产生一个（譬如说通货膨胀的）合理的预测。

理性预期支持者回答说，这是不必要的。经济预测部门

现在处在繁盛时期，它的成果广泛地向社会公布，甚至在流行报刊上公布。但是，批评家也许回答说，预测专家也从来不能意见一致。有些是凯恩斯主义者，有些是货币主义者——他们不可能都是正确的，他们的预测不可能都是合理的。这种非难可能过分夸大了预测的不一致性——一两年之后，他们通常向同一数字接近。更为重要的是：

1．　人们之间的预期彼此可能不同，但是，如果他们是使用不同的信息，那么，他们仍然是合乎理性的。当把这些单个人的预期加在一起，误差就趋于抵销——对未来产生一个总的看法，这个看法是对所有可利用信息的反映。(用数学术语说，这就是著名的大数定律。)

2．　理性预期理论并没有说人们不会犯错误，而只是说，当他们掌握了改正错误所需的信息时，他们不会年复一年地重犯同样的错误。

对理性预期的这种辩解使很多经济学家心悦诚服。这种理论有一个直接的含义。人们依靠的信息越准确，未来越少使他们感到意外。因为考虑到了未来，他们已调整了他们目前的行为。

从这个观点出发，经济学家提出了“随机行事”理论，用来解释股票价格的涨落。股票市场具有充分的信息，操纵着这个自变量，今天的股票价格就是它的具体表现形式。所以，它们是明天价格的最好向导，引起它们变动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新的信息，它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

对于想要在股票市场和货币市场上赚钱的那些人，这样的分析有一个暗含的教训：除非他们对将要发生的某件事情有更内部的信息，否则，他们不会赚到钱。一旦这种信息为人所知，他们就会以可测方法变换市场。对于其他人，赚钱

的机会稍纵即逝，以致于他们实际上不存在。这里有一个关于理性预期的笑话：一个经济学教授与一个眼睛敏锐的学生一起在校园里散步。这个学生指着地上说："瞧，一张五英磅的纸币。""不可能。"这个有理性的教授回答说，"如果它是的话，那么，它此刻就已经被人拾起来了。"

他的回答强调变换市场的信息必须真正是新的，而不是人们能够预期的那些东西。一个明显的不利事件——罢工、利率上升——常常使股票价格不变。这是因为市场预期它将要发生，价格已作了调整。

理性预期支持者说，同样情况对其他经济变量也是正确的。他们并不要求每个人都有完善的预见。假设是适度的：人们只是犯随机预测错误，而不是犯重复发生的有规律性的错误。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现行一套价格——汇率、利率、工资、产品价格等——就将会进行不断的调整以适应未来。

为了理解这种理论的含义，把它简单地运用到三个熟悉的领域：

1.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蛛网模型。大多数经济学教科书含有图1所示的蛛网模型图，这个模型表明有些市场从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不稳定地运动着。如果土豆的供给因受灾而从 Q_1 减到 Q_2，市场将会离开均衡，价格从 p_1 上升到 p_2。在这个价格上，农民将种植更多的土豆，而消费者需求更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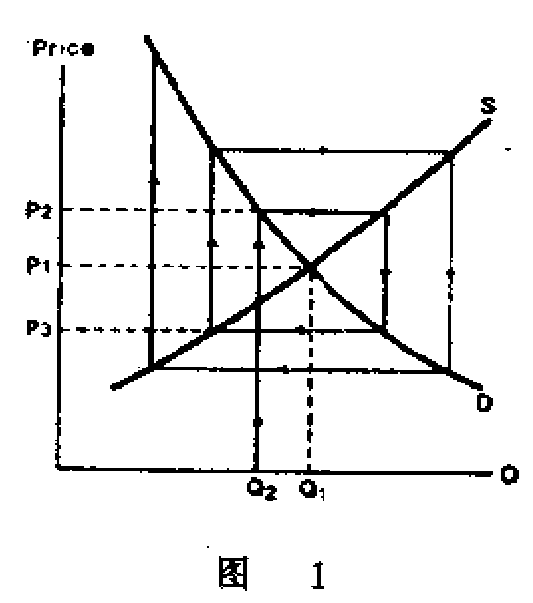


图 1

土豆。于是，第二个收获季节使价格下降到p_3，阻止农民种植更多的土豆。这样年复一样，价格将在均衡点周围跳动着，并且跳动的幅度一年比一年大。

理性预期对这种情形提供了一个回答，它说，生产者能够看到很远的未来。农民意识到，在受灾后种植得更多只会使下一年的市场供过于求，使价格下降，从而使他们损失货币收入。所以，他们将直接回到均衡点：在受灾后的第二年里种植Q_1数量的土豆。换言之，蛛网模型采用生产时滞，而理性预期表明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必要存在的信息分歧。

2． **通货膨胀**。如果每个人都相信：较快的货币增加将会导致较快的价格膨胀，那么，他们将会预见到这些后果。当中央银行开始加速货币增长时，储蓄者将立即需要更高的利率，而借款者愿意支付，因为他们准备支付的实际利率与货币扩张前的相等。货币市场将使这个国家的汇率下降，（假定其他国家的货币增长速度还没有这个国家快。）工人将要求更高的工资，而雇主愿意支付，因为他们同时正在提高他们的产品价格。

事实上，每个人都在采取行动来加速他们预期的通货膨胀。如果他们即刻采取行动，那么，即使在极短期，他们也将阻止更快的货币增长变为更高的实际支出。简单地说，“通货再膨胀”就是通货膨胀。

3． **经济预测**。传统的预测模型常是以过去的行为（这个过去是指某些经济政策正在实行的过去）为基础的。如果这些政策继续下去，模型可能给未来以精确的指导。但是，如果政策改变了，将发生什么情况呢？预测专家所提出的问题究竟是他们模型中的哪一个问题呢？理性预期理论说，那么，模型的结构将发生变化，从而预期未来的尝试将建立在与现

在毫不相干的过去这一基础之上。这个论点最初是由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先生在1976年提出来的，它对预测的有效性表示严重的怀疑。大多数预测专家已试图在形式上把预期包括在经济计量方程式中，以此来回答这一非难。

理性预期方法的这些和其他一些含义将在以后几篇短文中常常出现。这种方法已帮助对不同的经济思想流派之间的新边界进行解释。(这些将在附录中叙述。)它是经济理论在过去10年中的最大发展——并且，争论的时间比这10年长得多。

由于它的重要性，可以容易设想，论述理性预期方法比理性预期方法论述得更多些。在这一阶段，必须强调，这种理论不是简单地依靠人们是否迅速进行调整。调整是有代价的——对商店的产品标上新的价格，把新的目录送给顾客，重开工资谈判，给你的银行写信要求把货币转换成存款，等等。人们可以正确地预测未来，但仍然决定延期作出反应。如果延期成本小于即时调整，那么，这样做是符合理性的。

附录：挑选一种学说

对人贴标签常常能够引起误解。但是，为了使后几篇短文更好地明白易懂，这里对现代经济思想的三个主要（非马克思主义）流派作一简要的叙述。

1． **新古典学派**。这个流派的领袖是两位美国人：罗伯特·卢卡斯教授和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帕特里克·米弗德（Partrick Minford)是

主要人物。新古典经济学家相信：(a)预期是有理性的；(b)市场迅速结清。这一点的意思是，意愿买主和意愿卖主讨价还价，最后双方满意——因为工资和价格可以上下变动。

这两个假定意味着，政府不能利用财政和（或）货币增加来提高产出和产业。结果，非自愿失业只能在短期内发生，而且只有一个原因：因为工资是很少固定不变的，工人由于猜错了均衡工资率，可能暂时地要求更高工资而陷于失业。如同理性预期理论所说：他们不会持久地犯错误，非自愿失业不会长期地持续下去。所以，失业趋向于它的"自然率"。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某些人愿意失业，譬如，因为他们能够从失业救济和其他国家补贴中获得比从工作中更高的可支配收入。

2. **货币主义者**。最著名的货币主义者是过去长期在芝加哥大学、现在加州胡佛研究所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英国的信徒包括艾伦·沃尔特斯(Alan Walters)爵士，他曾经是撒切尔夫人的经济顾问。货币主义者相信，经济有一个充分就业的自然趋势，但是，这可能花费几年时间才可达到，因为价格和工资调整是缓慢的。有些货币主义者认为预期是有理性的；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包括弗里德曼先生）倾向于把预期看作是推断性或适应性的，这是经济可能缓慢地恢复到充分就业均衡的另一原因。

一些老货币主义者仍然认为，因财政支出增加而发生的通货再膨胀将提高利率，但不增加需求，因为LM曲线(参看第二篇短文中的基本IS-LM图形）是垂直的。但是，所有新老货币主义者相信，需求（无论财政需求还是货币需求）增加的唯一持续的效应表现在价格方面，因为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这样，他们认为试图调整需求毫无意义，而拥护一个稳定的和缓慢的货币增长率。

3. **新凯恩斯主义者**。这个术语适用于几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国的劳伦斯·克莱因(Laurence Klein)和詹姆士·托宾(James Tobin)教授，英国的约翰·希克斯爵士和詹姆士·米德(James Meade)教授。他们也相信经济趋向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但是，经济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达到它，除非政府在衰退时期增加需求。他们说，这将在增加产出方面是有效的，因为短期总供给曲线从左至右向上倾斜。但是，在长期，他们与新古典学派和货币主义者一致认为供给曲线是垂直的，从而，产出只能通过提高生产率而增加。

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充分就业，因为工资和在较小范围内的价格刚性阻止市场结清。一些新凯恩斯主义者把这个刚性看作是预期无理性的证据；在预测需要什么价格和工资去结清市场时，公司和工人没有从他们错误中吸取教训。大多数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预期是有理性的：障碍在于工资，它们是如此刚性——由于契约、最低工资法、工会权力等等——以致于阻止人们甚至想要工作也得不到工作。

处于困境的财政部长们试图把他们的经济引向非通货膨胀的增长。对于他们来说，这些区分意味着什么呢？对经济政策的流行讨论仍然围绕着凯恩斯主义（旧式的）和货币主义（旧式的）两大对立派别进行。但是，大多数学院经济学家认为，区分再好也是无关紧要的。区分再坏也不过是令人误解。他们已经接受理性预期方法，把它溶合在新古典和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之中。这有助于突出两个流派的真正分歧：市场是否结清。

郭熙保　译自〔英〕《经济学家》1984年10月20日第68—69页

六、再论需求

本论丛的第二篇短文描述了基本的需求理论，这里考察修正和改进了的需求理论。

当理论发展时，它们并不一定变得更复杂，它们可能简单地引入更为现实的因素，而变得使人更为熟悉和更易接受。在需求理论中，前篇短文提出的基本观点保持不变。需求仍被分为两个主要成分：消费和投资。总需求曲线仍然是从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收入随价格的下降而增长。

在那个一般的理论结构内，研究者们注重更精确地说明决定消费和投资的因素。他们的努力是理论和经验的混合：提出似乎有理的理论，然后加以检验，看它们是否符合经验证据。消费和投资的统计材料是丰富而且相当可靠的。但是，有些理论难以表述成适合于检验的形式。

先说消费。最简单的模型（消费由收入决定）已经在三方面得到提炼。首先，引入其他的影响消费的变量；其次，把收入变为一个长期的概念；再次，应用理性预期理论。

1. **新的变量**。经济学家们长期以来认为利率影响消费。以一个极端情况为例，假如经济中所有其他情况不变，而利率增高1倍，那么人们就得到更大的储蓄刺激，因而放弃一些消费。这表明，当实际利率上升时，人们将增加储蓄；当实际利率下降时，人们将减少储蓄。但情况并不一定

如此，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英国，实际利率长期处于负值，但个人储蓄率却上升。对比之下，在20世纪80年代初，实际利率是正值，而且较高，储蓄率却下降(见附图)。

这两个时期的不同情况表明通货膨胀的重要性，它对储蓄和消费具有独立的影响。因此，经济学家们区分了：(1)描述利率变动对消费影响的财富效应；(2)表示价格变动对消费影响的实际余额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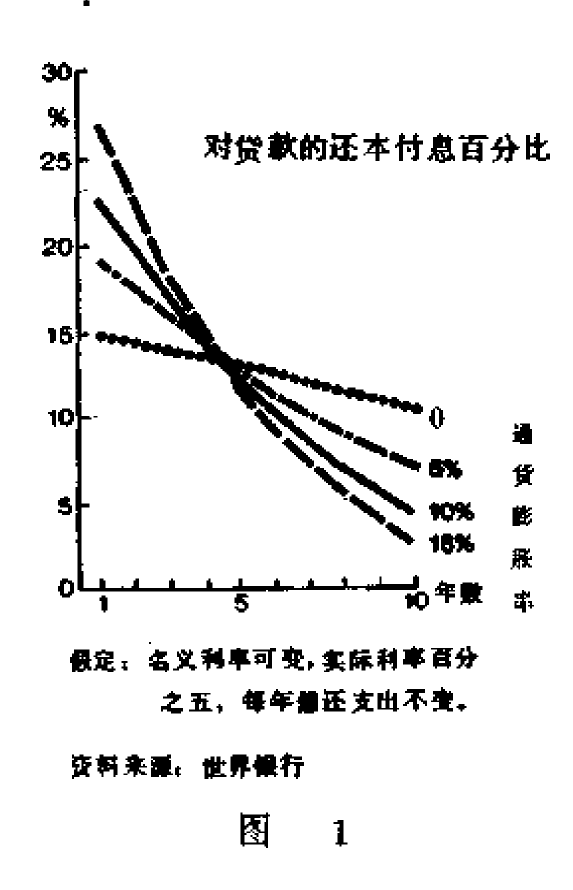
为了查看财富效应是怎样发生作用的，假定价格水平不变而利率下降。这就增加了债券和其他资本资产(如房屋)的价值，使人们感到更为富裕。这也降低了借款的成本。作为实际利率下降的结果：消费者支出更多。

实际余额效应也能引起消费的增加，但这是由于实际利率上升。为了明白这种反常的结论是怎样得到的，我们假设价格下降。这样，人们拥有的货币余额的实际价值将上升，这就直接增加了人们的财富。即使名义利率不变，消费者支出也会增多。

这些都不是结论性的。于是经济学家已开始更多地注意通货膨胀影响消费的另一个方面，它与实际利率的变动无关。设想你得到一笔100镑的货款，规定每年归还10镑，共10年还清，同时每年必须对尚未还的余额支付利息。如果实际利率固定为5%，并且没有通货膨胀，你在第一年就要支付15镑(10镑本金和5镑利息)。但假如通货膨胀率为15%，第一年就得支付25.50镑(10镑本金加上20镑利息，再按15%的物价上涨率折扣)。

即使实际利率不变，较高的通货膨胀也意味着偿还负担的前移一开始几年(实际)偿还额高，最后(实际)偿还额低。

图1表示这种“前后负担差(front-end loading)随着通



假定：名义利率可变，实际利率百分之五，每年偿还支出不变。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图 1

货膨胀率的上升而增加。通货膨胀上升越快，借款者在开始几年为偿还贷款而必须储蓄越多，从而留作消费的收入越少。对整个经济来说，通货膨胀的这方面影响是很难进行预测的。尤其是，它要依靠人口统计——有多少青年人在成为大借款者，同时有多少中年人和老年人在还清最后一笔贬值的抵押贷款。

这些不同的影响有助于解释英国过去10年的个人储蓄行为，在70年代中期，因为通货膨胀提高了偿付贷款的成本，降低了货币余额的价值，所以尽管负利率出现，储蓄率仍然上升。人们以非常流动的形式保有部分储蓄，以准备购买耐用消费品，或者支付每季度的煤气费和电费。

当这些价格迅速上升时，人们可能决定增加他们的储蓄，甚至作为其收入的一个比例。因此，尽管负的实际利率表面上使借款和支出、而不是使储蓄具有吸引力，但更强大的力量却在推动储蓄。

2． **长期的收入和消费**。第二篇短文中提到，持久收入假定最先由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提出。他认为，人们在任何一年的支出并不取决于当年收入的大小，而是取决于人们相信他们一生的年平均“持久”收入的大小。如果人们的实际

收入低于持久收入，就会借款来弥补这个差额；如果实际收入高于持久收入，就会进行储蓄。

这一理论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英国和其他许多工业国中的储蓄行为。70年代中期是人们应该重新估价他们的持久收入的时期，较高的石油价格和较高的失业结束了"丰裕时代"；许多人不再相信他们的实际收入将年复一年地稳定上升。如果人们相信他们的持久收入将缩小，人们就马上减少消费并开始将现有收入的一大部分用于储蓄。

长期收入的概念自然依赖于人们对未来收入状况的预期。弗里德曼教授最初的著作基于适应性预期模型：人们会对他们的持久收入作最好的猜测，并且任一时刻都不期望这一收入变动；如果经验一再证明人们错了，人们就会改变其猜测。

现代更多著作通过引入理性预期而扩充了这一理论。

3. **理性预期**。这一理论假定，一般说来个人对其持久收入最好的猜测是极其完善的。这种猜测既符合全部有关的历史信息(例如，迄今为止的个人的职业和收入获得的方式)，也符合全部可以获得的未来情况的信息(例如薪金的多少、个人的抱负和可能的纳税途径)。事实上，一般人没有理由要改变其持久收入的观点，因而没理由改变其消费。他在今年支出的数额是他明年和以后各年支出数额的最好指导。消费是一个随机行事。

象其他随机行事的变量一样，持久收入和消费能被新的信息所改变。例如一场战争的爆发将使人们放弃（至少推迟）增加收入的计划；突然发病也有同样的影响。但是，大量经常发现的无意义的信息不会使人感到意外，因此不会改变消费。

这个结论对于制定经济政策和稳定整个经济具有重大的意义。所有长期的收入和消费模型都表明个人的消费不会有多大变化。个人越容易发现在生命早期可借款使实际收入等于持久收入，个人消费的变化将越小。当消费遵循一个稳定的过程，当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2/3时，整个经济就显得相当稳定的了。

但是，这种令人放心的说法依赖于人们所抱有的预期。对弗里德曼基本模型提出的适应性预期来说，实际收入的变化得持续一段时间后，人们才能认识到持久收入已发生变化了，从而人们的消费调整则更慢。如果某人的实际收入在一年中上升100镑，开始时他可能全部储蓄起来。只有当他相信他的持久收入已上升了100镑时，才会支出更多一些。换言之，他的边际消费倾向开始为零，扩大收入对消费支出不产生任何乘数效应。

就理性预期而言，乘数则可能大不相同。这时，个人有充分根据相信增加的100镑将持续到未来岁月，因此马上改变其对持久收入的估计。在这种情况下，他在第一年就会支出那100镑的一部分。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大于零，他增加了整个经济支出的乘数效应。这是同凯恩斯的消费者行为模型相一致的——这是理性预期实际上能够加强凯恩斯分析而不是毁坏它的一个重要例证。

投资观念

直到大约20年前，经济学家们习惯于把投资当作对资本品支出的流量，正如把消费当作对消费品支出的流量一样。这种方法发生了变化，现在把投资看作两种资本存量的差

额：即厂商实际拥有的资本量和厂商想要拥有的资本量之间的差额。

这种新观点（行话称为“存量调整”）可以应用于其他的一些经济变量。后面的一篇短文将用这个方法来讨论政府预算赤字对经济其他方面的影响。在这里，这一方法能使我们更简捷地掌握投资概念，特别是在惯用的利润最大化厂商结构中，这一方法使投资分析简便易行。

当购买一单位新增资本的成本等于该新增资本取得的新增利润（未来利润以适当的利率折算为现值）时，公司就得到所想望的资本存量。如果资本边际成本低于资本未来利润的贴现值，公司就会购买更多的资本——即投资。要注意，这里是净投资；而总投资总是在不断进行着的，因为公司总要不断重置已用旧的那部分现有资本存量。当然，即使这样，他们也只有认为这样做是有利可图的，才愿投资。

这一模型阐明了投资主要受三个变量的影响：（1）资本品的价格；（2）利率，这是因为利率决定未来利润是否足以偿还那些购买增多资本的贷款；（3）投资预期利润。如果一个公司处于均衡状态，即实际资本存量等于意愿资本存量，那么只有这三个变量的一个或几个发生变动，才能使公司偏离均衡。

公司回到均衡的速度有多快呢？或者说，投资对任何一个变量的变化，其反应时间是多长呢？假设第三个变量变动：由于外在原因（如新技术）发生变化，使公司对未来的利润更加乐观，公司就想要增加投资。但是，由于供应资本品的工业不能满足所有追加的需求，因此新增需求导致物价上涨。这就迫使一些公司推迟他们的投资计划，直到资本品的价格跌回。

现在引入理性预期。正如这种理论认为消费取决于个人一生的收人那样，理性预期理论强调投资的长期因素——未来利润现值的关键作用。它还把这种现值当作所有可用信息的综合来对待，只有当事先没有料到的事件突然发生时，这一现值才会变动。

图 2 和图 3 说明投资怎样对新信息的出现作出反应。它们是以一个假定为基础的，这个假定是：当均衡受到干扰时，资本品的价格是调整最快的变量。它们从“稳定状态”的投资开始，这时公司拥有他们想要有的资本存量，只进行重置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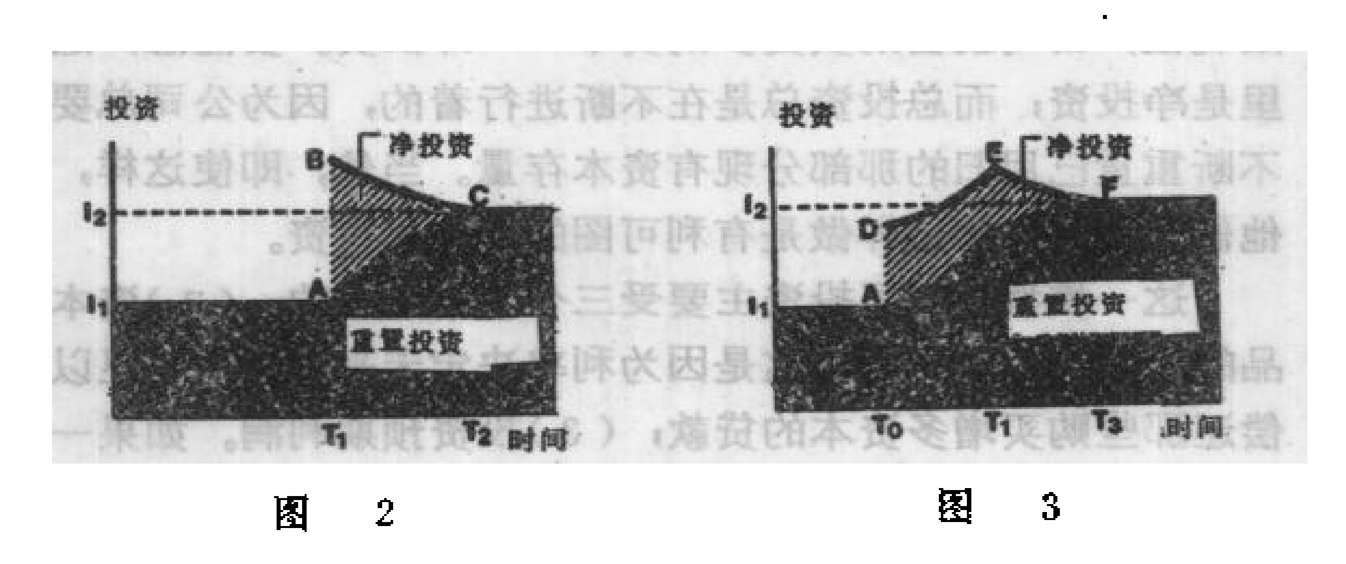


图 2　　　　图 3

图 2 使利率在 T_1 阶段下降，而没有一个公司预先料到。然后，厂商想要增加投资。资本品的价格迅速上涨。因为较高的价格带动了较多的供给，使实际投资也上升——从 A 上升到 B。在一段时期内，厂商进行净投资，同时也进行更多的重置投资(因为资本存量更大了)。净投资和重置投资的实际划分可以用数学计算出来，但 A C 线相当近似这个划分。

不久，厂商已完成他们所要增加的投资，又回到稳定的重置投资线上。这条新线 I_2 当然高于原来的线 I_1。

现在假定在图3中利率的下降不是没有预料到的。尽管利率下降实际上到T_1期才发生，然而在T_0期公司已预测到了。公司意识到，一旦利率下降发生，资本品的价格就会上涨。公司认为早买将会省钱。然而，并不是每个公司都在T_0期购买更多的资本品。这有两个原因：（1）不是所有厂商从增加一单位资本中获得相同的报酬率，获得最高短期报酬的厂商将得到首先行动的最大刺激。（2）某些厂商要直到利率实际下降后，才能够负担更多的投资。在T_0期的现有利率水平，他们会觉得购买更多的资本品不是有利可图的。

趁早购买资本品的那些公司确实在T_1期以前抬高了资本品的价格，但这时的价格水平，却没有每个公司都等着利率下降后才购买资本品时的价格上升那么高。所以，T_0期的投资就从A上升到D（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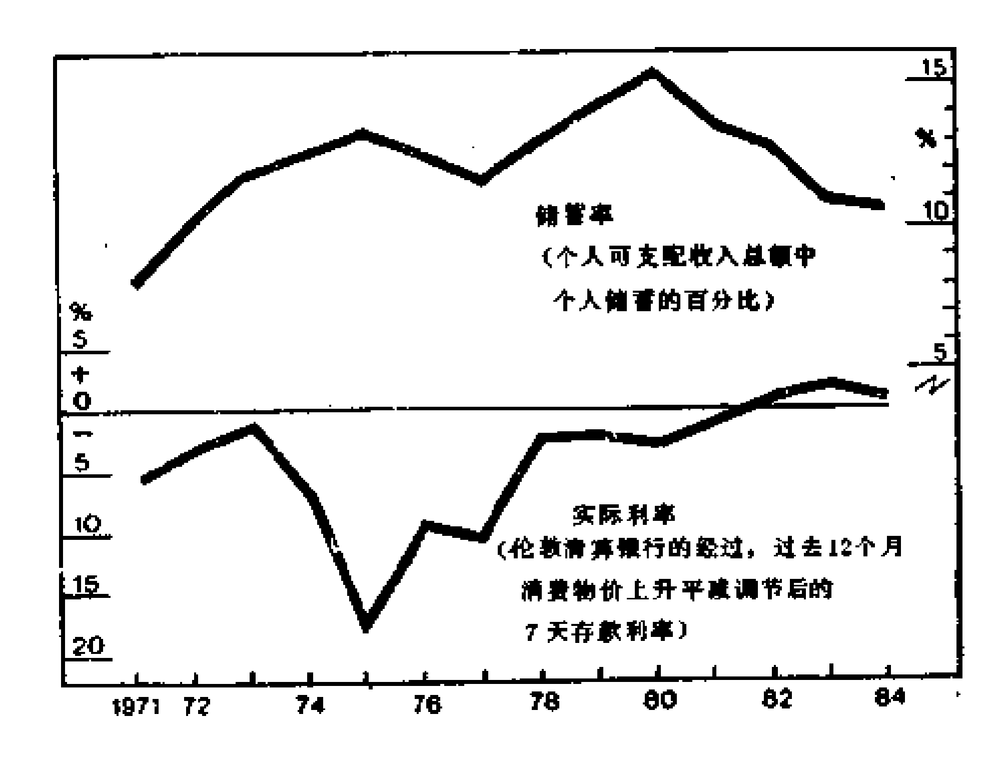
在T_0期与利率实际下降的T_1期之间，因为现行利率将很快变化，更多的厂商认为他们能够买进增多的资本品，因此投资逐渐上升。如同上面一样，部分增多的支出是由于资本品存量扩大而增加的重置投资。AF线表明净投资和重置投资的划分。

到利率下降时，投资已上升到E。象图2那样，投资接着就开始下降，直到公司回到更高重置投资水平的稳定状态。

理性预期分析与厂商只受过去经验影响的模型相比，其投资可能更不稳定。但是在理性预期分析中，投资不象消费那样是一种随机行事。区别在于公司已经掌握不确定的将来某些方面情况（另外两种不同情况是对将来不确定的东西或者全知道，或者全不知道，消费者就属于后者）。厂商可以推测资本品价格，一些相信价格将马上上升的厂商就会投资，

其他指望价格下降的厂商就推迟投资。

附图：英国储蓄者的反应



王诚　译自（英）《经济学家》1984年

10月27日第64—65页

七、赤字的作用

简单的经济模型有一个重要的缺陷，即它们忽视了一个方面：政府的预算赤字会创造出新的为私人部门持有的金融资产。

前几篇短文讨论了政府政策在经济中的作用。它们假定政策制定者可以不顾政府预算的情况如何而能够随意地增加公共支出或削减税收。但财政部长的任务却不能如此简单。

让我们考虑增加公共支出的情况。假定政府先前的收支相符（预算平衡），那么，支出的增加就会产生预算赤字。这笔赤字必须筹措资金：或者增加货币供应（印钞票），或者出卖政府债券（借款）。

政府为赤字筹措资金的需要并不直接影响前几篇短文提出的模型的供给方面，但对需求方面却具有重大影响。最近的理论扩展了IS－LM结构来表示这些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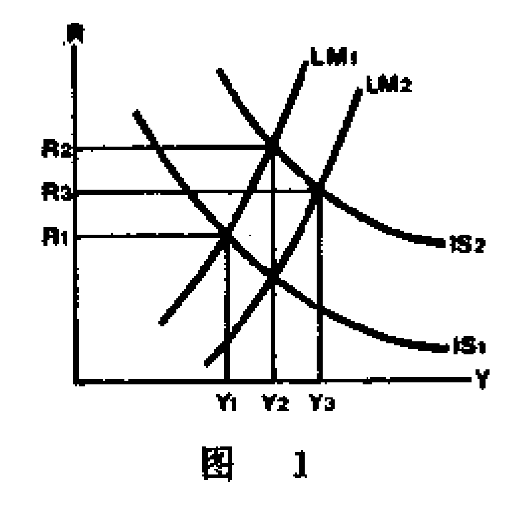


图 1

在图1中，经济的需求方面最初处于均衡状态，利率为R_1，需求量为Y_1，在这一点上，假定预算赤字为零。如果这时政府增加公共支出，IS曲线就会由IS_1移到IS_2，

需求量上升到Y_2。然而，较高的公共支出意味着政府现在发生了预算赤字。假如政府以创造货币的方式来为赤字筹款，那么LM曲线就会从LM_1移到LM_2，更进一步扩大需求量。

只要预算赤字持续下去，而且政府选择印钞票的办法来弥补赤字，那么LM曲线将持续向右边移动。但是有两个因素会逐渐减缓这一移动过程，而使经济停留在新的均衡点上。

（1）需求增加促使物价上升，降低了货币供应的实际价值，于是阻止LM曲线右移。这个通货膨胀过程（总需求曲线促使总供给曲线向上移动）在本论丛的第四篇短文中已经详细论述过了。回想一下：关于凯恩斯的总供给曲线，需求的扩大既提高产量也提高物价；而在古典的情况下，只有物价提高。

（2）如果追加的需求带来追加产出，那么，这将通过增加税收而减少预算赤字。随着LM曲线的右移，预算赤字不断下降，最后，即使价格不上升，经济仍会达到一个新的产出水平——在这个水平上，预算赤字为零。货币供应不再需要增加；经济又回到均衡状态。

一种解释认为，简单的IS－LM模型暗含着一个假定：即政府不是通过印钞票，而是通过出卖债券来弥补赤字。这就是当IS曲线右移时，利率为什么上升的原因——利率越高，刺激人们持有债券越多。但事情到此还未完结，因为人们购买债券，增加了他们的财富。由于金融资产存量在增长，经济不可能停留在均衡状态。

那么，政府债券存量日益增加的影响是什么呢？如果私人部门感到更富有，就会增加购买物品的支出。这样，由债

券筹款的预算赤字把ＩＳ曲线进一步向右移动（而不是简单模型设想的不再变动），从而使需求增加更大。

初看起来，从基于债券筹款而使人们更富有的财政政策中获得需求增加似乎是重复计算。如果人们已把钱借给政府用于公共支出，他们怎么还能自己来花这笔钱呢？

设想一下这样一种经济（仍不存在国际贸易）：政府没有收入，也没有商品和劳务需求；私人部门持有收入100英镑。私人部门在自己的产出上支出70英镑，储蓄（即在投资品上支出）30英镑。然后政府决定支出10英镑并且从私人部门借款来筹集这笔资金。

政府支出直接有利于私人部门，使其收入上升到110英镑。私人部门将可能以过去相同的比例进行储蓄——33英镑，其中10英镑用于新的政府债券上的支出。剩下的23英镑用于投资品上的支出。这个数额比过去的少，这是因为政府为吸引公众购买它的债券而不得不提高利率，从而排挤了一部分私人投资。

假设下一期政府支出降回到零，消费将发生什么变化呢？财富效应理论认为，由于私人部门现在拥有10英镑的金融资产（以政府债券形式保持），因此消费将会提高。消费者感到更富有，因此从现在起他们将把收入（比如说）71%用于消费，而只把29%用于投资。这就增大了消费倾向，致使ＩＳ曲线右移。

用债券来为赤字筹款会使私人部门更富有，这种理论在算术上可能是完善的。但是，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教授争辩说，这种理论在经济上是错误的。巴罗教授使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首倡的一种观念得以复活，因此，他的观点被人们称作“新李嘉图主义”。

6

巴罗的论点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相当一致，其内容如下。当政府出卖债券为它的支出筹款时，人们意识到政府将不得不对其债券还本付息(直至偿清)。而政府收人唯一确定的来源就是税收，因此增加借款同时意味着更高的税收。所以，私人部门并不把债券购买当作财富增多，而是当作增税的预兆。为了准备增税日子的到来，人们就减少消费，增加储蓄，消费减少量刚好等于政府支出的增加量。

结果，不但没有消费上的财富效应，而且也没有熟悉的乘数过程的需求扩张。通过出卖债券来增加公共支出的效果，正象政府直接提高税收来弥补增加的支出以保持预算平衡的效果一样。

假如赤字通过增印钞票来筹款，那么情况又如何呢？对巴罗教授来说，回答是一样的。社会上有理性的人知道，增印钞票将会同时增加通货膨胀，这又会减低他所持有货币的实际价值，因此他就决定储蓄更多以保持他的实际现金余额，结果他的消费马上低于没印钞票时该有的水平。

在巴罗教授做出他的分析之前，反对新李嘉图观点的明显论点是，与不征税相比，延期征税是一个次优的办法。如果今天的消费者知道，预算赤字将提高的是后代人的纳税负担，就没有理由去增加他们自己的储蓄。因此，预算赤字在短期具有乘数效应，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是有效的。

巴罗教授争辩道，并非如此。如果家庭关心其后代，他们实际上就不会被时间所限制。父母们知道今天预算赤字的增加会使儿女们将来面临更高的税收，就马上储蓄更多，以便给子女留下更大一笔遗产。父母们减少消费将消除赤字扩展效应。

象大多数关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争论一样，这种理论似乎

把经济学家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该理论显然是正确的，另一派则认为该理论是荒谬的。耶鲁大学持批评态度的詹姆斯·托宾教授认真地研究了这一思想的长期情况，并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这里指出两条最重要的意见。

（1）有些家庭没有孩子，即使有孩子的家庭，并非所有父母都关心当孩子们长大能为自己挣钱时他们的纳税负担将会如何。面临较低的税收和借款支出的政府，这些人会支出更多，而以后代更多税负为代价。

（2）即使人们长生不老地生活下去，他们也可能愿意提前支出。生活标准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大多数子女比他们的父母生活得更好些。今天的消费者可能欢迎新预算赤字，接受后代馈赠的这一礼物，否则他们将会遭受相当大的困难。如果这样，较高的预算赤字就不会产生较高的储蓄，因而总支出的增加就不会被抵销。

关于赤字是否会创造财富的争论还在继续下去。但是假定：(a)由债券筹款的预算赤字确实增加了私人部门的财富；(b)增多的财富确实把ＩＳ曲线移向右边。图２表明最初的财政扩张把ＩＳ曲线由IS_1推到IS_2，然后由于财富效应发生作用，ＩＳ曲线又被推到IS_3或更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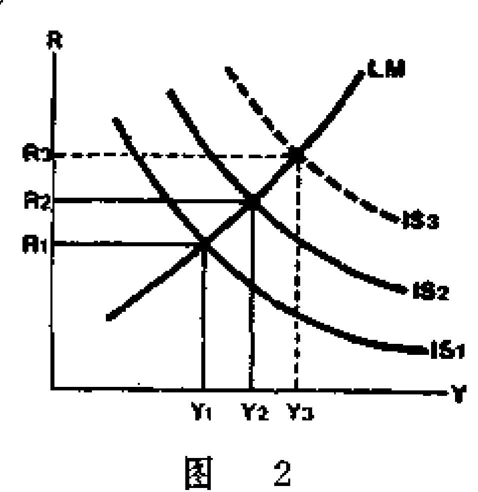


图　2

上面提到：从货币筹款的赤字中增加需求一开始就缓慢，随后便停止下来了。保证这种情况发生的那两个因素，在债券筹款的情况下将会发生同样的作用。

（1）提高需求意味着整个经济出现过度需求，增加价

格上涨的压力。较高的物价降低了货币供应的实际价值，把LM曲线移向左边。所以，IS曲线的右移表示的收入效应至少部分地被左移的LM曲线所抵销。较高的物价由于降低债券财富的实际价值，还直接减缓IS曲线的移动(见附录)。

（2）由于较高产出意味着较多的税收，因此当IS曲线右移时，预算赤字逐渐下降。这样，即使没有物价上涨，经济最终也会停留在这样一种产出水平：赤字消除、经济中的金融资产存量不再发生变动。图2表明IS曲线首先从Y_1移到短期均衡的Y_2，然后缓慢地移到长期均衡的Y_3，在这点上较高水平的产出被假定带来了足够多的税收，把预算赤字减到零。

到此为止，这个模型的稳定性是没有疑问的。债券筹款的公共支出增长的效果比简单理论表明的要大，并且经济通过适当的过程仍会达到均衡。

但是，如果LM曲线有财富效应，情况又会怎样呢？传统的货币需求理论强调货币的交易需求，而对货币作为财富储藏的作用几乎不予重视。但最新理论强调货币正是另一种金融资产，尽管它有自己的特点。这意味着，当人们增加他们的财富时，也会增加对货币的需求，以保持一种资产组合的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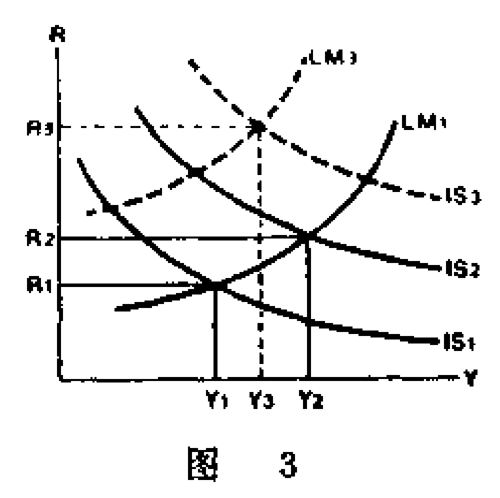


图 3

如果这种“资产组合平衡”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财富效应就会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把LM曲线移向左边。图3表示了这种具有自我修正特点的经济模型所含有的困难。如果因为由增发政府债券而引起的财富增

长，使预算赤字把LM曲线向左移动的幅度大于把IS曲线向右移动的幅度，那么，需求量就会从短期均衡Y_2下降到一个新的位置Y_3。

在这个较低的产出水平上，由于税收更小，预算赤字比在Y_2时更大。IS和LM曲线一定会再次移动，进一步减少产出，提高赤字等等，如此继续下去。这种形式的调整导致预算赤字持续增长，经济离开金融资产存量不变的均衡状态越来越远。

由于IS曲线的财富效应，价格的变动可能阻止或改变这个过程。当产出下降时，价格也降低。价格的降低会提高货币供应的实际价值，于是图3中的LM曲线又回移到右边。但是，在原则上，仍然不能保证这些力量的最终结果不是产出的加速下降。

实际上，经济并没有显示出这种灾难性的不稳定。然而知道稳定不能从理论中推导出来，却是重要的。这个模型阐明了弹性价格在试图恢复均衡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如果产出的下降不能相继引起价格下降，那么经济更可能不稳定。

附录：合格的标准

最近几年关于经济政策的讨论，大多集中于预算赤字的规模问题：里根总统财政政策的批评者认为，赤字太大了，而撒切尔夫人财政政策的批评者则认为，赤字太小了。然而，何者为“大”何者为“小”呢？经济学家们试图从两个方面调整实际赤字数额。

第一，周期调整。设想这样一种经济，在经济周期的整

个过程中政府不改变它的政策。这实际上意味着衰退时期出现大赤字而繁荣时期出现小赤字(也许出现剩余)。当经济发展缓慢下来时，较高的失业将提高公共部门对社会救济的支出。这对失业来说是再慷慨不过的决策了。衰退会自动减少财政收人，因为税收比不衰退时低。反之，在经济繁荣时期，政府支出减少而政府收人却上升。

这表明赤字的变动有两个原因：第一，经济周期中经济状况的自动变化，称为周期赤字。第二，政府政策的变化，称为结构赤字。计算这两个部分的大小可能是一种碰运气的事情。通常的办法是用一个大模型来模拟充分就业的经济状况。充分就业赤字和实际赤字之间的差额就是周期赤字。充分就业赤字本身的变化则等于结构赤字的变化。

麻烦在于这些估计值严重地依赖于你所选择的模型。象这几篇短文中提出的这种粗略的模型是肯定不适当的，因为它们没有表明经济活动是怎样影响特定的税收项目。但详尽的模型却经常与经济运行的状况相背离。更主要的是，谈论周期赤字和结构赤字的划分有什么用处呢？全部赤字都必须筹措资金，而且两个部分都对利率上升施加压力。结构赤字表明这种压力有多少可以归咎于政策变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周期赤字在经济上是不重要的。

第二，通货膨胀调整。考虑到通货膨胀，这表明了专注于一部分赤字的理由。政府支出货币并不单是购买商品和劳务。政府还必须支付国债的利息。进一步看，这种利息可分为实际报酬率和因通货膨胀而支付给债券持有者的补偿金。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观察和控制的真正赤字是名义赤字减去债务利息中的通货膨胀部分。他们认为，重要的是未偿付债务实际价值的变化。代数可以证明，这种变化正是经过通货

膨胀调整后的赤字（名义赤字减利息支付中的通货膨胀部分）。如果政府使通货膨胀调整后的赤字等于零，那么未偿付债务的实际价值则保持不变。各年的名义赤字当然等于利息中的通货膨胀部分——粗略地说，等于未偿付债务价值乘以通货膨胀率。

这意味着，在一个发生通货膨胀的经济中，平衡名义预算是一种比初看起来更具有束缚性的政策。例如，当政府考虑到借款所产生的利率压力时，这种压力真正的指示器是债务的实际价值。如果通货膨胀率高，则政府债券的名义存量的实际价值就低。因此，高通货膨胀能够提高新债券的（名义）需求，而政府就可以借款更多而不致引起利率上升。

王诚　译自〔英〕《经济学家》1984年11月3日第44—45页

八、扩大供给

前面一篇短文探讨了总供给的基本理论。本篇着眼于供给方面研究的某些应用及进一步的发展。

70年代期间，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对需求理论注意较少，转而对供给理论注意较多，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石油价格两次大规模上涨使经济学家们大惑不解。石油冲击确实有很大影响。但是，专心致志于总需求的研究，使人难以预见其后果会是如何。经济学需要供给方面理论来说明这样的冲击怎样能够解释“滞胀”——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并存。

为简单起见，以一个本身不产石油的工业国伐克脱利亚（Factoria）为例。石油涨价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影响这个国家。首先，伐克脱利亚会减少用油，因此（至少在短期内）一定量的劳动力就只能生产较少的最终产品。这种影响相当于图 1 的生产曲线向下移动。

其次，因为石油更昂贵了，伐克脱利亚的企业每增加一个工人所生产的收入将减少。因此，劳动的边际产品下降，这就等于把图 2 中的劳动需求曲线由LD_1移到 LD_2。两个变化加起来，把产量首先由Y_1减少到Y_2，然后再减少到 Y_3，把就业工人数由N_1减少到N_3。

下面假设总的价格水平不变。图 3 表明低产量（Y_3）和不变价格（P_1）这个组合对应于总供给曲线由 S_1 移到S_2。

下一步骤我们在前篇短文中已经熟悉。在P_1上，伐克脱利亚经济需求过度，因此价格开始上涨。经济只是在P_4Y_4点上才回复到均衡。故石油价格冲击提高了价格，降低了产量——需求分析不能解释这个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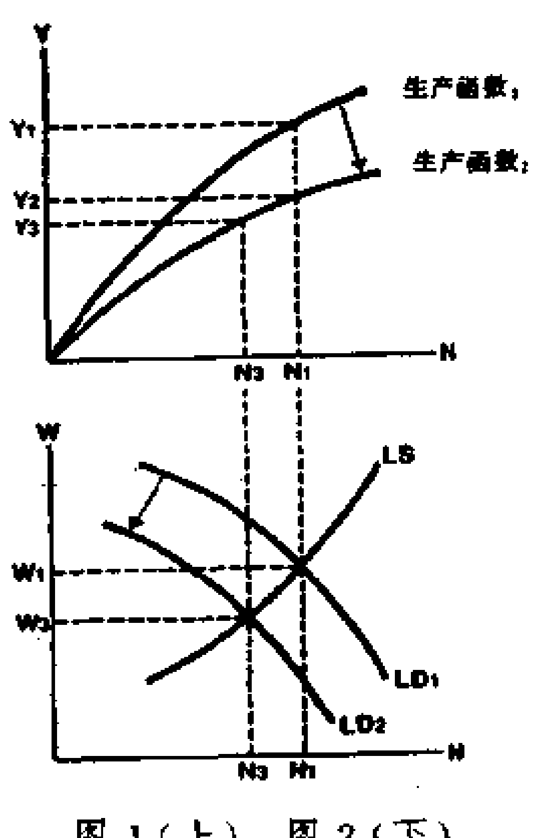


图 1（上）　图 2（下）

工人情况如何呢？伐克脱利亚的就业是否由于石油价格猛涨而下降？图 1-3 提供了理论工具，但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要明确这一点，请看图 1 。产量处在Y_1到Y_3间的某处，但是如果产量最终是在Y_2之上，那么就意味着就业水平大于N_1开始的位置。因为生产函数已经向下移动，所以就业可能更高，尽管产量已经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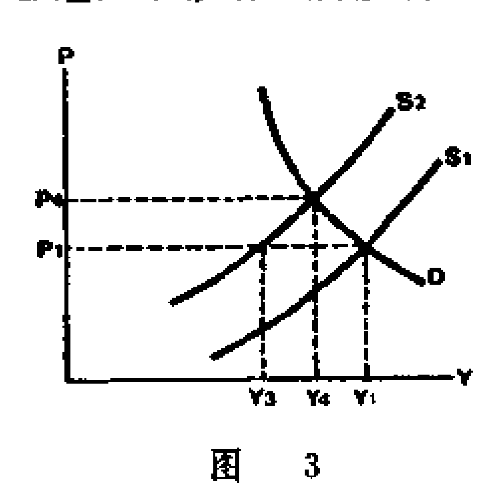


图　3

图 2 提供了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如本论丛第四篇短文所说，劳动市场通过劳动供求曲线的移动而调整到一个位于较高价格水平的新均衡，较高的价格使企业愿意按现行工资率雇佣更多的工人，因为劳动的边际产品已经上升。较高的价格可能使工人愿意减少劳动供给，因为相对应每一名义工资率水平，实际工资都降低了。因此在图 3 中，要从Y_3上升

到Y_4，图2的LS和LD曲线都向上移动。

最可能的结果是新的就业水平位于N_3和N_1的某处。但是，如果LD向上移动很远，而LS曲线仅向上移动少许，则新的曲线就可能在图2中N_1右边的某一点处相交。这就意味着就业水平比石油冲击以前更高。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因为昂贵的能源刺激了伐克脱利亚的企业以劳动力替代能源。

当然，这是"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即非垂直的总供给曲线。在总供给曲线垂直的古典理论中，有关就业效应的模棱两可的解释是不存在的。正如本论丛第四篇短文所表明的，如果劳动市场立即适应价格的变化，图2中的就业就不会上升到N_3以上；石油冲击一发生，就业马上就会下降到N_3水平。从那一点开始，LS和LD曲线上升，在图3中价格上升到P_1以上时，保持实际工资不变。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古典模型比凯恩斯主义的长期经济模型更为真实。令人沮丧的是：象石油这样必不可少的进口品相对价格上升会永久地提高失业水平，这一点果真确实吗？除非工人乐意象以前那样卖力干活并满足于较低的实际工资，否则回答就是肯定的。

这种态度变化会使总供给曲线（在"凯恩斯主义的"和古典的两种模型中）移回右边，恢复就业。但是劳动供给的狭隘理论认为个人是在闲暇和收入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它无法找到态度变化的原因。当实际工资下降时，劳动供给也下降。如果这种理论是正确的，它有助于解释70年代的"滞胀"。

菲利普斯曲线的后嗣

本论丛所有短文都运用了一种称做比较静态的经济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假定经济震动（政府政策变化，石油价格变化等等）将经济由一稳定位置移向另一稳定位置。但是在实际上，经济从来没有静止过，用行话来说，它是“动态的”。最艰深的现代理论大部分是探索这种动态学。一条较简单的思路重新解释了旧的统计关系——菲利普斯曲线，进一步阐明了经济的供给方面。

原始的、为人熟悉的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是在1958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它把通货膨胀（严格说来是工资变动率）对失业的关系绘制成曲线，结果发现，当通货膨胀高时，失业率就低；反之亦然。这种关系许多年来在不同的国家好象都曾存在。这似乎意味着政府能够通过忍受稍微高一点的通货膨胀来减少失业。

到了60年代后期，那种令人愉快的关系不再成立。在长期中，菲利普斯曲线似乎向上移动了。因此，一特定的失业水平就与越来越高的通货膨胀率相对应了。经济理论对此怎样解释呢？

在动态经济中，当产量、就业和实际工资水平不变时，工资和价格都能够增加。实际上，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在长期中会同时向上移动。如果经济不断增长，产量和实际工资也能够持续上升。如果产量的年增长率为3％，价格可能每年上升5％，工资可能每年上升8％，就业水平保持不变。

菲利普斯曲线理论背后的关键思想是，工资的增长率要依赖于劳动市场松弛程度。如果劳动供给大量过剩，将对工

资——价格螺旋上升产生强烈的抑制作用。而劳动需求过度则加速工资——价格螺旋上升。这些短文描述的经济模型的新要素是：假定失业率（用来衡量劳动供给的过度）对工资（以及价格）的变化率有影响。

但是，对未来价格上涨的预期也影响工资变化率。在某个既定失业水平上，如果工人预期价格要上涨10%，他们就会要求提高工资10%，这就极大地改变了菲利普斯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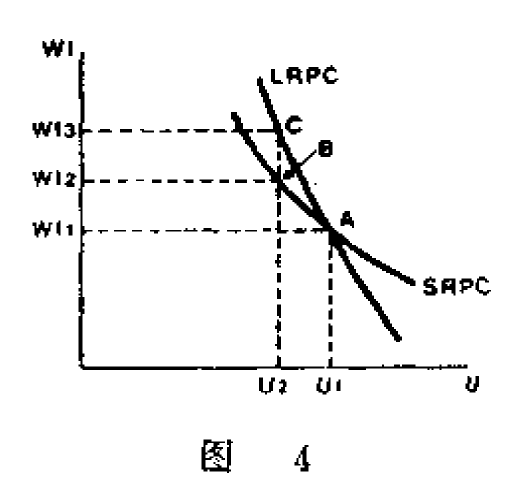


图 4

图 4 表明短期菲利普斯曲线（SRPC）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LRPC）。假定经济位于短期曲线上的A点，政府决定扩大需求以便将失业率由U_1削减到B点的U_2。较低的失业率意味着较松弛的劳动市场，因此，工资膨胀从WI_1上升到WI_2。

但是，在一定的时候，成本推动的工资膨胀的压力也使价格膨胀率上升，这又反馈到工资需求上，推动工资膨胀再次上升，上升到C点的WI_3。连接A、C两点，得到长期曲线。长期曲线提供的就业和价格之间的替代关系的吸引力是不大的。某些经济学家认为，长期曲线是垂直的，在这种情况下，交替关系完全消失。

甚至这种长期关系也依赖于价格变化和工资变化之间的时滞。该理论认为，因为工人从来不能充分地调整他们的工资要求，在短期内，通过主动的政策刺激所引起的价格变化不会反馈到工资要求上去；而在长期内，也只有部分反馈。

现在来看理性预期。如果工人正确地预期到政府减少失

业企图的通货膨胀效应，价格上涨立即就会被全部加到工资需求上，阻止实际工资增长的任何下降——这是创造新就业的先决条件。

因此，如果（1）预期是理性的，并且（2）企业和工人能马上对他们的新预期作出反应，那么，即使在短期内，菲利普斯曲线也是垂直的，政府仅仅让通货膨胀上升到 WI_1 以上，并不能将失业压到图 4 的 U_1 以下。如同第五篇短文中所讨论的另一例子一样，在已经结清的市场中理性预期效应是把调节从长期过程缩为一瞬，从而使依赖时滞才有效应的政策没有用处。

在理论家所谓"预期加菲利普斯曲线"和总供给的古典模型之间，存在着明显联系。两者都意味着，失业有一"自然率"；任何通过需求的提高来使失业率下降到自然率以下的企图，都只能是提高通货膨胀。因此，自然率有时又叫做：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the 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或简写为NAIRU。

上述理论并非说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是固定的。因此：若有人问：当实际失业率波动如此剧烈时，怎么可能存在"自然"失业率呢？这样的问题就是没有问到点子上。供给方面的冲击可以移动总供给曲线，提高或降低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这样，劳动工人的劳动——闲暇偏好亦可以改变。

这些理论更难回答的是另一方面，该问题为政府管理需求的企图提供了一个更强有力的理由。为什么许多国家的企业在萧条期间喜欢减雇劳动，而不是削减工资（或工资增长率）来降低他们的工资单？

在70年代，许多经济学家试图解释工资（和一般价格）

是怎样由于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合同而具有粘性的：

第一，企业并不认为失业工人可以完全替代在业工人，也不认为新近雇佣人员可以完全替代有经验的职员。高级工人需要特殊的技巧，雇主要在失业人员中找到资历较深的工人会花费很大。这就赋予熟练工人在企业内一定程度的垄断力量。他们能够利用这种力量将工资率提高到边际新工人的收入之上。

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会影响就业的模式。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萧条时期，而且也发生在繁荣时期，即使当时的劳动市场处于紧张状态，企业也能避免大量增加工资。它们知道，它们的高级工人不会另谋它业——因为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他们就成了新工人，从而他们会失去从现在雇主那儿得到的额外酬劳。

因此，“公平竞争”要求防止熟练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结果，企业在萧条时期只有解雇最不熟练的工人，才能节省工资单上的货币。大多数企业执行的确实是这样“后进先出”的解雇政策——这是企业与高级工人之间的默契，是使企业改变就业、而不是改变工资率的明显证据。

第二，企业比工人更喜欢冒险。就其本性而言，企业家是冒险家。而且，他们有进入资本市场的良好机会，这就允许他们作出选择，分散风险。工人则不能做到这些。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能够利用这种差别，向工人付给实际上是部分属于工资加部分属于保险服务的混合报酬。如果企业保护工人使报酬免于波动，工人就愿意接受较低的平均报酬。结果，企业有明显的动机使工资保持粘性。

但是对于工人来说，好处不那样明显，企业还必须对其产品需求的变化作出反应。如果使工资率不变，他们有时就得

改变所雇劳动力的数量；而在衰退中被解雇的工人，面临的报酬波动会比他们争取的要大得多。那么，为什么工人偏好失业机会相当小的可变报酬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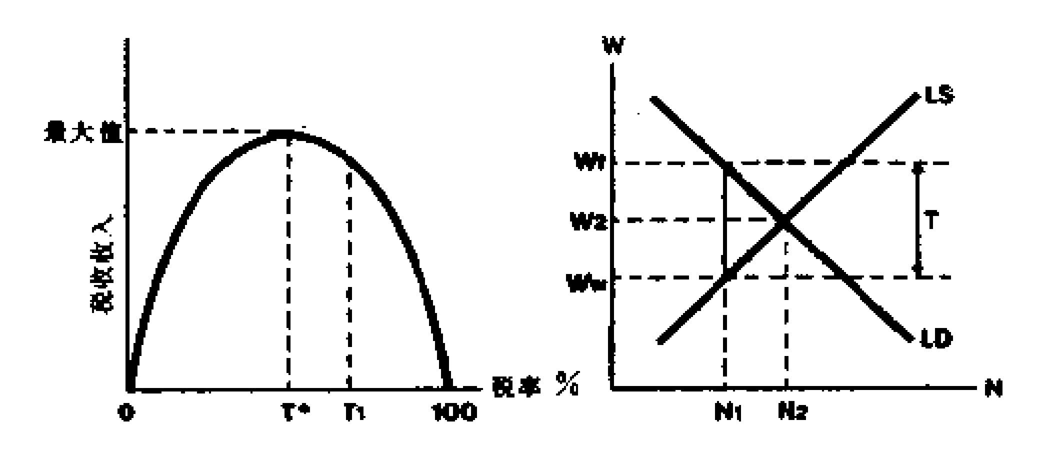
如果工人失业后，没有收入，他们对可变工资"合同"和固定工资"合同"（失业机会较大）两者的差别，就会不太关心——低风险固定工资的好处抵销了解雇的较高风险。但是，工人在失业期间确实得到了国家福利补助的收入。这就使得天平倾向固定工资交易一边。结果，经济周期中就业波动最大。

附录：拉弗的免费午餐

对某些人来说，"供给经济学"主张一种简单的想法：政府同时削减税收和减少预算赤字。论证很简单：较低的税收意味着较大的刺激，从而较高的产出；这就扩大了税收基础，尽管税收较低，但足以提高总的税收收入。曾为里根总统顾问的阿瑟·拉弗（Arthur B.Laffer）教授是最著名的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拉弗曲线（见下页图）表明当税率上升到超过某一点 T^* 时，对工作干劲的抑制将使产出减少如此之多，以致税收收入下降。在税收为100%的极限情况下，根本无人工作，因此收入为零。

减税能提高产量和就业的观点并不具有革命意义。例如，凯恩斯主义者就同意这一观点。拉弗思想中引起争议的部分是，他认为不用赤字刺激总需求增加，产量和就业就能提高。下页图表明这种情况是怎样通过劳动市场的变化而发生的。假定所得税为T，它把企业支付的工资 W_f 和工人得到

的工资 W_w 隔离开来。如果完全废除该税收，工资率（支付的和得到的）就会移到W_2，就业就会从N_1上升到N_2。实际上，整个经济的总供给曲线将向右移动，从而提高产量，降低价格。



产量提高是否足以超过利率的降低并减少预算赤字？如果废除税收，收入将下降到零，预算赤字将保持不变。赤字仅仅在T从某一点例如T削减到 T* 的右边时才下降。大多数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工业国家的税收位于 T* 左边很远。减税可能仍是提高产出和就业的好办法。但是，如果有人要把减税看成是改善政府财政状况的手段的话，那么他还得去学会培养自己对2,000亿美元预算赤字的爱好。

罗志芳　译自（英）《经济学家》1984年

11月10日第62-63页

九、当市场调节发生阻滞的时候

以上各篇短文都是被纳入IS-LM 模型的。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分析结构曲解了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他们以价格具有粘性时的市场运行状况为依据，提出了不同的解释。

自从希克斯爵士首次使用 IS-LM 图形概括凯恩斯的《通论》以来，已经将近50 年了，IS-LM 图形至今仍然统治着经济学教科书。IS-LM 图形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它通过把两个分离的市场——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复杂行为相结合，说明其中任何一个市场的变化如何影响另一个市场。

在前几篇短文中，我们讨论了自凯恩斯以来经济理论方面的许多发展，这些发展都可看作是为充实 IS-LM 的骨架所作的尝试。一项进展是把劳动市场引入 IS-LM 模型。这意味着，为了解释价格和就业的变动，可以将 IS-LM 的需求分析与一种供给理论相结合，从而对价格与就业的变动作出解释。另一项进展是把财富效应引入IS曲线和LM曲线，由此消除了 IS-LM 模型的一个隐含的矛盾，说明了在某些情况下，IS-LM 模型可能是不稳定的。下一篇短文将引进国际贸易，以填补 IS-LM 模型的最大漏洞。

这些理论上的进展在它们刚问世的时候，尤其是在那些有功于这些进展的经济学家眼里，几乎都不被看成仅仅是对

IS-LM模型的补充。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不单是由于理论家的天生愿望是要推翻流行的正统理论，而且还因为IS-LM模型象大多数综合理论一样，对于新观点，唯有将它们加以简化，并磨掉其中最具有特性的棱角，才能够包容它们。但是，在新观点的发现者看来，正是这些被磨掉的棱角包含着新颖而又重要的东西。尽管多数经济学家都乐于把IS-LM图形作为分析的起点，但是货币学派和现代凯恩斯学派中的一些不同派别却断然摒弃了它。

希克斯本人就对IS-LM分析提出了一点重要异议。IS-LM通常是一个市场结清模型。应当记住：IS曲线和LM曲线分别表示商品市场均衡和货币市场均衡的必要条件，并隐含地假定这些条件是稳定的。

根据IS-LM的分析框架，利率（如果给这个模型补上供给分析的话，那么还有价格）会自行调节到保证市场结清的水平，以避免持续性过度需求或过度供给的危险。货币价格（即利率）和商品价格是市场之间赖以相互影响的渠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利率和物价提供了市场结清所必需的基本信息。

但是，IS-LM分析是否真的假定所有的市场都处于结清状态呢？前几篇短文利用IS-LM模型讨论失业（即劳动市场上供给过度）的理论。事实上，IS-LM模型为自愿性失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解释。即，实际工资过高，致使就业不能上升到某种所想往的水平；但是，如果失业是自愿的，劳动市场就能结清。因为每个愿意接受现行工资的人都能得到工作，不会出现过度的劳动供给。

只有在假定工资（不同于其他价格）具有刚性的前提下，IS-LM模型才能解释非自愿失业。因此，它是把大规模失

业（凯恩斯着手解释的那种现象）看作古典经济学的一个特例。如果凯恩斯的《通论》可以简单地压缩成古典模型加上一个武断的工资刚性假定，那么它就几乎不可能成为经济思想的一场革命。

上述看法引起了一股试图重新解释凯恩斯思想的新的经济研究潮流。有一种观点认为，凯恩斯在《通论》中真正关心的是价格作为市场状况信号的作用。他怀疑价格能够在不同市场之间有效地传递信息，从而保持市场均衡。如果这种观点不错的话，那么，将凯恩斯理论强行纳入那种把价格的完全伸缩性视为理所当然、而把工资刚性看作特例的分析框架，难道不是绝顶荒谬的吗？

新的理论家很想了解，在价格完全没有伸缩性的极端情形下，经济会怎样运行。这种假定对于分析经济的长期变动是毫无用处的，但是就短期而言，它相当符合现实经济中的某些情况。例如，厂商就不会每天改变他们的价格和工资，他们必须用其他方式（即增加或减少存货，增雇或减雇工人），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作出反应。

如果数量发生变化

如果没有平稳变动着的价格作媒介，那么，不同的市场如何能相互发生影响呢？70年代初，芝加哥大学的巴罗教授和布朗大学的格劳斯曼（Herschel Grossman）教授建立了一个模型来回答这个问题。[*] 他们把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帕廷金（Don Patinkin）教授对于劳动市场的分析和西北大学的克洛尔（Robert Clower）教授对商品市场的分析统一起来，旨在表明，一种市场上的非均衡状况会加剧另一种市场

上的非均衡状况。

在图1中，纵轴表示商品，横轴表示劳动。如果价格和工资具有伸缩性，它们的变动就能够结清两个市场。图中H点表示了一种均衡状况，此时，家户对劳动的供给为L1，对商品的需求为G_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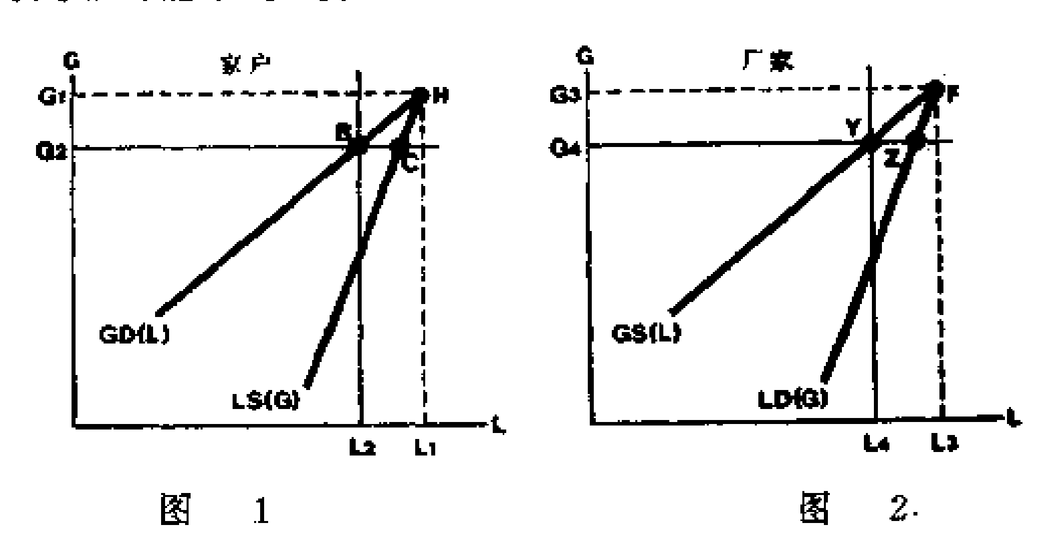


图　1　　　　图　2.

H点代表家户在现有物价和工资水平上所要购买的商品量和所愿提供的劳动量。经济学家把这两个量分别称为家户对商品的概念需求(notional demand)和对劳动的概念供给(notional supply)。如H点所示，当市场处于结清状态时，家户的愿望得到满足，他们的概念需求和概念供给就变成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但是，如果市场不能结清，那么，非均衡状态就会造成概念量值与有效量值之间的差距。

现在假定，由于某种原因，厂商只需要L_2的劳动量。如果价格和工资固定不变，那么就会出现劳动的过度供给，其超额恰等于L_2与L_1之间的距离。结果，作为整体的所有家户只能得到较低的收入，从而只能购买较少的商品，例如与B点对应的G_2所示。

随着L_2从L_1开始向左移动，与L_2所对应的B点也就从H

点开始向左下方移动，由此勾勒出家户对商品的需求曲线。除H点以外，这条曲线上所有的点都表示家户的有效需求而非概念需求。用文字描述就是：有效需求是受劳动市场的就业限额影响的需求。因而这条有效需求曲线被标作GD(L)，意指与就业限额相对应的商品需求。

如果家户面临另一种类型的市场限额，将会发生什么情形呢？假定由于某种原因，商品供给被限制在G_2的水平上，因而无法满足家户的概念需求G_1。如果家户把劳动供给一直减少到L_2，他们的收入就足以购买G_2的商品了。但是他们往往不会减少这么多劳动供给，而是采取一种折衷的选择，例如移动到C点：消费G_2的商品，而将B与C之间的超额劳动供给所得到的收入储蓄起来。

由此，便可画出另一种曲线。即，随着G_2从G_1开始向下移动，与G_2相对应的C点从H点向左下方移动的轨迹就形成家户的劳动供给曲线。同理，除了H点以外这条曲线上所有的其他各点都表示劳动的有效供给，也就是随商品市场上供给限额的减少而收缩的劳动供给，因而该曲线被标作LS(G)。GD(L)曲线和LS(G)曲线共同表示家户在现行价格和工资水平上所希望实现的商品需求和劳动供给（如H点所示），以及当他们面对两个非均衡市场的不同限额所能够实现的商品需求与劳动供给。

图2则重复说明厂商的行为过程。F点表示厂商对劳动的概念需求（L_3）和对商品的概念供给（G_3）。如果在现行工资水平上，家户所能提供的劳动少于厂商的需求，那么厂商就只能提供较少的商品。把与L_4（即劳动市场上的供给限额）相对应的Y点从F点向左方移动，就得到厂商对商品的有效供给曲线GS（L）。

同时，厂商也可能无法实现他们的销售计划，这就意味着他们将雇佣较少的工人。例如，在图 2 中，当销售量被限制在G_4上时，厂商将在Z点生产，而将介于Y与Z之间的就业量所生产的多余产品用于增加存货。把与G_4(即商品市场上的需求限额）相对应的Z从F点向左下方移动，就得到厂商对劳动的有效需求曲线LD（G)。

正如IS-LM框架把非自愿失业作为特例一样，上述这些所谓“楔形图”可以把市场均衡作为特例。图 3 就是把家户的楔形图与厂商的楔形图两者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的。

图 3 中，四条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曲线的斜率将依据模型的假定条件而变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家户（厂商）宁愿在今天而不是在将来消费（生产）的商品量究竟是多少？它将影响图 1 中B和C（图 2 中Y和Z）之间的距离。然而更重要的是，两个楔形图能否在图 3 中的那一点（即H＝F处）汇合？如果能够这样，厂商和家户就都能实现其概念需求和供给，即L^*量的劳动和G^*量的商品，从而每个人都得到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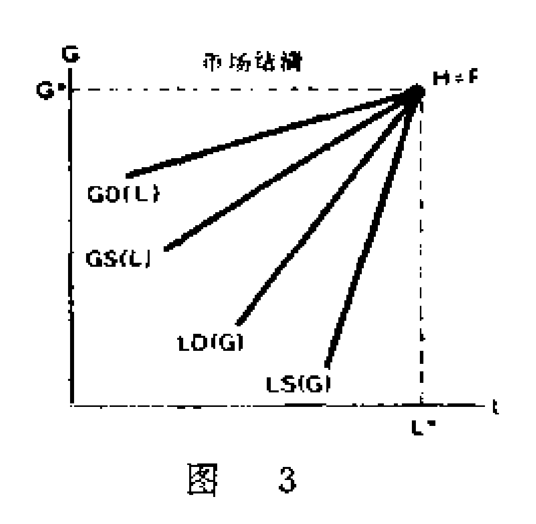


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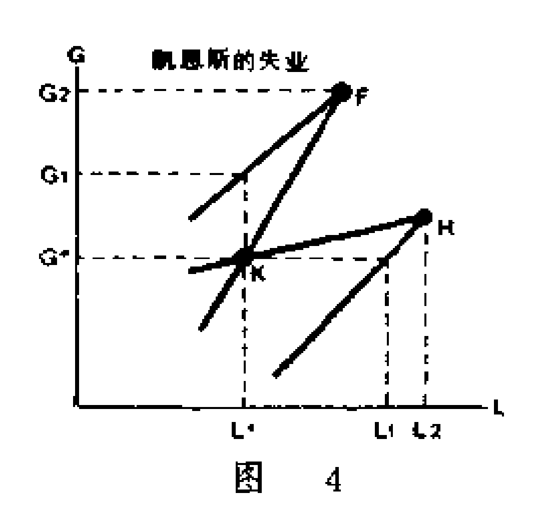


图 4

如果不能这样，就出现图 4 中的情形。即厂商想要出售的商品量多于家户想要购买的商品量，而厂商愿意雇佣的

劳动量却少于家户所希望实现的就业量。因而F在H的西北方。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价格不能变动，商品和劳动的交易量将会是多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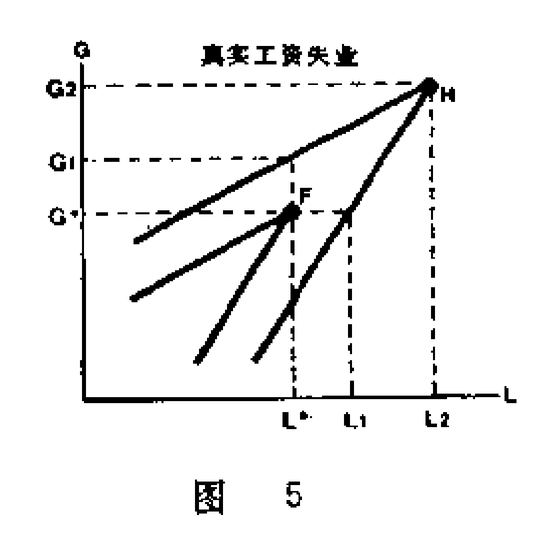


图 5

为了寻找答案，让我们回到图1。在自愿性交易中，家户是依据劳动市场的就业限额而决定其商品需求的，他们的实际购买绝不会超过这个需求。即家户拒绝接受GD（L）线上方的任何一点。同样地，他们依据商品市场的供给限额决定其劳动供给，他们的就业愿望绝不会超过这个供给水平。即，他们拒绝接受LS（G）线下方的任何一点。

但是，在自愿交易中，如果厂商不愿销售足够多的商品，那么，家户对商品的实际购买将低于其意愿需要；如果厂商不愿雇佣足够多的劳动者，那么，家户对劳动的实际供给也将会低于其就业愿望。因此，家户将愿意接受位于楔形的两条线上或两条线之间的各点。

同样的论证也适用于厂商，即，厂商也会拒绝接受图2中楔形以外的任何一点。现在回到图4，厂商与家户能够达到的、最接近于他们的第一选择位置（分别为F与H）而又不越出楔形之外的点是K。这意味着商品的交易量为G^*，劳动的交易量为L^*，它比人们从F与H的原始差距中可能作出的猜测要糟得多。

L^*隐含着两种非自愿失业水平。一是L^*与L_1之间的差距，L_1表示家户当其消费水平被限制在G^*点时所想要供给的劳动量。二是L_1与L_2之间的差距，L_2表示在现行价格和

工资水平下，不存在商品市场的供给限额和劳动市场的就业限额时，家户所想要供给的劳动量。非均衡理论家往往把这两种差距所表示的非自愿失业归并在一起，通称为“凯恩斯的失业”。

寻找对策

前几篇短文认为，政府通过增加需求只有在短期内，并在追加需求导致实际工资下降的限度内，才能减少失业。然而在图 4 中，较低的实际工资对于就业却可能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影响。

较低的成本会促使厂商增加产量、增雇工人，因而F会向右上方移动。然而报酬的减少会促使家户减少劳动供给及消费支出，因而H会向左下方移动。结果，K有可能原地不动，即就业量仍然停留在L^*的水平上。的确，随着H的不断移动，L_2会向L^*靠拢，使失业稍有减少。但是，商品市场的过度供给也会随着F的移动而增加。

对于这种模型中的失业，真正的解决办法就是传统的凯恩斯处方——增加总需求。这并不会使人感到惊奇，因为该模型所显示的正是两个市场上的过度供给。减税能增加家户的概念需求，使H向上移动并将K推近F。缩小F与H差距的另一途径是增加公共支出。F表明厂商愿向私人部门提供的商品量，如果政府支出增加，那么，超过私人消费需求的商品供给余额就会减少。因而，随着F向H靠近，商品市场上的过度供给就会减少，就业就会增加。

图 4 说明了非均衡的一种形态，其他形态则可能引起不受追加需求影响的非自愿失业。例如，降低实际工资被证明

是救治图 5 中的失业的最好处方，这是古典的办法。在图 5 中，家户想要购买的商品多于厂商想要供给的商品，而家户想要提供的劳动也多于厂商想要购买的劳动。因而，该图显示的是劳动的过度供给与商品的过度需求并存的情形，而不是商品和劳动两者同时出现过度供给的情形（即凯恩斯的案例）。

图 5 的劳动市场与凯恩斯的案例非常相似，假定家户所能购买的商品量被限定在G^*上，那么他们所愿供给的劳动量为L_1。当不存在商品的供给限额时，家户在现行价格和工资水平下所愿供给的劳动量为L_2。因此，L_2与L^*之间的差距即为非自愿失业。

但是，现在家户想要购买的商品比厂商所愿出售的要多，尽管现有就业水平远远低于他们的愿望与L^*所表示的就业限额相对应，家户想要购买的商品量为G_1；如果不存在就业限额，那么家户就会要购买G_2的商品量，而厂商只愿出售G^*的商品量。

在凯恩斯的案例中，家户只受到一种限制，即劳动市场上的就业限额。他们能够调整自己的商品需求，实现其在只受到就业限额制约时的购买愿望。但在图 5 的案例中，家户却受到双重限制，他们在任一市场上都不能实现自己的意愿需要或意愿供给。与这一区别相对应，厂商在凯恩斯的案例中也只受到一种限制，即商品市场上的需求限制，但是他们在图 5 的案例中却完全不受限制，商品和劳动的交易都在F点进行，而F点正是厂商在现行价格和工资水平下自由选择的结果。

追加需求，在图 4 和图 5 中都会使H向上移动，但在图 5 中却会使非均衡状态更加严重。当商品市场上的超额需求

增加时，失业却不受影响。但是，降低实际工资却能使F向右上方移动，使H向左下方移动。因此，降低实际工资将会缩小两方面的距离。

这里应注意图4与图5的另一个区别。在图5出现的是“眞实工资失业”，家户对商品的购买意愿超过商品的供给。在较长时期中，这会使价格上涨，并减少商品的过度需求。这个模型最终应该按照市场结清方式开始运行。在凯恩斯的案例中，厂商正在增加存货（$=G_1-G^*$），但是由于劳动市场上L^*的限制，存货增加的速度不及他们所期望的那么快。他们没有理由降低价格，减少商品的过度供给。这个模型可能长期滞留在非均衡状态中。

巴罗教授作为非均衡分析的开创者之一，后来已经否定了这种分析的正确性。他不但不赞成价格粘性的模型，而且现在成了新古典学派的领袖，为市场结清理论辩护。

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仅仅假定价格粘性是错误的。他们认为，经济理论必须解释：如果厂商和家户的行为是合于理性的，价格怎么可能是粘性的呢？（对于这个问题，前一篇短文提供了一个答案，即买者与卖者之间存在默契。）现代凯恩斯主义者可以回答说，理论若以市场能够迅速而平稳地结清为假定，这种理论似乎同样与事实不相符。裁决这场争论的最佳方式也许应当是：把非均衡模型当作是对极短期经济活动的写照，而把具有价格伸缩性的模型当作描述长期经济活动的一种较好指南。

陈端洁　译自（英）《经济学家》1984年

11月17日第46—47页

十、汇率为什么变动

70年代初，由固定汇率到浮动汇率的转变促使经济学家从事新的理论研究和探讨。尽管他们的研究成果并没有为货币投机者提供暴发致富的指南，但有助于说明汇率为什么会变动。

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固定汇率体系，尽管并非永久固定；当一国收支（国际收支）处于“基本失衡”状况时，该国能够并且应该改变汇率。例如，1949年英国将英镑贬值（从4.03美元降到2.80美元），1967年英镑再次贬值(降到2.40美元)。即使固定汇率，也允许它在其平价两侧1%的幅度内波动。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者们试图使汇率几乎不变动。如果汇率需要变动，其时机和幅度应该是不确定的（以阻止投机者赚大钱），而其方向应该是可预测的。如果A国的通货膨胀快于其贸易伙伴国，A国货币的价值就会下降；如果A国的通货膨胀慢于其贸易伙伴国，A国货币的价值就会上升。这样，A国会使其本国商品成本同国际水准相一致，因而就不再以不公平的劣势或优势同它国进行贸易往来。

这种汇率理论在国际贸易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假定一国的汇率主要是该国进口和出口的价格，还假定调节该价格会改变进出口数量。资本流动—— 一国从其他国家吸引

来和借给他们的货币——被认为仅仅是边际的。在那时，那是一个很有道理的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20多年的时间，大多数国家的政府牢牢地控制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

对可贸易商品及劳务贸易和价格的强调，产生了一种汇率行为理论，这种理论被称为购买力平价说（Purchasing Power Parity），简言之，即汇率将趋于一点，在那点上它们的国际购买力相等。因为通货膨胀不断降低一国通货的购买力，两国通货膨胀差额决定一国通货用另一国通货来表示将贬值多少——即它们的汇率会怎样变动。

假定在第一年X国和Y国有相等的购买力，而且没有通货膨胀。第二年，X国的通货膨胀为10%，根据购买力平价说，X国的汇率将同时降低10%。这点有时被表述为“实际汇率”不变的思想——名义汇率因不同的通货膨胀而调节。

购买力平价理论引起了两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1）当购买力一定时，哪一年是基准年呢？实际上，并不存在从那以后对所有汇率变动都能够作出判断的零通货膨胀和均衡汇率这样一个起点。因为基准年的选择是武断的——这种选择可能使购买力平价分析的结论大相径庭。以美国为例，以1979年为基准年，1984年中期美元的实际汇率已经升值了36%（即美国厂商的竞争性已经削弱）；以1982年为基准年，到1984年中期，美元实际汇率的上升仅为9%。

（2）衡量不同国家通货膨胀的正确方法是什么？利用消费者价格指数去分析相对成本的变化，这是没有意义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包括诸如住房成本之类的东西，而这些不是国际贸易的组成部分。此外，消费者价格指数还包括间接税，间接税改变国内价格，但并不改变国际价格。批发价格没有这么多缺陷，但也包括非国际性贸易的项目。

因此，那些主张以购买力平价说解释通货变动的人倾向于只选择制造品的竞争性作为衡量尺度，因为制造品都是可贸易的。此外，了解各国竞争性强弱的最好途径是比较单位工资成本——总工资除以生产的制造品。这就将国内生产成本同其他成本（如原材料）区分开来。那些其他成本，在世界市场上大都是固定的，因而，在国与国之间没有变化。

建立在有关的单位工资成本基础上的购买力平价理论是如何解释货币市场实际发生的情况的呢？如果这种解释总是确切的，它就表明：尽管名义汇率波动，但实际汇率是不变的。如图所示，情况并非如此。以英国和美国为例，实际汇率一直比名义汇率更加反复无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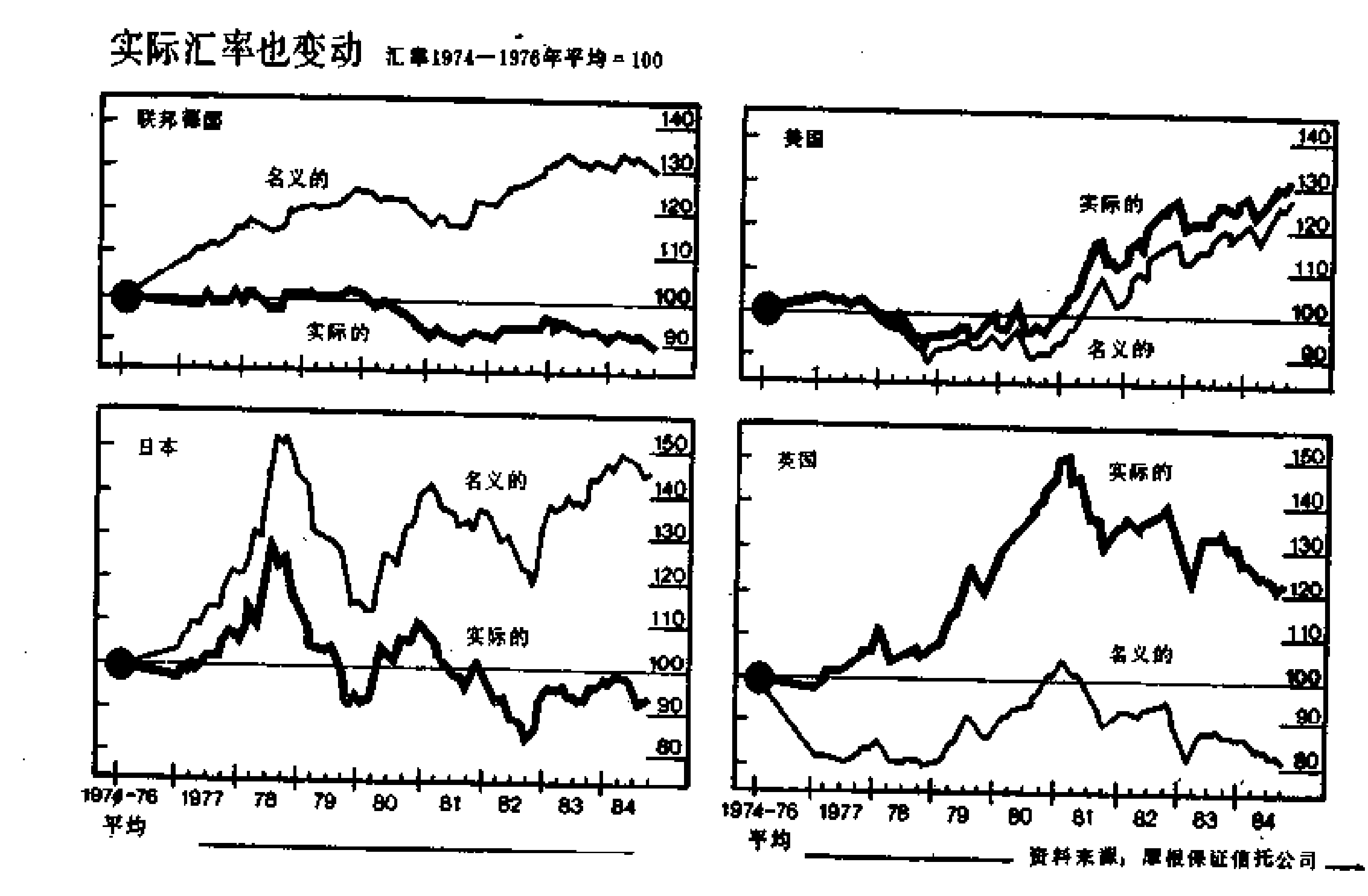
购买力平价说的支持者并不认为他们的理论包含通货问题的全部复杂内容。它仅仅指明通货趋于均衡的长期趋势。在均衡处，实际汇率是稳定的。但是请注意，实际汇率的变动有不同的方式。如果名义汇率变动的同时，有关的单位工资成本不变，或者如果名义汇率不变而有关的单位工资成本变动（在这两种情况下），实际汇率都可变动。

价 格 的 变 动

无论购买力平价说是否解释了通货变化的原因，它要求回答，什么使价格发生变化。对于这个问题，货币主义和古典经济学家给出了一个答案，凯恩斯主义者给出了另一个答案。这就导致他们推演出不同的汇率理论。

对货币主义者而言，价格反应于国内货币供给的早期变动而变动。如果货币增长超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潜在增长率，其超过额就表现为通货膨胀。这种理论很容易引伸到汇

实际汇率也变动 汇率1974—1976年平均＝100



资料来源：摩根保证信托公司

率。货币主义者认为，一种经济的货币增长速度，相对于另一种经济的货币增长速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两种通货间的汇率如何移动。假定在第一阶段汇率是均衡的，为2美元＝1英镑。在第二阶段，英国将其货币供给增加了1倍，与此同时，美国的货币供给没有变化。由于有了2倍于以前的英镑，现在每1英镑仅仅值过去的0.5美元，美元总量保持不变，新的均衡汇率为1美元＝1英镑。

货币主义的理论假定"单一价格规律"，任何能进入国际贸易范围的商品和劳务，将按世界均衡价格在国内市场定价。如果石油生产者试图对本国消费者索价高于世界价格，那么，该国的消费者将求助于国外供给者，直到国内价格被迫下降。实际上，运输费用确实允许价格的某些差额；贸易壁垒（包括类似复杂的海关手续的"非关税壁垒"）可能阻止国内买者得到他们想要从世界市场得到的东西。但是，当市场是开放时，货币主义者认为"单一价格规律"确实起支配作用。

货币主义者对他们的模型作了两种巧妙的发挥。首先，他们认为实际经济增长影响汇率，因为它影响对货币的需求。如果英国的经济增长比美国迅速，某些额外英镑的供给将用于融通增长较快的实际贸易。所以并非所有额外英镑都会降低英镑——美元汇率。

其次，货币主义者（象其他理论家一样）把预期看成是影响汇率的因素。当然，就理性预期理论而言，汇率已经包含了有关未来的所有可能的事实——包括"基本"力量推动汇率的观点。在货币主义者眼里，基本力量指相对货币增长和相对产量增长而言。

凯恩斯主义者采取不同的方法。他们认为，公司算出成

本，然后加上利润来确定价格。因为成本（特别是工资）变动缓慢，价格可能长期偏离国际标准。如果某些外生冲击（政局不稳定，石油的发现）推动一国汇率偏离购买力平价均衡，可能得花几年的时间才能重新回到均衡。然而，凯恩斯主义者用货币过多来解释这种对购买力平价的偏离。（见后）。

到目前为止，本短文几乎没有提到利率对汇率的影响。确实，那些现金管理者把现金由一国转移到另一国，这种行为似乎表明利率很重要。这样，一个称作“资产组合平衡”的新理论发展起来了。这个理论从人们如何持有自己的资财（为简便起见，划分为货币和债券）出发，并将资财扩展到包括外国货币和外国债券。如同前面短文所解释的，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利率就是决定相对于债券需求之货币需求的因素。当外国资产被包括进来时，汇率就成为另一决定因素。

开放经济模型涉及两个市场——国内货币市场、国际证券市场——和影响两个市场的两个变量：利率和汇率。图1表明货币和债券市场均衡是如何达到的。同前面短文中的IS-LM曲线一样，图1的两条曲线是从有关人们行为的各种恒等式和判断中得到的。为简便起见，它们的全部来源在此不予涉及。尽管在实质上，为了保持利率和汇率之间的关系，它假定几乎每个变量都是不变的。这些假定中的某些假定不久将被放弃。让我们暂且来看看这些假定对图1中两条曲线意味着什么。

（1）MM曲线涉及到货币市场。当利率上升时，人们想持有较少的货币。但是，模型假定货币供给不变。因此，使人们满足于现存货币余额的唯一方法，是使他们变得更富

有。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途径是降低汇率。汇率降低，增加了人们持有的国外债券的国内通货价值。因此，就货币市场本身而言，利率上升要通过一次贬值以恢复均衡——在给定一条向上倾斜的MM曲线的条件下。

（2）BM曲线涉及到债券市场。它代表债券市场处于均衡状态时，利率和汇率的所有组合；因为X国较高利率意味着其居民想以国内债券形式持有更多的有价证券，BM曲线由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因为那些债券的供给是固定的，X国居民满足于现存有价证券的唯一方法，是使他们所持国外债券的国内货币价值下降。如果汇率上升，后一种情况就会发生。

当那些保持不变的假定不再成立时，这个模型似乎自然有效。例如，假定由于政府推行预算赤字，国内债券供给增加，BM曲线将从左向右移动，移到图2中的BM_2；因为X国需要较高利率才能引诱其居民持有更多债券。但是，财富效应意味着他们感到自己更富裕了，因此想要持有更多的货币，MM曲线移到MM_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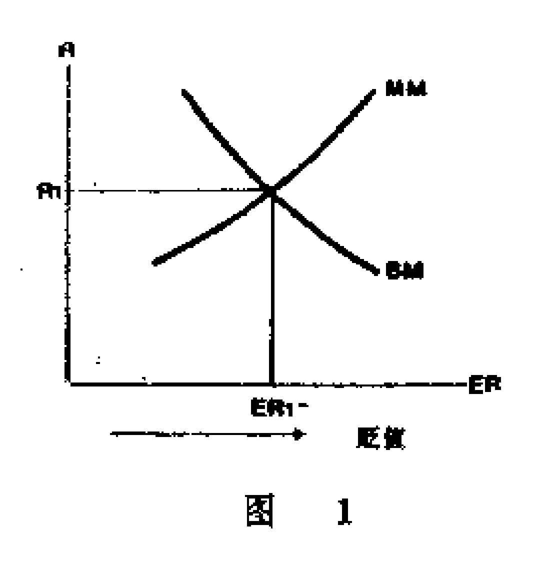


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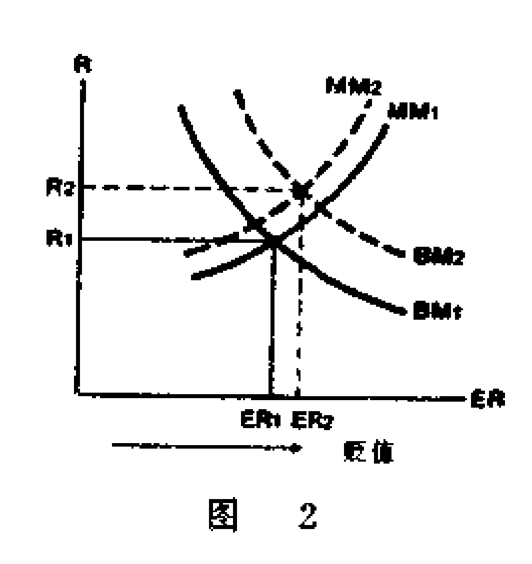


图 2

这两种移动结合起来，肯定会将利率提高到R_2。然而，它们对汇率的影响是不明确的。图2已经绘出汇率贬值，由ER_1下降到ER_2。但是，如果MM曲线移动更大些，即使利率位于较高水平，结果也会导致汇率的上升。

当国外利率上升时，影响不明确的现象也会出现。国外利率上升会把两条曲线移到右边——很明显，这会使X国通货贬值。但是国外利率的上升对于X国利率的影响则依赖于每条曲线如何移动。

唯一明确的影响来自于：（1）X国的货币供给增加。这会降低X国的汇率和利率。（2）X国居民持有外国资财的国外通货价值趋于上升——其结果是X国拥有外部经常项目盈余，能够买进更多的外国资财。这就会导致X国汇率升值，但是X国的利率不会因此而变化。你把自己的看法画为图2，并移动两条曲线，就能证实这些影响的存在。

有关汇率的三种基本理论——凯恩斯主义的、货币主义的以及资产组合平衡学——有助于回答汇率的第四种理论即购买力平价说中的一个特殊问题。尽管假定汇率倾向于购买力平价均衡，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汇率在短期内会变动得过了头——即它们上升或下降幅度比恢复购买力平价均衡所需要的幅度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种解释是国内价格和工资只能缓慢地对名义汇率的变化作出调整。在只有两个国家的世界，假定汇率处于购买力平价均衡；于是，A国若将其货币供给增加1倍，A国的价格和工资也会马上增加1倍，因而，A国汇率需要减半才能恢复购买力平价。如果价格和工资立即增加1倍，货币市场也会立即将汇率降低1半。自那以后，价格稳定会立即得以恢复，因而名义利率不再变动；

均衡立即就会被重建。但是，如果价格和工资上升需要一段时间，那么名义货币供给的成倍增加也会增加实际货币供给。在这种情况下，利率将会下降，货币将会通过资本项目离开A国。

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汇率得马上下降——不是仅仅只下降到它最终的购买力平价均衡，而且要下降到均衡以下。要使人们相信汇率下次将向上移动，这种过头做法是必要的。当人们知道汇率将向上移动时，他们将乐意于继续持有货币。尽管利率降低了，然而他们预期的资本收入会补偿他们因没有持有其他通货而少挣的利息。工资和价格会及时地赶上增加了1倍的货币供给。其结果是，货币供给的实际价值下降；利率上升；汇率逐渐回升到其新购买力平价均衡。在那里，汇率值为最初的一半。

请注意，对于现实经济的这种分析具有一种重要含义，它认为，名义汇率的变化对于一国经济的竞争力没有持续影响；通货贬值将最终促成更高的国内工资和价格，从而取消它最初带来的任何好处。

这一点听起来并不陌生。前面短文只涉及封闭经济；在封闭经济中，供给曲线是垂直的；因此产量并不能长时间随需求的财政或货币扩张而扩大。上述论点是封闭经济分析结论的国际应用。使经济学家之间产生分歧的是工资和价格变动的速度问题。国际情况同国内情况一样。

罗志芳　译自(英)《经济学家》1984年

11月24日第64—65页

十一、国际收支怎样平衡

一国同世界其他各国的联系对于该国经济可能有重大影响。随着世界贸易的增长以及资本在国与国之间更加自由的流动，经济理论家越来越关心是什么决定国际收支平衡。

人们常常指责经济学家使人困惑不解，可是，经济学家的许多理论都是有意地尽量简化。他们常常发现，分析一个与其他国家没有贸易和金融联系的“封闭”经济甚为方便。一旦放弃了这个假定，经济模型就变得更加杂乱。但是这些模型的实质并没有发生出乎意料的变化。例如，古典和货币主义经济学家都将国际收支平衡的理论建立在与他们在封闭经济模型中所运用的同样的市场弹性原理之上。

在考虑不同的国际收支平衡理论之前，先来看看某些简单的算术和基础经济学。从算术上来看，一国收支平衡有两个主要部分：

（1）经常项目。包括：商品和劳务的进出口；从国外得到的和支付给外国人的利息、利润和红利；汇款——在国外工作的人寄回家的现金；以及公共部门某些少量的转移支付。

（2）资本项目。由贷给外国或在国外投资的货币构成。它可以是短期的——英国人在美国银行的存款一个电话

就可以存入或取出；也可以是长期的——如跨国公司或援外机构投资于费时数年才能完成的庞大工程。

就定义而言，国际收支必须平衡。经常项目有10亿美元逆差的国家，就必须设法搞到10亿美元的外汇去弥补。这通常是以使资本项目有盈余（10亿美元的相应流入量）来做到的。但是，大多数国家都拥有外汇及黄金的政府储备，可以用来弥补一时的经济项目逆差。因此，经常项目减去资本项目加上政府储备的变化，总共等于零。

这一点同任何个人的私人财物完全一样。如果能够借到钱（资本项目盈余），他就能花费大于收益（经常项目亏空）；否则，就必须用储蓄（储备）去弥补亏空。

现在将某些经济学应用于这种算术。政府储备是否变化，依赖于国家的汇率政策。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下，中央银行经常干预货币市场。如果货币处于贬值压力之下，就动用储备，出售外汇，以买进（从而支持）自己的通货。那些汇率面临上浮压力的国家，如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的日本和联邦德国，就买进外汇，向外国人提供他们想要的日元和联邦德国马克。这种中央银行干预对国家的政府储备有重大影响。一种通货最终被迫贬值，其主要原因或许就是发行该通货的政府在耗尽储备以支持通货。

有了自由浮动汇率，这一点就无须多虑。中央银行不再买进或卖出通货。经常项目盈余（或赤字）完全对应于资本项目的赤字（或盈余），外汇储备并不变化。实际上，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浮动汇率很少是完全彻底的。因此，国家偶尔也动用它们的储备。

政府选择的汇率政策对国内经济有影响，在此阶段请特别注意一点：货币供给会发生什么变化？假如日本有50亿美

元国际收支盈余，其中央银行不是让日元汇率上升到250日元以上兑换1美元，而是增加外汇储备。当日本的出口商和金融机构收到50亿美元，中央银行向他们提供按固定汇率计算的等值物——1,250亿日元，这就增加了国内货币供给，其大小恰为收支盈余额。要抵销对货币供给的这一影响，就需要通过出售更多的债券，并使1,250亿日元再次退出流通，把盈余加以“封存”。

充分均衡

当经济学家研究封闭经济时，想要知道的是这种经济的商品和货币市场怎样达到均衡。当他们使“封闭经济”面向国际贸易和资本流量开放时，想要知道的是国际收支是怎样平衡的。这些是解决一国经济怎样同时达到内部和外部均衡这一更大问题的第一步。

根据IS-LM模型，利用两条熟悉的曲线并加上第三条曲线，就可以对答案做出最好的描述：

第一，IS曲线表明商品市场达到均衡时的利率和收入的组合。在开放经济中，如果净出口增加，IS曲线将向右移动，因为对于任何特定利率水平，总需求都更高了。净出口增加可能有几个原因，如汇率的下降或者国外市场的增长。

第二，LM曲线表明货币市场处于均衡时的利率和收入的不同组合。暂时假定LM曲线并不因外在因素的发展而移动。因为货币供给被假定为外生的——例如，当中央银行“封存”经济时，货币供给并不受储备变化的影响。

第三，BP曲线代表国际收支处于均衡时的利率和产量的组合。首先来考察汇率固定以及BP曲线由左下方向右上方

倾斜（看图1）的情况。它表明国内收支的上升使经常项目的状况趋于恶化。因为一国进口需求的增加大于外国对该国出口需求的增加，结果该国得从国外吸收更多资本以平衡其国际收支；这就需要提高利率，尽管其作用可能只是暂时地吸收更多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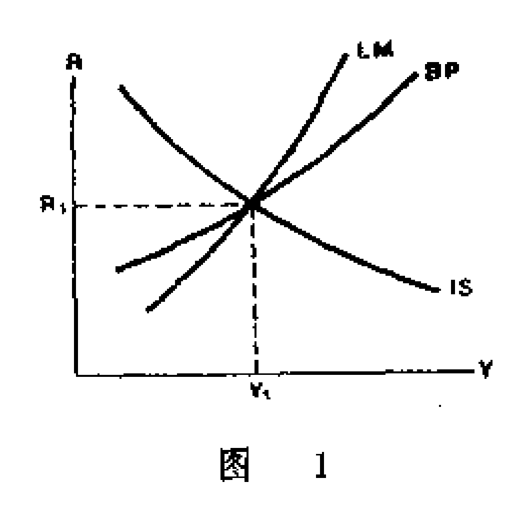


图 1

什么东西会移动BP曲线呢？如同IS曲线一样，如果有什么事态使净出口增加，则BP曲线将向右移动。这些事态如国外经济的快速增长，汇率贬值，由于国外价格提高而使竞争能力有所改善。BP曲线中的资本项目要素也能使BP曲线移动。例如如果在该国平衡国际收支的同时，能够享有较为有利的利率和产量组合时，国外利率下降，BP曲线将向右移动。

BP曲线代表国际收支平衡，BP曲线任意一边的区域意味着什么呢？图1中BP曲线右边的任一点都意味着总国际收支有赤字，即一国正在动用其外汇储备。这种赤字可能因为下面两个原因中的任一个而产生，（1）所需求的产量（Y）太高；以及（2）相对于世界利率而言，利率太低，因此，该国不能吸引外资，并且确实有国内资本流向国外——资本项目有赤字。相反，BP曲线左边任何一点都意味着国际收支盈余。

在三条曲线相交处，所有三个市场——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都在R_1和Y_1处达到均衡。要说明不断将三个市场推向均衡的力量，让我们从固定汇率的情况开始，

在那里，BP曲线已经移到图2 的BP_2，IS和LM的交点A位于BP曲线右侧，因此，国际收支出现赤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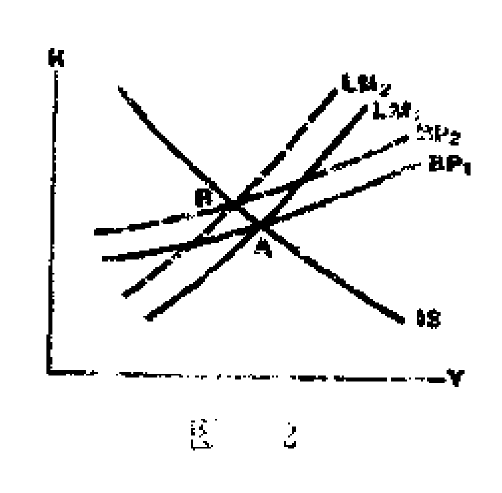


图 2

就定义而言，A 点并不是均衡点，而且它会引起经济其他部分的反应。国际收支逆差减少了货币供给，货币供给的减少意味着LM曲线向左移动，直到移到 LM_2，在B点建立新均衡。B 点比A 点有较低的需求，较高的利率。经济就是这样扭转国际收支逆差的。

难道是这样吗？从图2得出的上述结论基本上依赖于BP曲线的形状。请记住国际收支由两部分，即由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组成。其他条件不变，收入的提高将使经常项目恶化——即因为超额国内支出将吸收更多进口，使经常项目盈余减少，赤字增大。因此，由左下方向右上方倾斜的BP曲线表明，因为较高的利率将吸收较多国外资本，经常项目的恶化能部分地由资本项目的改善而加以弥补。

这种情况需要同一个世界进行对比，在这里仍然是固定汇率，但是，资本（1）在国与国之间根本不流动，以及（2）完全自由流动。在第一种情况下，BP曲线是垂直的，对国际收支的任何调节都只是通过经常项目——这是40年代和50年代大多数经济学的假定。

图 3 表明，在这样一种世界中，经济将如何起反应。从均衡点A 开始，假定投资后来由于外生原因而增加（例如，企业预期利润更高）因此，IS 曲线移到 IS_2，如果中央银行通过利率稳定于R_1并供给更多的货币来配合投资的增加，

LM曲线就将移到LM_2，在B点产生一短期均衡，尽管收入已经增加，但B点位于BP曲线右边，因此，国际收支出现赤字。中央银行维持汇率不变——这样就损失了储备，直到政府除了削减国内开支外，别无它途时为止。政府将提高税收、或减少公共支出或提高利率——做任何能把IS曲线移回左边的事情。

根据政策实际组合的不同，经济在A点或在A点以上的某一点（但这点要在BP曲线上）回到均衡。国际收支平衡是一个绝对限制：收入只有在经常项目得到改善，并将BP曲线移到右边时才会增加。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当英国政治家鼓励公司增加出口时，上述理论就是（无论是否意识到）他们从事分析的经济模型。对他们来说，国际收支意味着商品贸易。因此，商品市场——IS曲线——就是必须进行调整的事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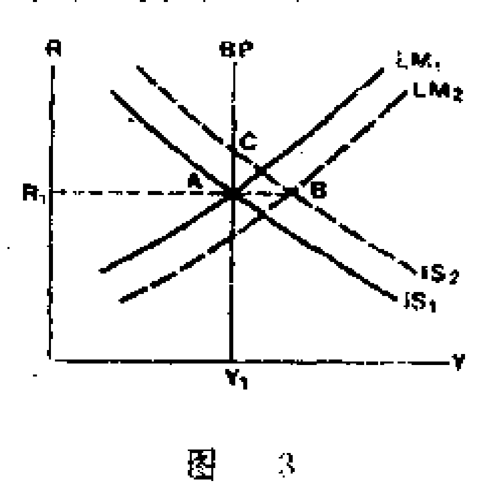


图 3

货币理论

从60年代开始，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更加强调货币因素。他们说，看一看资本项目，看一看货币市场即LM曲线的相应变化吧！即使是在那些资本流动受到相对限制的日子里，资本项目针对国际收支失去平衡所做的调节，也常常比经常项目来得快。

无论BP曲线的斜率如何，从货币方面研究国际收支能够

应用于任何模型。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请再看图3。当IS曲线移到IS_2时，假如中央银行答应提供更多的货币来承担这一移动造成的损失。因此，LM曲线将移到LM_2。但是，如果中央银行拒绝这样做，经济就将位于IS_2和LM_1的交点。

这点位于BP曲线的右侧，因此，国际收支出现赤字，这会减少储备——从而减少货币供给。在这种情况下，LM曲线将向左边移动直到到达C点。在C点，IS_2和BP相交，经济将回复均衡，收入保障不变，但利率提高了。

现在来看另一极端情况：BP曲线成水平状。水平BP曲线意味着，资本在国与国之间完全自由地流动，投资者不必介意他们持有的是哪国的债券。因此，如果A国利率上升，他们就从B国抽出货币，直到B国利率与A国利率再次保持一致。简而言之，存在一个“世界利率”。

世界利率定在图4中的R_1。我们再次假定经济起始于A点的完全均衡，利率仍然固定不变。如果政府试图以财政扩张来提高收入，它就会把IS曲线向外推到IS_2，在IS_2与LM曲线的新交点B上，较高的利率将从国外吸引大量资本。这会增加货币供给，将LM曲线向下推动直到到达LM_2，利率再次回到世界利率水平。新均衡点位于C——收入已经从Y_1增加到Y_2。在固定汇率下，财政扩张能有效地增加需求。

相反，货币扩张则不能。在图5中，中央银行将LM曲线向外推到LM_2。IS和LM曲线现在相交于B点——这不是一个均衡点，因为它不在BP曲线上。利率低于世界利率水平。因此，资本离开该国。情况一直如此，直到货币供给收缩，回到LM_1，从而经济回到A点。于是，一切照旧。

如果汇率不是固定的，而是浮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上述相对有效性则就颠倒过来。在浮动汇率下，不存在

如同固定汇率下的收支平衡限制。就定义而言，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恰好相互抵消。因此，中央银行并不试图让国际资本流入或流出以封存经济，而是汇率本身在进行调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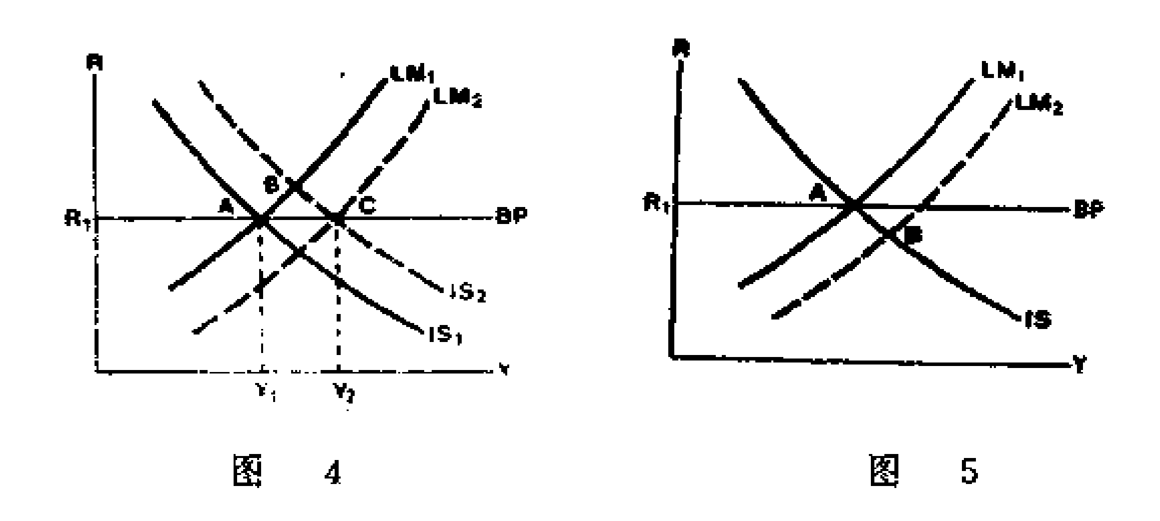


图 4　　　　图 5

假定中央银行想要扩大货币供给，如前篇短文所述，汇率会下降。它将超越其最终均衡。到适当的时候，价格与货币扩张同比例上涨。然而，在这之前，实际货币供给确实增加了，因此，LM_2，从而收入上升。这个例子表明了一个重要的一般规则：政府能够选择一个汇率目标或一个货币供给目标，但他们不能同时达到这两个目标。

浮动汇率使财政政策增加需求更为困难。如同在封闭经济中一样，财政扩张将提高利率。因此，某些私人投资和消费会被“排挤出去”。提高收入将不会如财政扩张最初所设想的那么大。利率较高时，汇率将向上浮动，这就扩大了进口，从而缩小净贸易差额，进一步减少收入的增加。

就业情况如何？

本文已讨论了在需求方面三个市场达到均衡。即使三个市场都处于均衡，这个模型也没有说明经济是否达到了完全均衡。如同前面几篇短文所表明的，只有把供给方面也包括进来，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设想一个充分就业，但有国际收支赤字的经济，IS-LM-BP 研究方法表明，只有削减需求，才会消除赤字，恢复均衡。但是，这也会削减就业。

有一办法可以摆脱困境。通过改善经济的竞争能力，从而增加净出口，能够恢复国际收支平衡，而不会全面减少需求。经济的竞争能力的改善意味着实际汇率的下降。前面短文已经表明清楚，通过让名义汇率贬值。同时保持国内成本（主要是工资）不变，或者通过减少名义成本、同时保持汇率不变，都可以做到这一点。

这就突出了为人熟悉的实际工资问题。正如封闭经济中就业依存于实际工资水平一样，在开放经济中，情况也是如此。关键问题还是在于供给曲线的斜率、以及工资对于劳动市场变化的反应在速度上有多快。

罗志芳　译自〔英〕《经济学家》1984年

12月1日第62—63页

十二、福利和效率

本论丛的前面几篇短文讨论了宏观经济学——关于产量、通货膨胀和就业的理论。本篇短文将要考虑的是，在微观经济方面，是否、以及何时存在着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的正当理由。

在经济活动中，政府应该起什么样的正当作用呢？经济学家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试图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角度回答这一问题，但问题也牵涉到国家通过公共支出，法规和管制对市场进行干预。

微观经济学是分析政府干预的正确的理论结构，它主要是研究一个经济如何在不同的用途、不同的厂商和个人之间将资源加以配置。根据古典的微观经济学，几乎所有的干预都是不明智的。只要任其发展，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就能够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

这一类型的最优状态后来用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的名字命名。75年前，帕累托详细考察了这一最优状态的特点，他表明，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可以达到这样一种状态：若不使另外任何一人的处境变坏，就不可能使任何一人的处境更好。这是一个卓越的结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通过市场得到关于嗜好、态度、资源和技术的信息，并将它们按帕累托最优方式结合在

一起。任何中央计划体制都达不到如此效果。更进一步说，政府的任何干预，无论多么轻微，都将使经济达到帕累托效率失去保证。

结论确实卓越，但实际的选择大都涉及受益和受损双方的交替，帕累托法则又有多大用处呢？设想一个岛上只有两个居民，任他们自己发展，一个人的月收入为1英镑，另一人是勤奋的出口商，月收入为1,000英镑。如果他们听命于一个来自大陆的客座政府，该政府可能对较高收入者征税，并将款项转移支付，直到两个岛人的收入都是500英镑。很多人会说，全岛的状况因为均等享受而好了，但根据帕累托标准却没有任何改善。

事实上，即使该岛的收入分配从1—1,000英镑变为999—999英镑，帕累托标准也没有得到满足。如果政府能够挥舞魔棍，把总消费从1,001英镑增加到1,998英镑，这一新的状况就不是对旧状况的帕累托式的改善：其中一人的状况变差了。

为了避免这一似乎荒唐的结论，尼克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先生（现为勋爵）和希克斯先生（现为爵士）提出了考虑补偿可能性的福利标准。如果经济的增长允许受益一方补偿受损一方，从而使双方的状况都告改善，这就是福利的改善——不管真实补偿是否发生。按照这一定义，999—999英镑的分配无疑是对1—1,000英镑的改善，但500—500英镑的状况仍比1—1,000英镑要差。

现在是两难推理。只有任何人的状况都没有变得更差，帕累托标准才把一个变动看作是福利的改善。卡尔多—希克斯的方法把标准不确定的替代范围缩小了。但仅仅用平衡损失和受益的规则来说明，却使许多人感到并不充分——1英

锈的额外收入对穷人福利的增加，并不多于对富人福利的增加。政府的大多数税收和支出政策刚好来自相反的信念，因此福利经济学有被当成不合实际的东西而予以取消的危险。

还有什么理论能够有助于政府进行社会选择呢？有些理论家认为，个人偏好是最好的指南，因此，政府应该计算选票，做大数人想要做的事。不幸的是，多数人的投票决定在技术上存在着缺陷。假设A、B、C三人必须在X、Y、Z三项政策中进行选择（见表）。再假设，A的偏好顺序为X、Y、Z；B的顺序为Y、Z、X；C的顺序为Z、X、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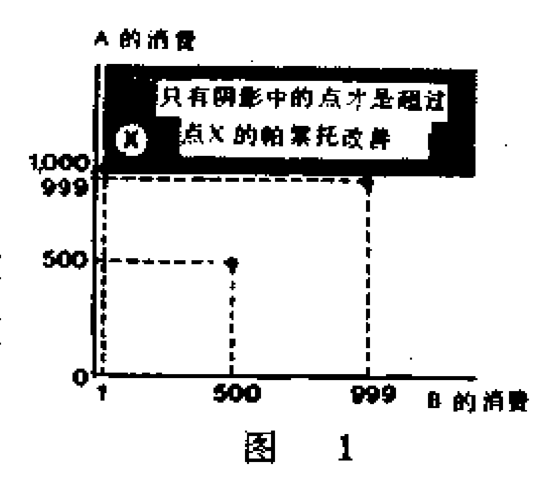


图 1

投 票 之 迷			
投 票 者	投票者对X、Y、Z的偏好顺序		
	X	Y	Z
A	1	2	3
B	3	1	2
C	2	3	1

在对X和Y的投票选择中，X以2比1获胜；在对Y和Z的投票中，Y以2比1获胜。因此，对于X和Y来说，社会偏好于X；对于Y和Z来说，社会偏好于Y。那么，对于X和Z

来说，社会应当偏好于X；但实际上，在对X和Z的投票选择中，Z以2比1获胜。

斯坦福大学的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教授曾经证明，集体选择的任何——的确是任何——规则要么缺乏一致性，要么无法满足一组最起码的条件：例如，对于X和Y而言，若每个人都偏好X，那么整个社会也被认为偏好于X。阿罗的“一般不可能定理”表明，社会的选择理论肯定不同于个人的选择理论，有如微观经济学那样。自由市场使个人的决策具有连贯性，并保证其结果具有帕累托效率。但这不足为训；经济理论并未提出使社会变得“更好”一些的规则。

市场缺损

理论家们一直强调，只有在满足某些假设条件的情况下，自由市场经济才能达到帕累托效率。最重要的假设条件是厂商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即它们自身很小，不能影响价格；它们能够自由进出其行业；顾客对其产品具有完备的知识。这些条件实际上是很难满足的。因此，经济学家们提出，完全竞争的这种偏离是否能证明政府的干预是正当的呢？

以“自然垄断”为例。自然垄断是指那些生产的规模经济能达到或超过全行业产量水平的厂商。这些厂商会利用单位成本较低的优势不断扩张，直至处于垄断地位。当然，他们接着就能抬高价格，减少产量，以增加利润，赚取垄断租金。

政府对自然垄断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呢？控制垄断价格也许是一个办法。这样，政府应遵循经济效率的基本原则行

事，即厂商的定价等于其边际成本。产品的价格是社会消费一个额外单位产品所赋予的价值，边际成本是生产该产品所需资源的价值。

因此，对付垄断者的一个办法就是迫使他们的定价等于其边际成本。不过，在单位成本随产量增加而下降的特别情况下，这意味着迫使垄断厂商遭受损失。如果单位成本是在下降，则从数学上可以推定，生产的边际成本要小于单位成本，因此，规定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将不会给厂商带来足够的收益弥补其总成本。

这就是把自然垄断纳入公共部门的意义所在——私人厂商宁愿辍业不干，也不愿遭受损失。但问题并不就此了结。一旦垄断厂商被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它也许可以规定具有经济效率的价格，生产具有经济效率的产品数量，但是，它的经济损失就不得不由税收来弥补了。

征税会事与愿违。通过征收商品税，政府就在价格和边际成本之间打入一个楔子，这和谋利垄断者的做法并无二致。消费会因此降到缺乏经济效率的水平，在该水平，生产一个额外产品单位的成本要小于社会赋予它的价值。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探讨如何来减少征税的扭曲效应。现代学者们已经用某些高深的数学语言表达其思想，虽然并不比剑桥大学的弗兰克·拉姆齐(Frank Ramsey)先生1927年发表的观点有多少进益。拉姆齐先生的基本观点相当简单——对那些人们购买时不考虑价格的商品征税，需求就不会受到影响。

图2和图3表明，为什么这种征税方法会使经济损失最小。在图2中，商品的需求量随价格下降而增加；曲线D向下倾斜。厂商则乐意随价格上升而增加供给，故曲线S向上

倾斜。两条曲线的交点为C，相应价格为P_1，需求量和供给量为Q_1。当政府在商品价格之上征收AB数量的税时，需求量和供给量将降到Q_2；厂商的供给价格降低到P_F，消费者的需求价格则上升到P_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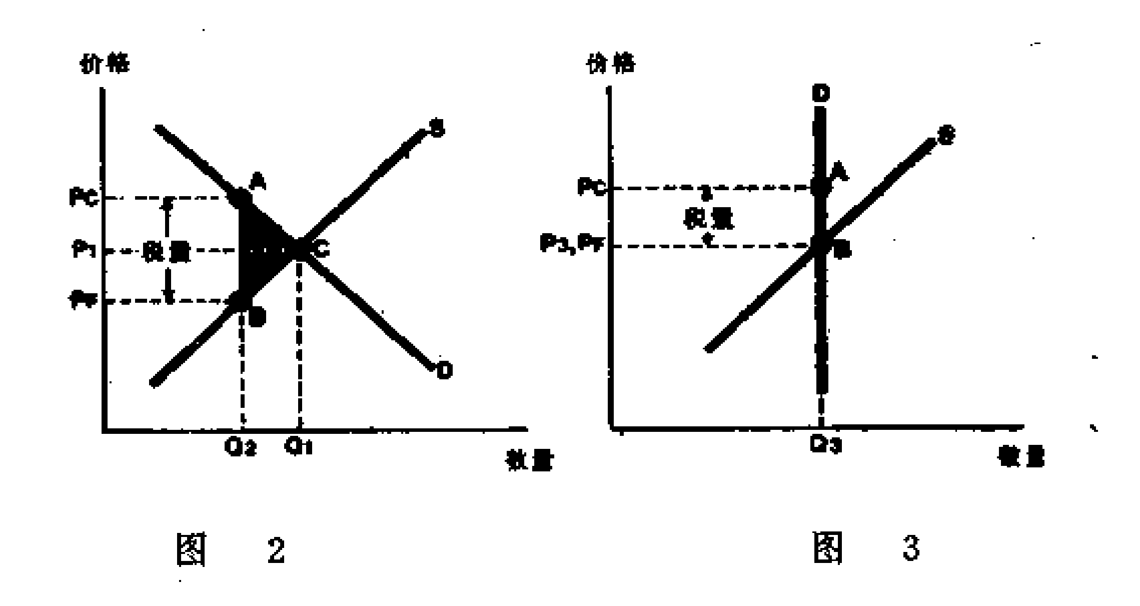


图 2　　　　　　图 3

图中的阴影部分ABC，称为商品税的最大净损。消费的社会价值等于需求曲线之下的面积，因此，当消费量降到Q_2时，消费者的福利损失等于ACQ_1Q_2。但同时，社会也因为减少生产而节余了一些成本，其数量等于供给曲线之下BCQ_1Q_2的面积。所以，损失超过节余的部分为ABC。

然而，在图3中，税收对需求量没有影响，因为需求对于价格变动完全无反应。最优量Q_3仍然是需求和供给的数量，没有最大净损。这一结论表明了对烟、酒之类的商品课以重税的合理性，因为它们的需求对于价格变动基本无反应。

市场失效

经济理论强调的另一方面是自由市场的效率可能崩溃。帕累托模型假设，私人的成本和收益等于社会的成本和收益。然而，一个人的消费，或一个厂商的生产常常影响其他人。

以街道上的房屋为例。如果你重新修饰了你的房屋，你便使你的邻居也受益，但你并不因此支付更多的费用。同样，你的邻居在筹划维修房屋的费用时，也不会考虑你是否受益。结果，街道房屋的修饰以较少的支出费用达到社会最优状态。

房屋修饰赋予出外部收益。外部成本的例子是，一人驾车过快和他人碰撞的危险。在这两种情况下，缺少的都是一个使外部因素能够影响消费或生产决策的市场。正如经济学的行话所说，需要一个使外部影响“内部化”的市场。

这样的市场有时会以令人吃惊的方式涌现出来。多年来，教科书上一直喜欢引用养蜂者和花匠的故事，作为外部生产效应的例子。养蜂者的蜜蜂传授花粉，使花匠受益，但养蜂者却得不到报酬，因此，养蜂者不会提供具有充分效率的花粉传授服务。不过，当史蒂文·琼(Steven Cheung)先生决定考查这一简单事例时，结论却不相同。史蒂文发现，花匠通常要付给当地的养蜂者一些报酬，以确保帕累托最优量的蜜蜂嗡嗡得飞来飞去。

谁补偿谁取决于财产归谁所有。例如，与吸烟者共办公室的非吸烟者也许愿意破费，以使同房吸烟者少抽。在吸烟是行为人自由的通常条件下，这样做或许是合理的。但若规

定，吸烟必须得到同房非吸烟者的许可，即将财产所有权转向非吸烟者一方，吸烟者就得支付费用了。一般来说，同房吸烟的社会最优量应当以类似的补偿（或称贿赂）来保证，不管权利是如何划分的。

为什么不能产生使所有外部影响都内部化从而恢复效率的市场呢？首先，建立一个内部化市场也许太昂贵了。假设一座工厂散发烟雾，使附近居民遭受外部成本的折磨。受害者们可以贿赂工厂所有者，但要把受害者组织起来则是困难和昂贵的。其次，那些拒绝捐助的人同样可以从贿赂中得到烟雾减轻的好处，即所谓的免费乘客问题。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市场缺陷不可避免。政府是否，或应该如何来弥补市场缺陷，这一点远不是很清楚的。

附录：经济对策

几乎所有的经济决策都包含着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一个通常形式是，他人将如何行为。“第二者猜测”的逻辑问题使经济学家们入迷，特别是1944年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和奥斯卡·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联名出版了《对策论和经济行为》一书以后，他们的许多发现向古典微观经济学一些最简明的假设，提出了挑战。

最简明的经济对策的例子是“囚犯的两难处境”。假设有两名囚犯同时被控犯有一罪行，他们面临的选择是，招供或是不招供。检察官告诉他们：如果两人都招供，每人判处10年监禁。如果两人都不招供，他们会受到置身一个在逃恶徒犯罪现场的较轻指控而判刑两年。但若一人招供而另一人不

招供，那么，招供者获得一年监禁的从轻处理，其同犯则从重判处20年。

各种选择可排列成表，称作支付矩阵。矩阵表明，囚犯A和B的最好结果是两人都闭口不说。如果两人能够合作，达成有效协议，他们肯定会沉默缄言，以得到从轻判罚。但如果他们不能合作将会怎样呢？先从A的观点来看，如果B不说，A招供就有好处；坐监只有1年，而不是2年。如果B招供，A招供仍有好处，坐监10年而不是20年。因此，不管B如何行为，A招供都会更好。

从B的观点看，问题完全一样，也是与其闭口不说，不如交待供出。因此，对策的结果是两人都招供，监禁10年，而不是2年。个人利己的合理追求并不导致社会的最优结果。

囚犯的两难处境		
	B不招供	B招供
A不招供	A，2；B，2	A，20；B，1
A招供	A，1；B，20	A，10；B，10

心理学家进行过囚犯两难处境的试验（用奖赏代替判罚）。他们发现，在具有多次重审的审讯里，囚犯们都试图相互“沟通”。在某些审讯中，摆出要沉默的样子，以看看同伙是否有反应。有时，囚犯们能够步步接近沉默协议的达成，以致终于得到共同的最佳待遇。这种行为毫无道理。为什么？要知道在终审中，囚犯没有经济理由去与同伙合作——

如果你招供了，他无法在下次审讯中也来个交待供出报复你。因此，合理的囚犯在终审中都会招供。但若在终审前一次的审讯中，他们知道其他人无论如何都会在终审中招供，那么，在终审前一次的审讯中就招供也是合理的。照此类推，每次审讯都招供都是合理的。

以上是否表明对策论错了？完全不是。它仅表明，合理性的概念比纯粹规范的决策理论所理解的含义，要深刻得多。确实，对策理论使那些早期希望以它来改造经济学的人们感到失望。对策理论的高深研究虽然在古典微观经济学的优雅和清晰之处，发现了含糊和不确定的东西，但并未使经济学发生变革。不过，对于诸如寡头、竞争均衡、工资谈判以及政府政策的可接受性等课题，对策论的研究仍然在取得进展。

李中伟　译自《英》《经济学家》

1984年12月8日第64—65页

十三、总　结

本论丛最后这一篇是评价经济理论的状况、预测在今后10年中经济学可能发生怎样的变化。

经济理论的某些成分常常总是如此：它是有趣味的并毫无疑问是机智的，但在实践上却并不恰当。其他成分开始时作为理论出现，但却终于成了实践经济学的日常生活因素。价格在影响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所起的作用构成不只是经济学家的，而且也是政治家、企业家、顾客和工人的所有经济分析的中心论题。询问一下市场上摊贩在一天歇业时是怎样卖掉水果的，就会发现他的回答包含着几代经济理论智慧的结晶。

要判断当代经济理论研究具有多少持久性的实用价值总是困难的。但是有一点已经清楚：过去十年来一个最重要的理论发展是超出了纯理论领域。理性预期理论从三个主要方面改变了经济学前景。第一，它阐明了预期在经济模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第二，它迫使模型编制者提供更好的技术方法，把预期植入模型。传统的、回顾预期的朴素方程组不再是可接受的。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它改变了政府制定政策的方式。

今天，所有政府都理解他们的政策享有信誉的必要性。这不是出于60年代的传统理由——例如，由于承诺过多而使

选民失望的危险。信誉之所以是关键，是因为一个不信任的世界其反应将破坏政策所要促进的一切事情。如果政府说，它不会通过多印钞票来认可较高工资，它就得连续数年不断地证实这一决定，直到工资谈判者这样确切地相信，就象相信白天之后必是夜晚一样。如果政府的行为反复无常，或者甚至语无伦次，这就是给工资谈判者一个信号：他们可能侥倖做到大幅度提高工资而不至遭受破产和失业的惩罚。

对预期的强调在好几个国家里支配了经济政策。在美国，里根总统宣布了削减个人税的三年计划，希望人们因而不致把额外收入当成横财花掉，而储蓄起来。大多数工业国家的政府现在都把其税收指数化以对付通货膨胀，以便让人们不再对每一预算的“增加”间接税或“削减”所得税而感到吃惊。

英国保守党政府在1980年采取的“中期金融战略”也是以同样的精神为基础的。它要创造一个对其计划有稳定预期的气候。它试图通过宣布一项有关货币增长和公共债务的四年指标来达到这一目的。

新的态度并不限于被错误地叫做“货币主义者”的那些人。许多新凯恩斯主义者，如剑桥大学的詹姆斯·米德教授，承认了预先宣布主要经济变量指标的好处。米德先生宁愿用总需求（以货币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而不愿用货币增长指标，但原则是相同的。

尽管某些新的经济理论能够运用于实践，但仍然有被实务家们拒绝的危险。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经济学家很少设法在他们自己中间求得一致，二是因为他们常常以局外人无法理解的形式提出意见。这两个批评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操英语的人在一场用乌尔都语进行的争论中如何判断谁

是谁非呢？——特别是在经济学目前的状况中。

今天经济学的主要分界线是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把它们区分开来的政策问题已经在前面的短文中叙述过了。但是，问题不仅在于它们想些什么，而且在于它们如何去想。对经济理论的整个思路和对研究什么的选择是不同的。

新古典经济学家的首要优势是理论的严密性。他们的大多数论文数学程度都很高。他们的推理是严谨的和形式化的。凯恩斯学派常常偏好切合实际。他们的论文更加明显地是尽力探究现实问题而不是假设。当然，究竟何为"现实"，这又部分地要取决于观察者的眼睛。举一例来说，非自愿失业概念在理论上也许存在某些困难，但是，凯恩斯主义者却看到了这方面的许多现象，因此寻求的是用什么政策可以减少它。

上述方法论之争可以用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所喜爱的一句格言加以描述。他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指出，如果经济模型的假定是不现实的，这并无多大关系。重要的是模型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并且准确地预测想要预测的事件。新古典经济学家都同意这个看法。因此，他们并不担心人们对其市场结清这一假设的批评。

新凯恩斯主义方法也遭到了批评。某些凯恩斯主义者作出关于工资决定行为的假定，似乎是切合实际的。然而，这种假定仍然难以同支撑凯恩斯主义模型的理性概念协调起来。新凯恩斯主义的回答是：为了换取较大的现实性，他们乐意忍受技术上的不一致性。

数学时代

新古典经济学家偏爱更加形式化的推理方法。因此，他们在更大程度上使用数学。所有各派经济学家都猜想，这是新古典学派吸引如此之多的年青支持者（特别是在美国）的一个原因。他们享受着高级数学带来的纯智力的乐趣。并且，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纯数学家的工作比经济学家要少得多，因此，聪明的数学家转移到经济学上来了。

现在，新凯恩斯学派比十几年前有更多的东西提供给偏好数学的人。严密的数学和凯恩斯主义者“切合实际”有四个方面能够携手前进。

第一，具有理性预期的凯恩斯模型。当前模型研究中最活跃的一个领域是假定理性预期，但仍然把稳定经济的作用留给政府政策的分析模型。其中有一组模型是以劳工市场上的交叉契约这种观点为基础的。如果不同团体的工人在该年的不同时间达成工资协议，工资总量就能够因政府政策改变之类的冲击而有所改变，但变化缓慢。即使工人正确地改变其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但由于契约结构的复杂性，反应也将滞后。名义工资落后于价格，就象预期是回顾的。数学是有趣的，结果是凯恩斯主义。

第二，对策理论(Game Theory)。对数理经济学这一分析所抱的某些早期希望已经破灭。由于技术需要的缘故，该理论进展缓慢。最简单的两人对策，象前一篇短文中讨论过的囚犯两难推理（Prisoner's dilemma)，够容易了。处理三人对策则难得多。例如，把对策论方法运用于竞争性均衡分析是如此困难，以至于实际上毫无意义。

然而，这些技术现在吸引了更多的兴趣。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争论恰巧突出了两个特别适合于对策理论来处理的问题。首先，劳工市场和工资决定理论涉及到直接来自对策论手册的讨价还价过程。其次，货币指标的流行把政府置于与工会和其他利益集团进行战略对策的境地。如果这些集团决定诱使其摊牌的话，政府的承诺应当受到多大程度的约束？

第三，次优理论（Theory of the Second Best）。长期以来，学生在学习微观经济学中的最大失望，就是所有熟悉的效率规则(例如使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只要有一个被破坏，就可能都告失败。前一篇短文讨论了自然垄断的情况，并且解释了使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加强了经济效率，即使它会迫使垄断者蒙受损失。但是这假定了在经济的其他地方，竞争性企业也是使其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次优理论证明，如果这个条件不能满足，垄断者就需要其他的定价规则。当政策只能从坏中选优时，要探索次优规则仍然有许多工作可做。

第四，社会选择理论（Theory of Social Choice）。形式逻辑是业已证明在这一理论形成中最有用的数学分支。森（Amartya Sen）教授在他的《社会福利中的集体选择》一书中率先展开了该项研究。提出的挑战是考察下列两者间的关系：（1）有关收入分配这类事情的社会目标，和（2）社会成员的个人偏好。把集体决策和个人选择联系起来究竟能有多大可能呢？

这些例子表明，数学并不是任何特定的经济思想学派的独有财产。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对追求技术挑战的学生们的吸引力可能在开始减弱。尽管如此，如果凯恩斯主义者是来自爱用文字分析的那一代人的话，他们在这种趋势中找不到

多少安慰。对这些人来说，数学渗透到经济学的每一角落，这事本身就是最大的烦恼事。

更大规模使用数学的倾向仍然是不可阻止的。这也不一定就是一件坏事。经济学总需要（实际上也拥有）其信息的传递者和权力的追逐者；这些人是要改变世界上的事情，而不是要改变论文中的符号。他们将继续解释数学进展的新领域，使政策制定者感到迷惑。只要比较脱俗的经济学家们有采用数学阐明问题的方法，这一经济学研究就会继续进行下去。

还会取得多少进步呢？有把握说，在经济学的理论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最大的发展。100 年以后，教科书一定还会留给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之类概念（它们在100年前甚至尚未发明）以重要的地位。尽管如此，但相对来说，理论经济学的许多方面仍然是未开发的。

然而，在经验方面，已经有迹象表明，研究人员达到了成果急剧递减的地步。耗费的精力和计算机机时在不断地增加，但对理论进行统计检验和建立模型用于预测这两方面的能力却提高得越来越慢。

经济计量学家检验理论，是要看这些理论究竟同来自现实世界的统计证据拟合的程度如何。技术问题很多，因为只有数据满足了一系列的要求，才能够进行可靠的检验。这意味着，经济学家得去检验，确保他们没有接受应当拒绝的理论。反之亦然。

这一操作变得越是先进，理论检验的理论和经济学的实践之间的差距就越是大。实务家：财政部、中央银行和私营企业以及大学里的经济学家都知道，基本数据常常在开始测算时就很不准确，以后又受到频繁而重大的修正。对他们来

说，处于当前工艺水平的经济计量学似乎是离题的，其中大多数稍有名气的仍然包含了20年以前就能得到的统计方法。

用模型作预测，而非呈现世界的本来面貌本身，这遇到了一些特大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是现在众所周知的卢卡斯批评（Lucas Critique）——政府政策的变化能够改变经济模型的整个结构，而不是仅仅影响政策明显起作用的那些地方。因此，用经济计量模型来解答象"政府支出增加在两年之后将影响多少企业投资"之类的问题是错误的。当然，模型设计者对这种批评无动于衷。他们原则上接受卢卡斯批评，但认为它在实际上并不很重要。

在其他方面，预测的进展已经令人失望。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相结合意味着模型可以越做越大。现在为政府使用的、以及越来越多地为中小私人预测企业使用的巨大模型，包含了数百个方程。它们更加大了，但是否更加好了呢？

在许多方面并非更加良好。通过比较已经表明，巨大模型在预测通货膨胀和产量这样的关键变量上，比小得多的模型更为糟糕。预测记录良好的模型根本就避开经济学，预测变量完全以它从前的数值为基础。

第二个问题是大模型是这样复杂，以至使用者对方程组内部进行的过程完全失去"感觉"。这使得对结果的评价更加困难。第三个问题是大模型尽管规模大，但却容易为其设计上的微小变化而推翻。改变一或两个方程，也许会使拥有一千个方程的模型从凯恩斯主义的变为新古典的。

大不会带来安全。它的唯一的实际优点是它提供了足够详细的预测；满足小型政策——改变哪些税收，修正哪些支出计划等等——的要求。当些，细节是重要的。但经济学永

远不应当忽视重大的理论问题；而在某些方面，它正在开始这样做。

冯金华　译自〔英〕《经济学家》1984年

12月15日第64—65页